

《记忆鹿城·方志》二〇二〇·春夏
(总第十三期)

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

鹿城方志

LUCHENG FANGZHI

温州市鹿城区档案馆 主办
温州市鹿城区地方志研究室





2020年1月15日下午，区档案馆馆长张靖一行到位于山福镇的温州市三箭混凝土有限公司开展新春慰问走访。



1月20日，鹿城区档案馆联合区政务服务中心举办以“和谐新卷，与法同行”为主题的崇法治赠春联活动。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鹿城方志
LUCHENG FANGZHI

《鹿城记忆·方志》二〇二〇·春夏
(总第十三期)

温州市鹿城区档案馆 主办
温州市鹿城区地方志研究室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鹿城记忆·方志》编辑部

主 任：张 靖

副主任：王剑峰

委 员：金汐汐 李洪湖 谢一方 戴爱华 周斌斌

主 编：王剑峰

审 校：沈蒲州

责任编辑：戴爱华 孙任翔 朱凌云 胡亭亭

编 务：商 艳

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宽带路 18 号 5 楼

邮编：325000

电话：0577-55888163

邮箱：dfz@lucheng.gov.cn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目
录

目
录
一

专 载

- 一 鹿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建设获市长批示肯定 / 陈旂旆
- 四 “诗与远方”原来在这座江中孤岛上 / 浙江新闻频道
- 九 叶永烈的意义 / 吴东峰
- 一五 未来、过去和现在——回忆姑父叶永烈先生 / 杨仿仿
- 二四 鹿城城西正在“成长” / 温州都市报
- 二九 世界读书日特辑——许志强：阅读是自我的迁徙 / 博雅中文
- 三四 温州梅冷生先生的“微信朋友圈” / 浙江学习平台
- 三七 温州古巷 / 戈壁胡杨

探 索

- 七六 双屿走笔四题 / 郑锦泰
- 八二 储庆寺考略 / 诸向东
- 九〇 温州瓯海关的前尘往事 / 小科
- 一〇四 也议“书法是文化不是技术” / 王客

纵 横

- 一一一 屿儿山遗址：藤桥四千多年前温州祖先的故居 / 李岳松
- 一一六 知青亭记 / 严云林
- 一二一 部队调防，情融温州经历难忘
写在：温州军分区部队调防 45 周年
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成立 60 周年 / 王邦志
- 一二七 瓯江畔山福镇横山村的记忆 / 浮 石

老 城

- 一二九 找寻张璁楼第 / 朱继亮
- 一三八 玉介园：温州的大观园 / 苏德来
- 一四二 从温州民谣到白鹿古城“七大门” / 王 拓

人 物

- 一四六 百里坊“严升记”开创及其家人们 / 严云林
- 一五九 腾增寿——一位从来不用讲话稿的企业家 / 王邦志
- 一六三 母亲的遗产 / 浮石散人

艺苑

- 一六六 特稿：丑陋的老三届 / 张抗抗
- 一六九 耳疾所悟 / 王 曙
- 一七二 王曙行·摄（选）
- 一八〇 父亲和母亲 / 褚 坚
- 一八二 人生两至乐 / 徐波克
- 一八五 端午至，杨梅红 / 王微芳
- 一八七 《戍浦文存》蕴含着文化自信 / 刘锦辉

简讯

- 一九五 《鹿城年鉴（2019）》出版
- 一九五 区档案馆馆长张靖到三箭混凝土公司新春慰问走访
- 一九六 鹿城区档案馆开展“崇法治、赠春联”活动
- 一九六 区档案馆开展新馆建设工地年前安全检查
- 一九七 区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组对区档案新馆建设工地复工开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 一九七 市委高玉凤副秘书长一行赴我区开展档案工作调研
- 一九八 鹿城区史志部门积极奋战抗疫一线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鹿城区历史文化街区 建设获市长批示肯定

陈旂旎

2019年，鹿城区进一步推进核心区域建设力度，拓宽城区辐射范围，继续深化以五马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为重点，全力推进公园路片区改造提升等八大项目建设，力促老街区的精彩蝶变。今年国庆，府学文庙展示馆等7个单体工程和公园路西段率先完工开放，助力五马街区日均人流量高达9.6万人次，当日最高达11.2万人次，获中央、省、市各级主流媒体宣传报道。全年接待中央和各地考察团194批次，其中省部级领导带队10批次。相关工作成效还获得姚高员市长批示肯定。

一、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

一是7大单体工程建设成效显著。紧随蝉街、五马街试开街，于2019年春节基本完成松台山净光塔亮化工程；严格按照历史原貌，修复天津楼、集香居、县前头汤圆店3幢历史建筑，整治改造名城广场、新国光裙楼2幢现代建筑，并深入挖掘温州传统教育文化新建府学文庙展示馆，统一在国庆前完工开放，有效助力五马街区人流量再创历史新高。二是公园路片区改造提升有序推进。将公园路片区改造提升作为重中之重，在充分考察各地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坚持修旧如旧、建新如旧的原则，打造以温州传统民居风建筑为主的特色历史街巷，并深入挖掘公园路及中山公园的历史文化和历史记忆，努力构建“公园路十景”和“中山公园十二景”，公园路西段（解放街至兴文里段）已率先于国庆完工开放。三是街区建设成效获得肯定。经过一期和二期的改造提升工程，形成了以五马街为中心向东向西延伸1400余米的步行街区，同时，注重连线成片陆续启动周边的公安路、纱帽河、府学巷等辅助街道及背街小巷进行改造提升，逐步实现由“一条街向一个街区”的转变。2019年五马—蝉街获评浙江省高品质步行街试点和街容示范街称号。

二、街区管理实现新突破

一是有效推进公园路业态调整。我们充分吸取蝉街改造的经验教训，以公园路片区改造提升工程建设为契机，配合相关部门，对公园路沿街私人房产和房管公房进行了统一征收，为后期的业态转型升级创造了基础条件。同时，就公园路业态运营事宜，积极对接相关意向运营商，多方面征集业态运营方案，并经多方磋商，已形成由专业运营团队统一运营的一致意见，正全面筹备项目招标工作。二是有效优化五马街区业态体系。在蝉街、五马街、公安路等重点街巷，全面推行“五禁三审批”机制，大力开展低端清退、空间盘活以及新业态引入的业态调整“三步曲”，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五马街区新增商业面积 15000 平方米，公园路完成商业运营主体招商。三是有效强化街区日常管理。通过五马街区日常管理职能转移以及建立健全五马街区执法中队等方式，有效理顺了街区的日常管理机制。同时，创新采取街区物业化管理模式，有效承接街区秩序管理、绿化养护、市政维护等方面管理工作，使街区形象得到了较大提升。

三、文旅氛围得到新提升

一是街区活力进一步提升。利用街区现有的历史建筑、景观节点、展馆资源，公共活动空间等开展节假日主题活动和常态化活动，先后组织策划“我在五马街过大年”“迎国庆‘大建大美 同心同享’五马历史街区市民体验活动”“不忘初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红七月·服务月’”等一系列民俗文化和红色党建主题活动，并得到人民网、光明网、浙江新闻客户端等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宣传报道，使五马历史文化街区成为广大市民、游客体验温州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文旅目的地。二是文化韵味进一步彰显。以公园路片区改造提升工程建设为契机，全面查阅、整理公园路及其背街小巷的相关历史文化资料，并结合游线设计，植入斗城文化元素，有效彰显了街区各重要景点的文化内涵。同时，进一步强化“温州三十六坊”微信公众号运营工作，累计发布原创文章 200 多篇，阅读量达到 300 万人次，为街区文化营造了浓厚的宣传氛围。三是文化活动进一步丰富。进一步加强历史街巷、传统地名、地方特产、习俗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的整理宣传工作。积极对接温州本地非遗、老字号传承人，做好非遗、老字号的引入工

作，全面优化五马街区业态结构。通过非遗传承、互动打卡、特色布展等形式，将浓厚地域特色的民俗生活、民间艺术、地方特产等历史文化资源形象化，让传统文化和现代商业文明相融合，打造“瓯”字品牌，形成文化地标。



『诗与远方』 这座江中孤屿上 原来在

浙江新闻频道(4月19日)

瓯江，从山中来，到大海去；绵延八百里，奔流不息；多少文人墨客徜徉于瓯江山水之间，写下一首首诗篇，传诵至今，让瓯江山水诗路闪耀千古。其中，是怎样的一首诗，让一座孤屿能够响彻文坛？是怎样的一群诗人，让这里诗韵流转，经久不衰？又是怎样的相遇，让这里糅合了诗词的细腻与英雄的豪迈？守望文化家园，传承历史文脉，本期文化浙江大讲堂走进温州鹿城，感受江心屿的坚韧与浪漫。

“诗之岛”——江心屿

在温州市区北面，江心屿像一块葱郁叠翠的宝石镶嵌在瓯江之中。远浦归帆、孟楼潮韵，瓯江月色……风格迥异的景色在这江心屿上交相辉映，让它当之无愧成为“中国四大名屿”之一。

作为历代文人心中的文化地标，江心屿最初被看见，被欣赏，还要从一位诗人和一首诗说起。

南朝宋初，诗人谢灵运任永嘉郡守时，曾登临孤屿，写下“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名句，自此，以诗之岛为中心，正式揭开了鹿城不被外人所知的美貌。





即使是未曾登临江心屿的李白、杜甫两位泰斗，对于孤屿的向往也频频跃然纸上。“江亭有孤屿，千载迹犹存”（李白）；“孤屿亭何处？天涯水气中”（杜甫）。宋代的叶适、“永嘉四灵”，明代的刘基、何文渊、章纶、张璁，清代的朱彝尊、梁章钜等，现代郭沫若、夏承焘等名家都在江心孤屿留下大量的诗作，或赞美这里的山水秀色，或寄托对故乡的一片深情。

提到江心屿，必然会说起这座孤屿上的著名古建筑——江心寺。远古的江心屿原为东西两山，中间被江水分隔。和尚僧人垒石填塞两岛之间的湍急川流，使之连为一体，并在中川新基上兴建了丛林梵宇，名为“中川寺”。因在瓯江之中，俗称“江心寺”。

江心寺是全国对外开放 142 座重点寺院之一，不仅蕴藏着深厚的佛学文化，细节之中更展现了江心屿别具一格的人文风情。其中最为特别的，当属江心寺门前这幅妙趣横生的对联。

温州历代相传，有“雁荡美酒茶山梅、江心寺后凤尾鱼”之说。每年三月，生活在浅海的凤尾鱼就溯江而上，群集到江心孤屿四周的江面上。近郊渔民们便驾着子鲚船，撒网捕鱼。最多是在江心寺后面的江中。此鱼腹内多子，肉质细嫩，可心煮吃，但民间多用油煎，吃起来又香又脆，鲜美可口。传言南宋状元王十朋，曾在江心孤屿读书，吃了很多条子鲚后，出口成章，于是便有江心寺门首的这一付楹联：“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长长长长长长消。”



“世界古航标”

江心屿上，桥榭相映树木葱郁中的二塔一寺，遥相呼应。江心屿上东西双塔，既是佛塔，又是江上航标，它们与舟山的花鸟山灯塔、大连老铁山灯塔、上海浏塔、海南的临高灯塔一起被国际航标协会列为世界百座历史文物灯塔。1981年，东西双塔列为温州市第一批文物单位。1997年，国际航标协会正式宣布其为世界航标遗产。



孤屿共题诗

诗因岛深入人心，岛因诗名扬天下。江心屿由于她特殊的地理环境，向来是文人骚客们的兴致所在。从古至今，上至帝王将相，下及落魄文人，其优美的诗文无不折射出温州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兴衰荣辱。

谢灵运、李白、杜甫、孟浩然、韩愈、陆游等历代文人吟诗题咏，为江心屿带来了诗歌的空灵韵律，而有一个人的到来，却让这座孤屿又增添了几分铿锵有力的英雄气概。



南宋末年，文天祥历经九死一生来到温州，也曾驻留江心多日，希望能够召集东南豪杰，共谋抗元救亡大业，戎马倥偬之际，写下“乘潮一到中川寺，暗度中兴第二碑”的豪迈之音。

宋文信国公祠、谢公亭、澄鲜阁及博物馆、英国领事馆，一砖一瓦，历经时代更替，江心屿记得他们背后的故事。



从两晋南北朝到民国时期，不到 2000 年的历史在江心屿都留下了深深浅浅的印记，可以说江心屿处处是文化，其本身，就是一个极为难得的露天历史博物馆。她的美，美在以诗组成的古朴，美在这种古朴诞生在一个两边湍湍江水向东流的孤屿上。她是一把历经沧桑的古筝，每时每刻都在弹奏着优雅的乐曲。她本身就是一首诗，吟唱着一个地域文化和历史的变迁。

（本文根据金文平、吕相国、黄冰等人的访谈内容整理而成，感谢温州市社科联、温州市鹿城区社科联为拍摄提供的帮助。）

叶永烈：小说家，科普作家，历史学家，报告文学作家；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上海文史馆馆员。

今天是5月16日，一大早看到杨浪先生在他的《地图的发现》发的一篇文章，大意是说，50年前的这个日子是要敲锣打鼓的。当时的中央发了一份历史性的“通知”，“史无前例”开始了。

到了1981年，中央又发了另一份历史性的“决议”，“史无前例”被“彻底否定”了。但到了如今，对“彻底否定”的彻底否定之声此起彼伏，而互联网上反映那段历史的文字与表述那段历史的词儿已经成为“敏感词”了。

作者为此十分担心，1966年敲锣打鼓，以后1981年的文件否定了1966年的文件。现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改成了“艰难探索”，照这样下去，会不会有一天又要敲锣打鼓，“史无前例”再次卷土重来。

杨浪写此曰：“余颇悚然。”？

(一)

果然，下午我就见到了“余颇悚然”的事儿。

互联网上叶永烈先生逝世的消息不停地刷屏：“当代科普文艺作家、报告文学作家叶永烈5月15日9时30分在上海长海医院病逝，享年80岁。”发稿时间是昨天。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凡是有些文化的几乎没有不知道叶永烈先生大名的。在我们这一辈人心中，叶永烈不但是当时作为小朋友读者所喜爱的科普作品《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更重要的他后来还是一位著名的“红色传记文学作家”。

可是细读互联网上叶永烈先生逝世的消息，不禁令

人感到十分迷惑和不解。最早发出叶永烈逝世消息的新闻，是上海澎湃新闻：“科普作家叶永烈去世，曾为我们回答《十万个为什么》”，全文 1000 多字，大体内容是介绍叶永烈是科普作品《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他的作品如何给当年的小朋友留下深深的印象。《十万个为什么》的发行已经超过一亿册，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后来更是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等诸多作品，用文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而叶永烈下半生创作的海量传记文学作品则只字未提。

上海澎湃新闻首发后，检索后续的跟进报道，确实令人匪夷所思，哭笑不得。

《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著名作家叶永烈去世（新京报官微）

叶永烈去世，作品有《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记》等影响一代人（潇湘晨报）著名作家叶永烈去世，参与创作《十万个为什么》（中国新闻网）叶永烈去世，那个告诉我们“为什么”答案的人走了（环球人物网）著名作家叶永烈去世，你用过的小灵通就出自他的《小灵通漫游记》（钱江晚报）……叶永烈逝世的消息在互联网上一家独尊，迅速攀升，但其内容也仅仅是一位有影响的科普作家而已。叶永烈早年参与写作的《十万个为什么》，确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但无论如何，这是一部集体创作的作品，把它当作叶永烈个人的代表作显然不适合。而著名的“红色传记文学作家”的叶永烈却被消失了，被腰折了。不知是记者的确实无知，还是媒体的敏感回避。

作为逝者的讣告文字，这显然是对作者的不尊重，也是对读者的不负责。这不禁使人想起把“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改为“艰难探索”的事儿。

(二)

我们这一辈人是读着叶永烈先生的作品成长起来的，同时也是读着他的作品成熟起来的。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改革开放之初，仅仅十年时间，叶永烈完成了他从科普到纪实写作的成功转型，“井喷式”似地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与事件的纪实文学作品。

下面就是叶永烈先生被忽略了的下半生部分创作情况：

叶永烈的纪实文学作品

▲150 万字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反右派始末》，全方位、多角度反映了 1957 年“反右派运动”的全过程。

182 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及《陈伯达传》《王力风波始末》。▲《邓小平改变中国》，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景式纪实长篇。▲《受伤的美国》，是关于美国“9·11 事件”这一改变世界历史进程重大事件的详细记录。

此外，还有《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用事实说话》《出没风波里》《历史在这里沉思》《走进华国锋》《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走近钱学森》《美国自由行》等。

他还写过傅雷、马思聪、殷承宗、戴厚英、罗隆基、王造时、陶勇、常溪萍、彭加木，等等。

叶永烈逝世后，还留下一部未出版的记述改革开放先行者万里的长篇传记，总计七十万字。

1989 年，叶永烈先生被美国传记研究所聘为顾问。1998 年获香港“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的“最佳传记文学家奖”。2005 年 10 月，荣获中国首届“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

我们这一辈人，更熟悉更喜欢阅读的就是叶永烈这一时期写作的人物传记。他的作品，“内容广泛、全面。不仅开辟了独具特色的‘党史文学’，而且还构成了中国现当代的‘形象历史’”。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每当叶永烈较有影响的作品发表，总会引起阻滞和歧义，但过若干年后同样的作品又被有关部门作为“准正能量”的作品放行传播。

(三)

叶永烈先生逝世后，陆续接到许多朋友和媒体记者打来的电话，要我说些什么，他们都想当然地认为，我肯定认识叶永烈先生。其实不然，我虽然从小就读过叶永烈先生《十万个为什么》，但叶永烈先生在“井喷式”发表作品时，我才开始从事报告文学创作，只能望其后背而徒生敬羨之情。很遗憾，此生没有见过叶先生，但还真想起了与叶先生的一件没有见面的交往。

2007 年至 2008 年之间，我的著作《开国将军轶事》《寻访开国战将》

遭遇了两场名誉权官司，闹得纪实文学界沸沸扬扬。上海文学报记者于2008年春以此为例，组织了题为《纪实文学：一不小心踩“地雷”》的专题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热议和强烈反响。

我没有想到叶永烈先生也参加了这场讨论。这是我后来在报纸上看到的。他虽然没有对我的两场官司明确地表明态度，但他的观点则一直影响着我以后的创作。

在《文学报》2008年5月8日的这篇报道中，记者写道：上海作家叶永烈说起此类文学创作的注意事项头头是道：“纪实文学始终要遵循事实的准确，用事实说话；纪实不允许虚构，要脚踏实地，准确纪录；作者不能偏听偏信，要兼听则明；还要善于辨伪，引用资料要注意。”

叶永烈还举了他为原温州市委书记、公安部部长王芳整理回忆录的一件事为例。他说，书中有一段话，提到了当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的妻子”。王芳回忆录出版后，彭柏山子女打电话给出版社，说不是“妻子”而是“前妻”。叶永烈举这个例子意在告诫我们，纪实文学的写作一定要下功夫采访，保证事实的准确，否则就会遇到你意想不到的麻烦。

2008年秋，叶永烈来到广州参加南国书香节活动，其时，我的两场官司都已尘埃落地，一场官司胜诉，一场官司败诉。有记者借此事问叶永烈：“对吴东峰的官司如何看？”叶永烈的回答是：“我知道吴东峰”，他说：“纪实文学不是虚构文学，要三分写作，七分采访。一丝一毫也错不得，作家采访写作真的很不容易。”

对于叶永烈为我的两场官司发表的意见，我至今仍心存感念。这是叶永烈先生的写作准则，也是他的写作体会和经验，我也因此在以后的写作中受益匪浅。

据说叶永烈先生写的作品大多都能通过出版的审查，这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是个奇迹。他总结的体会就是，纪实作品没有虚构成分，要遵循事实的准确，重要史实要百分之百的准确。比如《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他做到了凡是毛泽东的话，均注明出处，凡是他自己采访所得，均注明采访人物、时间、地点，确实做到无懈可击。

(四)

叶永烈是温州人，长大后一直在上海工作、生活。温州人的精明不但表

现在经商上，而且也表现在其他方面，如叶永烈对写作主题的选择和策划。叶永烈不但是高产作家，也是高智商和高情商的作家。

叶永烈说：“我是上海作家，上海的各个时代基本都有作家写，唯独缺了党的诞生地和文革发源地这两部分，我想填补这两个空白。‘四人帮’又叫‘上海帮’，他们都在上海起家，这引起了我的兴趣。”

“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以新的视角，重构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共和国诞生的历史进程，是叶永烈为上海填补党的发源地写作空白的巨献。

2014年8月，叶永烈的《“四人帮”兴亡》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这是他为上海填补文革发源地创作空白的又一力作。

据有关报道称，该书共分4卷（初起、兴风、横行、覆灭），25章，近200万字的篇幅，通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的个人发迹史，及相互交叉的人生轨迹，深度揭示了“史无前例”的来龙去脉和高层斗争，记述了“四人帮”及极左路线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党和国家与“四人帮”殊死搏斗，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可歌可泣的历史。

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叶永烈在那个彻底否定“史无前例”的历史性“决议”指导下，努力追求观点的正确，努力追求史实的准确，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相，为后人留下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中国十年“史无前例”的真实纪录。

这是叶永烈潜心三十春秋，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完成的呕心沥血之作。为了这套书的出版，叶永烈收集大量历史文献、档案材料，采访众多当事人。从采访陈伯达，到采访关锋，再到采访王力、戚本禹，文革知情者，除了戚本禹外，其他都已作古，采访者叶永烈仍在不停地写。

“四人帮”兴亡的历史，在叶永烈的笔下，经过一次次修改，一次次增删，一次次补充中变得更加真实、客观、全面、完整，同时又不失细致、生动、深刻、尖锐。

（五）

叶永烈说，我写《“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和巴金老人的期望是一致的。

巴金老人曾说，要建一座“闻歌”博物馆。要提防小张春桥、小姚文元再回来。他希望以此来提醒后人，永远不要让“史无前例”卷土重来。可惜的是，巴金所期盼的“闻歌”博物馆至今仍遥遥无期。

叶永烈的晚年似乎感到了一些“令人悚然”的事情。他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重写此书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对于“四人帮”兴亡史的深刻揭露，批判极左思潮，防止“史无前例”卷土重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对于90后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可能连“四人帮”的名字都认不全，但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来说，这是一段永难遗忘的记忆。

2014年，叶永烈的《“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出版了。

就在这一年，叶永烈决定将自己的创作档案，无偿捐给上海图书馆。捐献资料包括手稿、采访本、采访录音、名人书信、照片等共计40箱。据说一卡车都装不下。其中光录音磁带就有1135盘，每盘磁带都清楚注明哪年哪月哪日采访某某人，总目录则更加详尽，子条目也清清楚楚。

这批数量庞大的捐赠文献将以“叶永烈专藏”的名义，在上海图书馆永久收藏，供后人交流利用。叶永烈那天十分高兴，他庆幸地说：“我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在我故世之后，在墓碑上可以书写：请到上海图书馆找我！”

我突然觉得，上海图书馆里的“叶永烈专藏”不正是巴金期盼的“闻歌”博物馆的雏形吗？

叶永烈人生意义的亮点也正在此闪闪发光！

叶永烈走了。不知这是上天的安排，还是冥冥之中的巧合，叶永烈的人生历程没能走到5月16日这一天。

我想，也许是他不愿再听到那个发动“史无前例”日子的敲锣打鼓声。50年前，正是在那一阵阵的敲锣打鼓声中，叶永烈的《十万个为什么》被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批判成了“大毒草”。

“我虽然没有被抓进监狱，但那时给我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人生的价值观彻底崩溃了。”叶永烈说：“几乎每个人都生活在极度恐怖中。现在的年轻人不了解闻歌的真相，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者来说，中国再也不能有闻歌了，那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于2020年5月16日

未来、过去和现在

——回忆姑父叶永烈先生

杨仿仿

专
载
一
五

姑父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是《小灵通漫游未来》的作者，早早就名扬海内。

在南半球醒来的清晨，手机上好几条朋友转来的消息，“著名作家叶永烈因病去世”的字刺眼地映入眼帘，一度以为是网上恶搞，这年头名人被“逝世”不是新鲜事，但噩耗随即被证实。

打从记事起，便知道姑父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是《小灵通漫游未来》的作者，早早就名扬海内，几乎人尽皆知的一个名字。只是，作为骨肉至亲，我们分居不同城市，见面的时间并不多。我和二表哥叶丹小时候一些不约而同的习惯，成了最“远程而同步”的“家族特征”。那就是在上海的幼儿园，丹表哥被老师反映，分到的饭菜，先把菜吃完，然后老师看著可怜，又给盛了菜给他下饭，然而，还是先把菜吃完，几次之后，老师不再上当。无独有偶，这同样的问题，也一模一样地发生在温州上幼儿园的我身上。大人们不厌其烦地把这件事当作家里广为流传的笑话，讲到我们这俩相隔两地却“心有灵犀”的表兄弟，我们俩身上其他的任何特质都被忽略，并被贴上标签归为一类，毕竟其他兄弟姐妹们显然比我们规矩得多。这个“家族性”的“优良传统”让我对丹表哥打小就有著无比的亲近，这种心理上的亲近一直延续到今天。

父亲兄妹五人，姑姑杨蕙芬是祖父杨子恺先生唯一的掌上明珠，祖父1906年留学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政法，同年，同为浙江同乡的蒋中正亦入读日本军校。当时，本就是人文荟萃的江浙两省，留学日本习新学以图报国者居全国之冠，而小小温州，因相对富庶且历来学风炽盛，东渡求学者甚众。大伯父杨士璋先生数年后亦负笈东渡入读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父子俩先后留日求学，一时传为美谈。先祖父归国后，历任浙江宁波、处州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浙江省高等检察厅最高检察长，还任



1995年于上海城隍庙 左一杨仿仿，右一叶永烈。 作者供图

过临安、上虞县知事，萧山县法院院长等职。在任时，曾执意释放多名青年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坚决不在枪决文件上签下检察长名字，受到上峰查处，幸得当时尊先祖父为师的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周旋力保，得以身免。早就厌倦其时官场黑暗的先祖父毅然卸官，再无意仕途，回乡后，潜心研究学问，文史功底深厚的先祖父手不释卷，著述极勤，著有《汉事绀珠》、《通鉴事纬》、《汉书摭词》、《汉书刑法补》、《读汉书百官公卿裴疏记稿》、《味铨存稿》、《毛诗通训》、《韩集后语》、《补三国职官志》等。以上文稿，1965年文革前夕，经由先祖母伍鸣凤女士与先父杨士琯先生捐给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所收藏，得以保存。另有《结一阁日记》、《竹霁庐日记》、《寄石山房日记》、《可庐日记》多卷，在“文革”中散佚。《结一阁集》多卷，《晋书新语》二卷，《晋书纂故》二卷……数十种著作，现仅存书目，文稿俱已散失。《通鉴事纬》一书于1999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先祖父书法造诣尤精，渊源颜平原，脱胎苏轼，兼攻二王，旁及郑文公，遒劲峻逸，凝重老辣，自成一体，是温州著名书法家之一，时人号称平阳第一笔。

姑丈的父亲叶志超先生早年立志报国，就读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从军后因作战机智勇敢，颇得上司赏识，从少尉连附一直升为营长、少校副官。因心痛彼时军阀内战的手足相残，毅然离开旧军队，解甲归乡。志超公在军期间与德国军事顾问私交甚笃，正值当时德国马克大贬值，德国军事顾问手上的马克便成了一堆废纸，见志超公喜欢收藏，便一古脑儿送给了志超公。这些只有收藏价值的外国钞票，后来竟然让志超公意外成了温州的银行家。

当时，志超公回乡的藤箱内的钞票都遭雨水淋湿，回到乐清老家，天放晴时，他把马克拿到太阳底下晒，铺满了一道坦。这下可惊动了左邻右舍，纷纷传言志超公在外带兵打仗，发了大财。正巧，老家的朋友们正在集资筹建钱庄，因为朋友们说他发了大财，他实在有口难辩，无法推托，便也入了股。在股东会议上，因为志超公见过大世面，且组织能力强，便被公推为总经理，这家钱庄当时开设在温州市中心铁井栏 29 号，是当年温州最好的建筑之一，钱庄的名字是“咸孚钱庄”。军校出身的志超公，虽然从事金融行业，但报国之初心未有一刻忘怀。抗战军兴，自 1938 年起，历任浙江省第八区国民抗敌自卫队中校大队长，温台防守司令部上校参议，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议，当时的国民抗敌自卫队，就是国统区的抗日民兵组织。1941 至 1945 年，担任浙江省参议会参议。日军占领温州期间，叶家的住宅被日军侵占，作为日军驻温州司令部，叶家举家逃难至乡下。由于在工商界的声望，志超公于解放初期，再次经公推就任由咸孚、永康、裕丰、益昌、惠大等五家钱庄合并的永和钱庄的首任总经理，并先后担任温州市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温州市政协常委，浙江省政协委员等职。

早年，先祖父子恺公与志超公，也有过诗文书信上的君子之往来，先祖父于 1951 年去世，不及见身后子女成家立业，志超公则在大表哥叶舟作为叶家长孙出生后，在文革武斗如火如荼之际，溘然而逝。杨叶两家当年的处境，在那个年代，可谓“门当户对”，姑丈称之为“同是天涯沦落人”。

姑丈是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在报考北大的时候，一直有着新闻记者梦的姑丈因担心考不上北大，听从了父亲的劝告，改为报考化学系，“至少毕业了能够做肥皂和雪花膏”，不会没饭吃，而不希望姑丈去从事“危险”的新闻事业。姑丈无疑是幸运的，在 1957 年父亲和大哥双双被达成右派之前，考入了北大。喜爱文学创作的姑丈，在化学专业外，心有旁骛，专门去蹭中文系的课，姑丈心底的文学梦想和化学专业知识的结合，是后来他成为《十万个为什么》最主要作者的重要原因，他既远离了政治斗争的漩涡，在枯燥乏味的化学专业之外多了一份浪漫的文学情怀，在当时出版《十万个为什么》的主编者眼里，姑丈的文字要远比其他撰写科学知识的文章来得有趣而生动。现在想来，或许，一切都是上天厚爱他，给予他这么独特而不可替代的机遇，可是，这样的机遇，还有其他人可以抓得住吗？

温州人说一个人倔强，用的是“执着”的“执”字，家里长辈都会说

“阿烈执显执”。姑丈的执着，也成就了他另一本著作《小灵通漫游未来》，这本写于1961年，直到1978年才出版的科幻作品，通过书中一个心明眼亮的小记者小灵通漫游未来市的所见所闻，描绘未来科技的发展，书中提到的许多幻想现在都已经成为现实，譬如可视电话、隐形眼镜、人造肉等等。历经几经二十年的持续政治运动，姑丈审时度势，低调处世，两耳不闻窗外事，在上海仅12平方米的蜗居内笔耕不辍，内心对未来的美好幻想却从未放弃，这种毅力，亦绝非常人可有。改革开放后，“孕育”几近二十年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横空出世，激起了一代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从某种角度说，更是为将来的中国科技发展画下了极具前瞻性的蓝图。

我真正和姑丈亲密接触，始于1993年底，那时候的姑丈早已经名满天下，但还是住在上海漕溪新村40平方米的蜗居（还是方毅副总理特批给解决的住房），除了已经出版影响一代人的《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姑父以似乎是温州人特有的敏锐地注意到了时代的需求，更或许是步入“知天命”之年龄的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年代，姑丈开始大尺度跨界写作。在八十年代开始，作为体制内的作家，他开始转型，从名人传记入手，走访了大量名人，写四人帮、写毛蒋、写梁实秋、写傅雷，而都能够一时洛阳纸贵。以至于坊间一度以为有两个出名的叶永烈，一个是写科普科幻的，一个是写文史传记的。

九十年代初，我们已经移民美国，两个表哥叶舟、叶丹也一前一后到美国留学，父亲极其疼爱他的外甥，在丹表哥赴美前就邀请他先来洛杉矶家里住一段时间，适应美国生活。（我还纪录了丹表哥和我们相处的趣闻，写过一篇上万字的文章在美国《世界日报》连载，赚了三千多美金的稿费。）待两个孩子都在美国立定脚跟专注学业之后，姑丈姑姑于1993年底首度赴美探亲游玩，就住在我们洛杉矶家里。

那时候，我喜欢中国的布鞋，跟姑丈电话里一说，他便到处为了给天生大脚板的我买上45码的布鞋，几乎跑断了腿，来美国的行李中，送给我的礼物里，就有他跑了许多地方才买到的45码布底老头鞋。

在美国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同吃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出门则由我担任司机导游，我们去拉斯维加斯，去环球影城，去渔人码头，去旧金山《文星》杂志创始人萧孟能（李敖的老板）家里拜访，接受当地中文媒体的各种采访。



1993年12月3日，姑丈叶永烈，姑姑杨蕙芬和我在洛杉矶家中割草。

让我印象极深的是，外表温和宽厚的姑丈，到了晚上，必然坐在电脑前面辛勤笔耕，当时，姑丈从中国给我带来了表形码中文输入软件，这也是我此生接触的第一份中文输入软件。家里当时就只有一台电脑，理所当然的，这台电脑就暂时让给了姑丈，我则在姑丈用完电脑之后，赶紧蹭到电脑前，开始我的中文输入。姑丈来美，父亲的华人朋友中，无论大陆、港台，都争相来家里见面，或邀请姑丈去做客，我也因着和姑丈共用一台电脑，而得到父亲朋友的慷慨捐助，获得了一台免费赠送的电脑，从那个时候起，我和姑丈各自拥有了自己的电脑。

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在洛杉矶的住处是独栋洋房，有花园泳池，和当时中国的居住条件相比，可以说是天渊之别，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良好的基础建设，都让姑丈叹为观止。姑丈曾经感慨地对我说过：“你们这一代会完全不一样了。”

姑丈在美时间一个多月，回国后很快就出版了《星条旗下的中国人》，书里面纪录了他在美游玩的经历，以及他对在美华人的见解。姑丈的时间管理能力绝对属于一流。惊诧于姑丈笔头之勤，我也开始以自己的角度记录我

自己眼中的美国。姑丈于我，是不可企及的标杆，但无疑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榜样，姑丈 20 岁出版第一本书《碳的一家》，我则在 20 岁写下我的第一本书《美国的月亮》，这本书由姑丈推荐并作序，于我 21 岁时出版。

我的第二本书《窗外是黑海》同样和姑丈有着各种联系，1992 年，父亲应莫斯科大学邀请前往刚刚解体的前苏联访问，出发之前，想起姑姑当时的俄罗斯笔友斯维塔，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问了姑丈和姑姑，是否还有联系方式。历经中苏友好再到中苏关系恶化的几十年沧桑变幻，姑丈居然很快在自己的档案柜里找到了当年斯维塔的来信，并很快传真给了我们。我们也因此联系到了失散多年从未谋面的斯维塔，更得以在莫斯科见面。而后，父亲为了让我在英文之外能够学习俄文，更是亲自带着我跑到黑海边的小城，斯维塔家里住了半年。《窗外是黑海》是我继《美国的月亮》之后，对当时世界上两大超级大国的亲身生活经历。若非姑丈非凡的档案管理能力，保存了斯维塔的联系方式，或许我不会拥有这样的经历。而我们的收获远不至于我的经历，在斯维塔姑姑家，我们找到一张当年笔友来往时，由姑姑寄给她的照片，照片上是我从未见过的祖父杨子恺先生。在文革期间，我们家数度遭到抄家，父亲珍藏的孙中山亲笔写给祖父的信件都被红卫兵抄走，而不知下落。这张照片非常在一个俄罗斯人手上安然度过了几十年，最后回到我们手上。这也是祖父唯一留存于世的个人独照。

1998 年 2 月，一直寻找先祖父杨子恺先生遗著的父亲在美国接到姑丈的好消息，当年由父亲亲手捐给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先祖父遗稿全数在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被寻获。这批珍贵的文稿于 1965 年文革前夕，“四清”运动正如火如荼，情势日益紧张，先祖母和父亲预感到这批文稿留在家中极度不安全，分别于 1965 年 3 月 12 日以及 3 月 19 日分两批把祖父所有遗稿挂号邮寄到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父亲离开中国之前，曾经多方打听祖父遗稿下落，作为先祖父唯一的女婿，姑丈又是体制内的著名作家，姑丈曾于 1985 年 10 月 29 日给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写了一封信，请他们代为寻找，11 月 29 日接到该部回函，称“由于时代久远，几易其人，情况不明”，寻访工作一度不得不停了下来。

九十年代初期，父亲和姑丈对于寻访先祖父遗稿多次通电话，两人在电话里多次讨论当年捐赠时的许多细节，以期得到更多蛛丝马迹，有利于寻找。1998 年 1 月 4 日，姑丈再度写长信给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说明情况。一



1993 年南加州，杨仿仿带叶永烈夫妻逛跳蚤市场。

个礼拜后，姑丈收到杭州的来信，信中写道：“很庆幸地告诉先生，先生岳父杨子恺的《通鉴事纬》现已被查到，此书与《文澜阁四库全书》等善本书一同尊藏于孤山之巅的善本书库——清白山居！”收到来信后，姑丈偕姑姑于 1 月 21 日赶赴杭州，复印了所有的手稿，共达一千一百多页。

父亲得知祖父遗稿被寻获时，尚在美国加州，这个好消息马上传遍了两岸的亲友，父亲当即决定，丢下美国一切，打包回国，全心全力着手编辑祖父遗稿。1998 年 9 月 3 日，时任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为《通鉴事纬》题写书名，1998 年 10 月 4 日，国民党元老陈立夫亲自题词“中华文化两岸同根”。编辑古籍的工作相当艰辛，我跟着父亲做校勘工作，前后为时近一年，终于 1999 年在国内出版。2018 年 7 月 11 日，我致函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童圣江主任，希望亲睹先祖父遗稿，并高清扫描祖父所有译稿，我的请求得到该部大力支持，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专门立项，耗时近一个月，在不破坏原稿的专业操作下，高清扫描了祖父的所有遗稿交给我。

记得一次姑丈和我闲聊时，当时年少的我问题多多，因为对历史的喜爱，好奇于他亲访历史名人的经历，结合历史事件，总不免扼腕叹息，少不

更事地评说历史，最常用的字便是“如果”，如果当年怎么样，现在可能怎么样。而姑丈则宽然一笑，说“历史没有如果。”

年过不惑，逐渐明白，什么叫没有如果。人生际遇固然有命运的安排，而人的性格却是把握这一生的关键。

如果姑丈当年没有报考化学系，而报读新闻，他能在父兄皆被打成右派的年代安然度过那个暴风骤雨的年代吗？如果不是报考化学系，如果不是心心念念文学、新闻，会有《十万个为什么》，会有《小灵通漫游未来》吗？会有在科普、科幻创作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在传记文学方面再度获得史无前例的成功吗？

姑丈的执着，在于心里源于儿时的一个文学新闻梦，即便世道坎坷，始终乐观、积极、勤奋、心无旁骛，贯穿一生的执着，成就了一个不可复制的叶永烈。而这种执着里，更有着“放下”的智慧、不留恋过往的成就，在最恰当的时候跨界转向，又是他审时度势“识时务”的一个具体表现。

事业上的巨大成功，还不足以让旁人羡慕，姑丈与姑姑，经两家长辈撮合相亲而成终生伴侣，琴瑟和谐，同甘共苦，五十余年感情深厚。姑姑率性而天真，姑丈宽厚而包容，我还记得在美国时，一次朋友们提议姑丈以杰出人士名义申请美国移民，天性直率的姑姑一听，以为只有姑丈可以移民，她不能跟随，小姑娘似地撒起娇来，众目睽睽之下，嗔道：“我和阿烈从来没有分开过，他怎么可以一个人移民！”姑父则在一旁呵呵笑着，安慰她：“要移民也是我和你一起，怎么可能我一个人啊！”姑姑这才转嗔为喜。当时那个状况，我记忆极为深刻，一众朋友还没来得及因为姑姑的嗔怒而尴尬，姑丈早已化解了一切，大家哄堂大笑。姑丈的情绪管理，绝对是家里的定海神针。在幸福安定的家庭环境里成长，两个表哥皆学业、事业有成，家庭和美，确实羡煞旁人。

如果说人生成就，姑丈出版著作三千多万字，共有一百八十多本书问世，从他第一本书开始计算，六十年间著述不断，平均每年三本书，这还不包括他留下的五百多万字日记。任何一个文人，想要达到这样的成就，绝非易事。世间也已经再无叶永烈。

2020年六一儿童节，也是姑丈告别人间的告别式。远在南半球的我，思绪起伏，伤痛莫名，忍不住，我还想问问姑丈第十万零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人间没有如果。”

我还想问，如果 1961 年他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就问世，如果那时候就开始着重科技教育，抛开政治挂帅，以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是否早早就有了更多如伊隆马斯克这样的人？

而此刻，我的脑海里只浮现出他宽厚的笑容，还有他说的“历史没有如果。”还有他对我所说的“你们这一代会完全不一样了。”

在遥远的过去，姑丈曾经遥望未来，而在不远的过去，姑丈反思过去，他从未浪费过所曾活过的每一刻“现在”，无论是他遥望过的“未来”，还是他反思过的“过去”，他活得精彩，我知道，此刻，他的灵魂很自在。

2020 年 5 月 31 日于新西兰

来源新西兰中文先驱网

鹿城城西正在『成长』

温州都市报(2020年5月29日)

鹿城方志
二四

东拓、西优、南连、北接，2018年6月获国务院批复的温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年）（2017年修订）指出了温州城市版图的发展方向，城市建设飞速推进，已正式进入城市框架的快速拉伸期。

近年来，东拓、南连在城建中强势吸睛，西优久未置于聚光灯下，以至于有不少人模糊了其优势和景致。所幸，近期集新未来社区创建项目启动，鹿城区行政副中心、温州市实验中学教育集团新校区将落地于此，诸多重磅消息一举将城西推上“风口”，吸引了众多关注。

何谓城西？想准确地说清城西的区域范围颇有点难度，一个小范围的市民调查认为九山路以西至黄龙双屿一带、水心以及葡萄棚均应纳入城西范畴，从地图上看城西地处温州主城核心区，在文化交通、生态、教育等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

目前，温州传统城市范围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东拓核心区已抵蒲州，向南梧田、南湖连成一片，北接瓯江一线，空间有限。于是，城西发展价值渐渐浮出水面。

01 城西居住史，原已延绵上千年

据史料记载，公元232年，郭璞择址建城，划定了温州“东庙、南市、北埠、西居、中子城”的行政格局，奠定温州人千百年来的“西居”传统。

一条庆年坊，讲述着800多年前宋朝兵部尚书蔡幼学在此颐养天年的佳话；一座张璪碑亭，刻记着500多年前嘉靖帝为张璪在松台山脚下营建府邸的美谈；朱自清故居、夏鼐故居、任岩松故居……老温州的城西位置在九山河、松台山一带，后来修了一条西城路、翠微大道，再加上前几年竣工的广化桥路，近几年也是温州城西向外拓展的历史。



城西老民居

城西拥有天然的山河资源和悠久的文化传承，区域内充满市井气息，温州最美步道九山路、充满老温州记忆的繁忙的西城路、景山等都坐落于此。

生活在城西，总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引发了人们对这里的依附感和存在感，这就是城西情结的缘由。

专
载
二
五



九山湖美景

02 商业、交通，城西新时代更牛

到 21 世纪，温州城西不仅范围更大，城建细节更多也被赋予了全新的板块内涵，商业、交通等西优“必需品”领先市区诸多板块。温州 5050 购物中心总面积超 15 万平方米，引进博纳影城、玛斯特健身、梦幻派对 KTV 等 200+ 一线国际品牌，其中海底捞、西贝等 20 余个品牌为首次登陆温州市场；超 18000 平方米的大润发超市，辐射整个城西，已成为市区范围内屈指可数的综合体之一。



5050 购物中心

目前，城西还已建成多条快速路，包括鞋都大道东联通瓯江路、东瓯大道可快速抵达温州南站，BRT 公交快线 B1 路速达温州站、温州南站，还有 10 余条公交线路联通全城。

根据《温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修编)，规划中的轨道 M2 线会经过该片区，并在该片区设多个轨道车站，将形成全新的立体交通框架。

另外，备受关注的城西黄龙商贸城街坊二期、一期地块分别于 4 月 24

日和5月9日成功出让，且品质是往高端方向去，比如黄龙商贸城二期地块出让招拍挂文件上住宅外立面原则上要求以石材和金属板为主。



黄龙商贸城街坊地块实景

03 蜕变，重磅新升级呼之欲出

从城市格局规划而言，最早的城西承接的是老城区西向的居住需求，但《温州市仰双片区中央涂单元（0577-WZ-YS-07）控制性详细规划》（2017年修编）公告、集新未来社区（黄龙商贸城地块）的全新亮相，城西后发优势已集中显现，西优价值将有望实现重磅新升级。

仰义、双屿片区未来将打造集商务贸易、公共服务、品质居住为一体的城市综合片区，规划居住人口7万人；成为带动温州西片产业转型升级的引领区和以时尚、休闲为特色的活力江湾区。

黄龙商贸城片区拟打造为“未来社区”——鹿城区集新社区，将引进创新创业业态和商业综合体，并结合公园、学校等公建配套。



温州市实验中学教育集团集新校区效果图

3月中旬，“温州鹿城发布”称全心打造的鹿城区行政副中心将落地此地，部分行政事业单位或搬至龙瑞大厦办公。

集新社区配套学校为温州市实验中学教育集团集新校区；校区规划占地面积合计 87.25 亩，其中中学部分占地 70 亩，小学部分占地 17.25 亩；按照公办九年一贯制义务教育学校的办学模式管理运行……

千年城西，未来已来。

编者按：本文原刊于《博雅中文》第十二期【大师风范】栏目。这篇对话体现了许老师对研学、阅读和青年等话题的思考，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之际，特此以飨读者，共同探知人文学者的魅力。

许志强，浙江大学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导，主要从事西方现代派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现代小说叙事学等研究。代表著作有：《马孔多神话与魔幻现实主义》、《无边界阅读》等；代表译著有：《维特根斯坦笔记》、《瘟疫年纪事》、《大莫纳》、《在西方的注视下》等。

关于求学

问：您是1982年考入杭州大学的，那时，改革开放一步步推进，中国人也开始了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可否谈谈当初您的求学路？

那时中文是热门专业，我喜爱唐诗宋词，第一志愿就填了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我觉得我这个人的特点和兴趣，好像除了中文系就没有别的选择了。（笑）

问：为什么会选择汉语言文学这个相对不那么“现实”的专业？

你说“现实”大概是指“实用”吧？中文系从来都蛮实用，现在也是，就业前景乐观，你看我们本科毕业生的去向都很不错，没有一个同学找不到工作，可喜可贺的。

问：您是如何走上外国文学研究译介这条道路的？

我读本科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研究当代文学的论文，毕业留校任教，研究方向自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大概做了七年。后来在比较文学学术期刊上开始发表论文，出版译著，逐渐转向比较文学方向，四校合并时正式转入比较文学研究所。博士读的是外国文学翻译和研

究。大体上是这样一个经过。

问：您曾说过，80年代的文化热潮对您的影响很大，如果没有那个时代，就没有您今天的工作。80年代文化热潮为何对您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

我们是包分配的，没有就业压力。从八十年代初到四校合并之前，大致可以算作一个时代。在我的成长期，高校相对来说更宽松一些，比较适合我这类人。如果是在你们的时代成长，我就不能断定是否会在高校工作。我给自己的定义就是八十年代的“遗老”。（笑）应该尽早把方向定下来。但我还是很感谢我成长时的那个非常宽松的学术环境，允许我自由探索。当然，这种探索要付出代价的。我读学位评职称都要比同龄人晚很多，这是代价之一。

至于说文化热潮的影响，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受其影响，并非只有我才如此。崔健的歌词中说：“突然的开放，其实并不突然。”是的，社会开放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封闭的无反差的文化环境阻碍社会的发展，也阻碍个体的发展。社会在封闭已久的状况下突然开放，这会带来一系列观念的化学反应，而我们是经历这种化学反应的最年轻的一代人。从这一点讲，我们还是幸运的。

现在回顾八十年代，常常把那个年代理想化。有许多夸大其词的说法。除了记忆固有的美化作用之外，还存在着对事实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该如何去理解一个其开放程度仍非常有限的时代。我觉得我们很容易夸大一些东西。总的说来，我对反差大的文化环境感兴趣，但事实上，我年轻时并没有生活在那样一种环境中。说起这一点，今天仍会感到遗憾。

关于阅读

问：在读屏时代，人们总担心大众阅读的碎片化和肤浅化，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有研究生问过我：“您是译者、作者、教师等，所有这些身份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个？”我想了想，回答说：readership（读者身份）。我最重视的是作为读者的我。

不是其他的不重要，我觉得其他的身份都是围绕读者身份展开的，我的工作的核心是阅读。我总是对学生说，阅读非常重要。

面对乔伊斯、卡夫卡这些作家，阅读是有难度的。专业学习中我们经常

会碰到阅读障碍。可以说，任何一种深度阅读都是意味着思想或文化的迁徙，但是有些人太过聪明，不愿意移动位置。如果你在年轻时不受点皮肉之苦，总是想待在自己那个舒适的思想习惯中，那就不会有进步。读书也跟写作一样，上了年纪就学不会了，就不想去学了。

一旦从深度阅读中获得乐趣，自然就会对网络碎片化阅读有所抵制。我觉得碎片化阅读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是否学会阅读。每一代学生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关于治学

问：您认为中国文学有不少是非常优秀的，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不比欧美的作品差，如《一个人的圣经》《灵山》《自由生活》。那您觉得造成中国文学在整体感上逊于外国文学的原因在哪里？

应该强调真实的概念。现在退远了看，“伤痕文学”的真实性是有限的，归根结底是一种粉饰的文学。主体性意识薄弱，也造成观察力的薄弱。

我推崇鲁迅/木心这个传统，知识分子艺术家传统。我们处在一个比较文学的时代，不能脱离现代性的总体框架看问题。我经常接触一些作家、诗人和美术家，我觉得很多人并不把自己当作知识分子看待，这是不对的。知识分子并不只是代表一个身份，而是意味着思想的情趣和视野。

路内的《少年巴比伦》很不错，值得一读。它唤起了我对往事的记忆。有人说，你没有在化工厂做过学徒工，能有这方面的什么体验和记忆呢？我想，一个时代的共情结构并不是由题材自身携带的，而是被作家挖掘和呈现的。我在这本书里看到我青年时代的一个侧面，也就是底层生活的记忆。刚才你问我有没有八十年代的具体故事，我想起的就是路内的这部作品。

关于研究

问：可否介绍一下您最近的研究工作，您为什么想要去研究这个方向？

最近在做维特根斯坦的《文化和价值》的修订，浙江文艺出版社要重版这本书。说是修订，其实是重译。另外，浙大出版社想让我出一本评论集，现在在忙这个工作，准备得差不多了，只差几篇文章就可结集出版。也在准备另一本书的写作，暂名为《现代派文学论稿》。我做的都是我职业研究的分内事，都是长时段积累的东西。感觉就是要有个交代，而非年轻人那种热

情和抱负。

问：在您的文学研究中，有什么是您认为很难的事情？

记得大学二年级我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这本书我很有兴趣，它的议题像化妆盒里的首饰一样精美，关于主奴关系，关于《堂吉珂德》和现代性进程，等等，结果第一页我就读不下来，非常难懂，心里很难过。我想这件事对我打击不小。用弗洛伊德的话讲，这是一种创伤体验。做研究有点像是攻克堡垒。加缪的《西西弗神话》，很流行，主旨并不难懂，但要充分掌握它的学理和典故，没有多年的功夫好像拿不下来。加缪不懂现象学，他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理解都是从二手资料中剥来的。等到你学会品尝其观念和风格的美味，看清楚此书的弱点，你才算是弄懂了。这个过程是复杂的，渐进的，迂回的，我觉得没有捷径可走。文学研究是很难的，一个领域中有许多迷宫般的分叉，不是单纯做了一点就行了。文学批评是诗学和伦理学的综合判断，少不了思想史、文学史的底子，这些靠临时查文献是解决不了的，需要较长时段的探索才能有所贯通，但这谈何容易。

维特根斯坦说，你要评论就要通晓范畴，没有通晓范畴就不会做出恰当的评论。维特根斯坦这句话给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定下了基准。范畴既包括审美样式也包括伦理范型和宗教类别等，也可以说是广义的“精神现象学”的感应、分类、思考和鉴别，总之是价值论意义上的锤炼和鉴别。观念的明晰的结晶状态出现之前，你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关于青年

问：有一种说法是现在的青年更多地参与到“经济人”角色的扮演。您对当下的青年有什么寄语或者建议吗？

我和我的学生属于不同的时代。年轻时我所在的文学小圈子把追求金钱视为堕落。但今天好像不大能够这么说了。不希望和金钱挂钩，倒不是出于清高，而是抵制物化。思想和精神都是脆弱的，很容易被物化和格式化。

我们对年轻人的前途和生存难免容易担忧，即便不在“经济人”的时代也是如此，做父母的容易从生存竞争的层面上看问题，我也是这样，作为父辈，作为老师，首先是从那个层面看问题，去要求我们的孩子和年轻一代，当然这也不无道理。但事实上我很讨厌“成功”这两个字，非常讨厌。

问：您是如何安排您的研究、授课以及自己的生活的？

我的生活主要就是研究、授课。我希望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但现在好像是来不及了。（笑）

问：您教学的课程一直很受学生们的欢迎，您在学生们眼中也是一个非常有才情的老师。您在教学备课和设置中有什么自己独特的见解和认识？

学生从我的课堂上得到东西，甚至收获不小，我很高兴。

课堂不是我输送知识的终端，它是我建构和反思的一个原点，尤其是本科生课堂。我总是花大力气备课，总是像初次所见的那样去描述一个知识结构。应该不断回到原点思考问题、呈现问题，这是我教学的总体方针。

一堂课完美与否，应该自设标准，光是学生感兴趣还不行。当然，这个标准好像很难设定。

我的预设是平均值，不是讲给尖子生听的。也许我的思想方法不对。但你给一百多号人上课，应该力求深入浅出，对不对？总的说来，同一个内容有许多不同的讲法，我只能选择一种方法去讲，究竟讲得好不好，这是不容易确定的。

有一点可以确定，我从教学中收获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和思路。我的研究和教学分不开。我发现自己的写作风格，如果称得上有风格的话，也是得益于教学，最近我发现了这一点。

问：浙商投资资助发起的浙江大学“驻校作家”计划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董事长陈越孟在计划启动仪式前还特意见了您，这让我们感到您除了教书以外，还给学生传输了心怀感恩的思想。您想要给学生们教授和传达的是何种文化思想或者理念？

除了浙商创投的董事长陈越孟，还有上海丰瑞公司的董事长沈勇，也给我们中文系捐了款，后者希望给中文系的交流生提供一些资助。陈越孟和沈勇都是我的学生，他们事业成功之后不忘回馈母校、帮助学弟学妹，我感到很高兴。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帮助社会。

我的教学理念，课上也给学生传达过，那就是：精巧的思维，虔诚的严肃，深刻的文化感受力。

问：可否分享一个您印象深刻的教学故事？

在文学史讨论课上听学生做 presentation，参与讨论，可以直接感受学生的人格和思维方式。我从同学们身上收获各种有趣的印象和观察。我从未和他们分享那些东西。这是教学中无法分享的故事。

浙江学习平台(2020年5月11日)

温州梅冷生先生的『微信朋友圈』

鹿城方志

三四



订阅

晚近温州文化圈流传“事必言籀，言必怀梅”一语，所谓“籀”，即指籀园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前身），而“梅”，则指馆长梅冷生先生。

梅冷生（1895—1976），名雨清，永嘉城区（今鹿城区）人。浙南图书馆事业的杰出代表，现代知名诗人和民主人士。有《劲风阁酬唱集》抄印本存世。

梅冷生把毕生献给文物古籍的抢救、征集、整理工作。他参与征集乡先哲遗著、参与发起补刻光绪《永嘉县志》等有重大影响的文献抢救工作。尤其是在日军对温轰炸、侵占期间，他数度将善本图书运往山区保护，还不遗余力从造纸厂、废品收购站等处，搜罗到大批珍贵古籍，其中有镇馆之宝《万历温州府志》等书。著名金融家徐寄庾评价梅冷生说：“我公搜罗乡邦文献，俾垂久远，其功不在禹下。凡属乡人，无不感佩”。

自 1941 起，梅冷生担任图书馆馆长之职长达 35 年。在他主持下，温州市图书馆被国家列为全国唯一研究地方文献的单位。

此外，梅冷生还牵头组织文学社团“慎社”和“瓯社”并出版社刊，为现代温州诗词创作迎来一个高峰期。一代词宗夏承焘即得益于此，他赞梅冷生先生“才能足以领袖一乡”。

“事必言籀，言必怀梅”，可见梅冷生先生是当时温州的学界中心人物，如果当年也有朋友圈，他们都会说些什么？

三十六坊君据其师生信札，模拟相关前辈口吻“留言”评说。于小编而言，这是一次尝试。不够到位之处，请诸位读者见谅。

慎社瓯社名动一时

1920 年，梅先生作为主要发起人，与薛钟斗、夏承焘、陈纯白、王梅伯、王毓英等友好参照南社的宗旨，在温州组织文学团体——慎社。慎社社友集资出版社刊《慎社》。

慎社最繁盛时，共有会员 87 人，一共出过四集社刊。第二集、第四集由温州美成和书局石印，第三集交温州务本石印公司承印，第一集则未注明印刷所。次年，又结合一批志同道合的词友建立瓯社，并刊印《瓯社词钞》两集。正是他们的切磋交流，共同努力，现代温州迎来诗词创作的一个高峰期，温州才得以走出一代词宗（夏承焘）。

薛钟斗（1892—1920），字储石，号守拙，别号西岷山民，瑞安人。曾任瓯海关邮电检查员。慎社骨干成员。著有《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札记》等。

夏承焘（1900—1986），字瞿禅，号谢邻，晚号瞿髯，永嘉（今温州市鹿城区）人，慎社、瓯社社友。长年研究词学，成就突出，被誉为“一代词宗”，著作结集为《夏承焘集》。

乡邦遗著征集

1935 年 4 月，浙江省第三特区（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成立，当时的第三特区（永嘉区）包括永嘉（大体相当于今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与永嘉县）、瑞安、乐清、平阳、泰顺、玉环六县。梅冷生担任委员、总务兼印行股主任，与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刘绍宽、委员孙孟晋等，在专员许蟠云的支持下，短短两年间，集中抄缮温州乡先哲遗著 402

种。这些资料底本绝大部分已失传，钞本完整留存下来后，在如今编辑出版地方文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温台文化交流

1917年夏，存放《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板片的瓯海关监督署，进驻一支部队，士兵打算把《丛刻》板片当柴烧。梅先生闻讯即挺身而出，与驻军交涉，连夜将之移藏于籀公祠。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梅冷生、项士元各在温州、台州抢救历史文献，互通有无，不厌其烦交换复本，共同谱写温台两地文化交流史篇章。

项士元（1887—1959），名元勋，别字慈园，浙江临海县（今临海市）人，从事史志编纂工作；著有《台州经籍志》《中国簿录考》《浙江新闻史》及《寒石草堂日记》等。1951年3月，任台州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兼征集组组长，全力搜救文物图书。

保护温州地区古迹文物图书

1951年初，温州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乐清倪悟真家藏古籍六万卷焚毁。梅冷生获悉，心痛如焚，连夜草就关于保护温州地区古迹文物图书的建议，第二天早晨由军事代表林大夏陪同谒见李培南，李表示接纳意见。

1941年，梅冷生接任籀园图书馆馆长，时值抗战高峰，为避免日寇轰炸或抢掠，他先后三次把善本图书迁移到瞿溪、高楼、大岙等山区，安排馆员日夜守护，直至抗战胜利才运回温州城区，保全了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当年韩天衡在温州部队兼做宣传工作，篆刻资料十分匮乏，书就更少，主要得益于方介堪和温州图书馆馆长梅冷生。

1995年秋，梅冷生百年诞辰，韩天衡应温图之邀，题“烟霞不遮梅香”六字，并作跋语。

来源：温州三十六坊

作者单位：温州市鹿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服务中心

责任编辑：许赛梦 施佳琦 朱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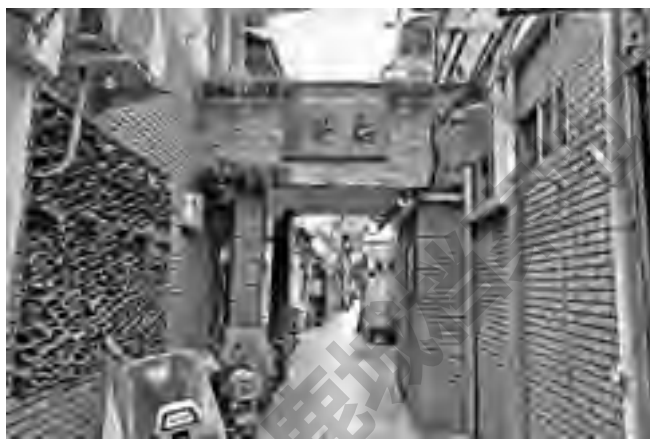
温州古巷

摄影／撰稿：戈壁胡杨

温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至今已有 2000 余年的建城历史。

公元 323 年建郡，为永嘉郡，也称东瓯。传说建郡城时，白鹿衔花绕城一周，故名鹿城。唐朝时（公元 675 年）始称温州。温州人杰地灵，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人文地理。

随着时代的发展，温州在不断地变化，许多古老街巷，在城市改造中而失去。为给自己不再遗忘家乡历史，不让记忆成为空白，我努力地去寻找。



紧靠市中心五马步行街的曹仙巷



双井巷依然人来车往。

三官殿巷还有
保持古老制作的
车木小作坊。



举人坦小巷
弄不少，这木门
紧闭，可能没住
人了吧。



取名手肘头巷，据说这小巷拐弯多。



手肘头巷建筑破旧，而环境很清新、干净。



我第一次知道还有个道俗巷。



狭窄的朱彭巷。



这条是更新巷，好不容易才找到。



花马营巷的门牌，好像是新做的不是老的。



小虹桥也慢慢被人遗忘了。



瓦市殿名存实亡，
早就没有那年代的建筑
物了。



童子殿巷可能是巷
内的一个殿而取名？



市区保持比较完整的旧街朔门街。



一条文化气息比较浓的商业街。



朔门街就在瓯江码头边，好像是卖竹子和竹制品的。



朔门街建于清朝的封火墙。



朔门街让人们记住了历史。



北鹿巷是朔门街隔壁的一条巷。



北鹿巷也是保存比较好的一条古巷，清静又清洁。



打绳巷过去主要是打绳的一条巷。



打绳巷仍全好地保存民国时期的叶氏民居。



当然，老巷也翻新改造了一些房子。



七枫巷仍然保留着原来的房屋结构，古色古香。



永宁巷那年代温州二中校门就在这边，过往的人比较多，大家还是有印象。这里人们的生活气息比较浓厚。



永宁巷保留有很多的清朝民居。



居民喜欢屋前房后，种植花木。



老庭院建筑



永宁巷的房屋过道。



兵营巷好像
没有过去热闹了。



城市中，很少有这样的小巷了。



留守在像兵营巷这些人，都是老人，他们深怀对老居所的那份眷恋。



罗汉巷我才第一次发现有这么一条老巷。



居民们很热爱生活，看窗外的花就知道了。



老居所，也改成了休闲场所了。



遗留下来没有几间房子的路，一般人很难猜到了，它是勉人巷。



你更猜不到，只有保留几间房子的马槽头。



东公解改造后，已经没有老房子了，惟一留下的是这么一块地名门牌。



有些房子也不住人了。



西公解还保留了些房子，基本上都是出租房了。



府学巷的旧貌。



万寿巷没有了以前的喧哗。



待拆建的九柏园
头小巷。



正在拆除的九柏园头老房子。



永东路在东门
还是有点名次的。



永东路不能今与昔比了。



永东路通往环城东路的小巷。



这是原温瑞北路通往永东路的通道鸡鸣岭。



鸡鸣岭已经是很少人路过了。



很少人知道鸡鸣岭，还有这么一条通往温瑞北路的小通道。



这是一间永川路唯一留下的民国时期的老房子了。



这是已经没有了浦边路地名的唯一一间房子。



浦口路还在，但唯一留下的老路只有一道墙。



浦口路老墙边上一所老房。



株浦路上，留下的只有这一幢老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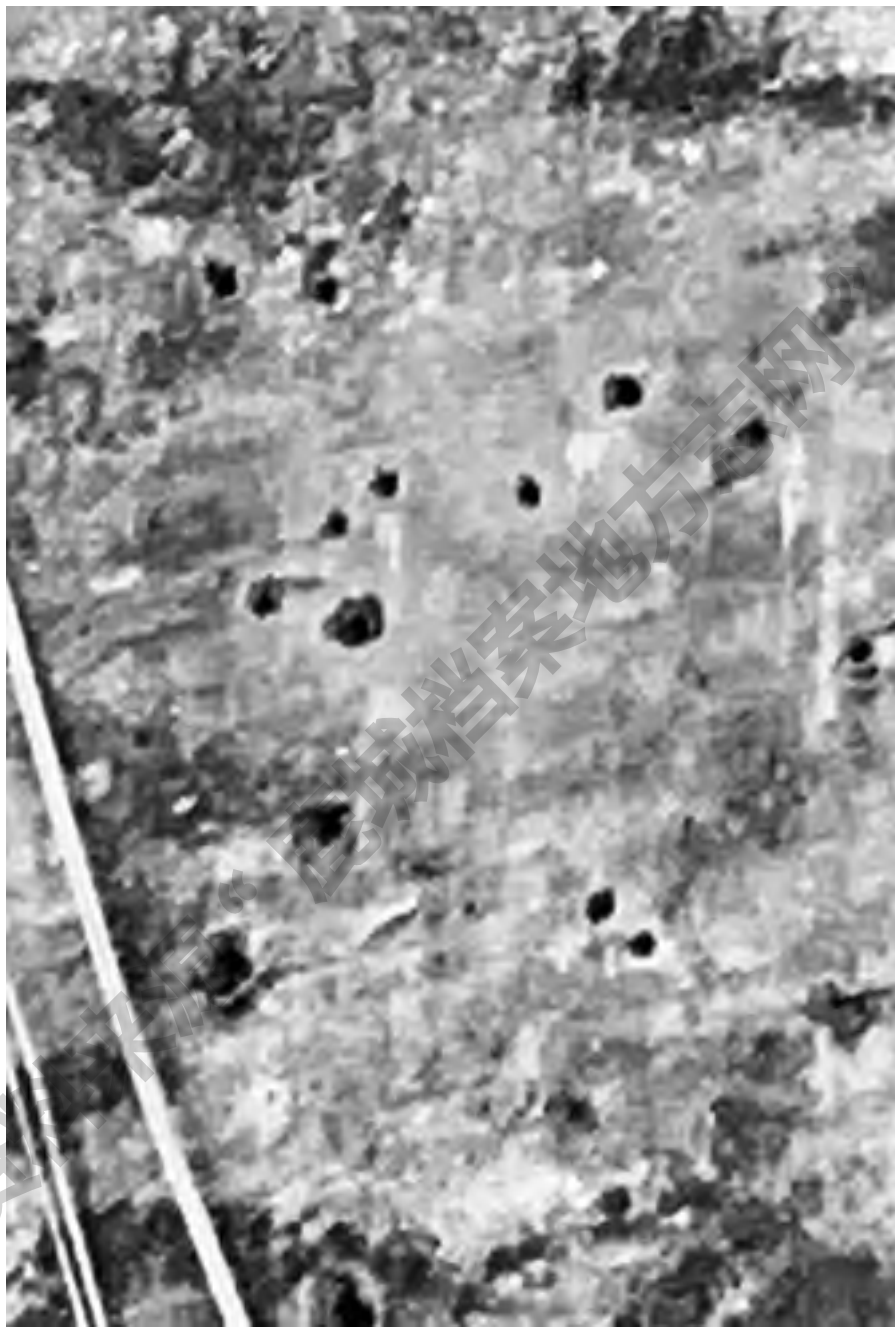
看到浦口路的房子在安装室外电梯，老百姓上楼方便了。



温瑞北路旧貌依然存在。



永东路依然车来人往。



在解放北路建筑物上，清晰可看到文革武斗留下的枪弹痕迹。



府学巷通往谢池巷的小巷。



纱帽河原大众电影院入口。



纱帽河庭园。



登选坊也算比较出名的小巷。



登选坊路很短，连接纱帽河。



高公桥民国的老房子，快成危房了。



公安路变成小吃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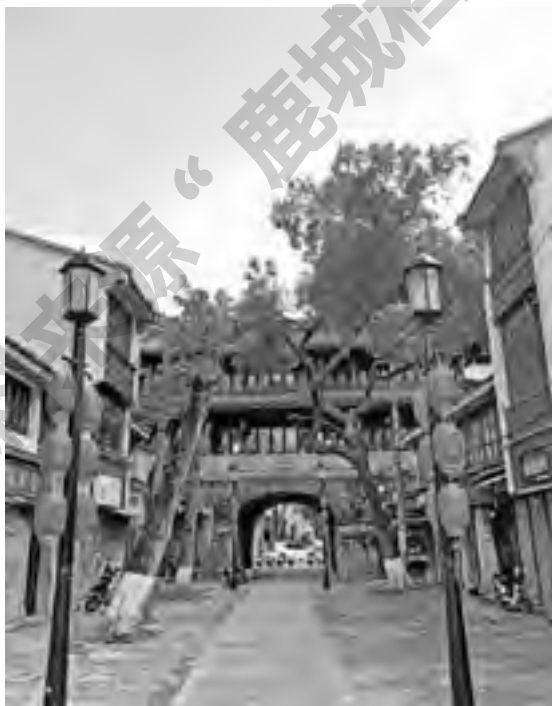


晏公殿巷，老温州的金融街。



状元巷一条很窄又短的小巷。

鼓楼街专门卖凉席的商业街。



鼓楼街蕉楼。



仓桥街卖服装的一条街。

古老的温州城，经过多少年的变迁、改造，留下来的老城面貌，已经不多了，有些街巷因拆迁不存在了。因疫情未解除，我留在了鹿城，借此宝贵时间，我寻找温州的街街巷巷、山山水水、名胜古迹，给自己留下故乡最美好的记忆。

双屿走笔四题

郑锦春

一、小年走上伊

双屿，对我来说是解不开的情结，有抹不去的记忆。今天，走上伊，看老友，谈往事，聊新闻。得知上伊村（现隶属于丰门街道）伊氏宗亲在整理“伊导孝母”的史料，为申报非遗准备。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期待他们把好事做好做成功！

自唐懿宗庚辰（860）年进士伊逵迁祖上伊村，至今已有 1160 年历史。上伊村伊氏宗亲在我的记忆里有伊和清烈士、有大孝子伊导、有“柏树坟”等等。1985 年，我对越自卫还击战中，上伊籍侦察班长伊和清，在老山前线战地，不顾自己安危冲在前头，壮烈牺牲。而 8 位“还击战”的退伍老兵，担起了孝敬烈士父母的责任。30 多年过去了，他们表示“战场上的诺言，将用一生来守护和践行。”他们用行动生动的谱写了新时代的孝义之歌。

割股之事，古昔有之。唐人陈藏器《本草拾遗》云：“人肉治瘵疾，自是闾阎益多割股”。1988 年我任职双屿不久，在上伊村了解到伊氏宗亲历史上出了一位大孝子，为了给母亲治病，割股以疗。这位孝子就是上伊谱六世公伊导，生于北宋真宗年间，字子怀。明弘德（1489）《温州府记》：伊孝子逸其名，永嘉人，居夏仙里（即双屿），主孝，尝割股肉以疗母疾。于外舅潘氏尤尽恩义。乡人称之，至今以孝义名其乡云。

1989 年，在上伊村一山坡地上发掘了“柏树坟”，经考证这两座古墓，一座为伊尹的衣冠冢，一座是伊逵的墓。据说伊逵建墓时，因山坡地上柏树茂密而命名的。伊尹的衣冠冢，佐证了伊氏后人慎终追远，继往开来的寄托。伊尹（1649—1550）为伊氏始祖、中华厨祖，夏末商初政治家、思想家，商朝开国功勋。伊尹历事成汤等五代君主，辅政 50 余年，为商朝的繁荣昌盛

立下了汗马功劳。千百年来，伊尹的贤德广泛流传。孟子称伊尹是中国第一位帝王之师。毛主席评价“伊尹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可法。生于专制时代，其心实大公也。识力大，气势雄，故能抉破五六百年君臣之义，首倡革命。”

伊尹与成汤的对话，史称著名的“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对话。伊尹巧妙的把烹调经验与治国理念结合起来，创造性的提出了“以鼎调羹”“调和五味”的治国方略。对话用“为天子然后可具”，规劝成汤王应担负起统一天下的历史使命。用“三群之虫”“皆有所以”，述说了因材施教的重要性。用“五味调和”，分析了治理国家要区分类别，拿捏得当，恰到好处。用“九沸九变”“时疾时徐”，强调了把握“火候”，注意分寸。小鲜即小鱼，煎小鱼不能老翻动，否则会弄碎的。故有“烹小鲜不可扰，治大国不可烦”的说法，阐明了“无为而治”的哲理。从此，伊尹辅佐君王在方圆 70 多里的地域，开始了统一天下的漫长历程，而且为商王朝延续 600 年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百善孝为先”“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乃为真义。回顾上伊伊氏宗亲的记忆，思考著名历史对话，加深了对孝文化的认知。孝，是一个人善心、爱心和良心的外化。在推进民族复兴进程的今天，我们一定要弘扬中华传统孝道文化，构建具有鲜明特色和更为广泛意义的道德精神。

二、为屿头余氏佐证

上午双屿屿头一老友来电，关切“战疫”情况，我们互致新春问候，祝愿特殊的春节平安吉祥！就这么一个电话，勾起了我对屿头的记忆。

屿头村沿江有一座小山，名曰屿头山。海拔仅四、五十米。它原先是一座小岛屿，经历了一段沧海桑田的历史，演变成今日屿头山。村以山名。屿头村的村干部伍定波、伍林村、戴金唐等，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勤劳朴实，认真负责。对镇里部署的工作，积极主动抓好宣传、动员与落实。特别是中国鞋都建设中的拆迁征地，自觉以大局为重，做了大量艰苦细致而富有成效的群众工作。过往的点点滴滴，仿佛还在眼前。

不知不觉又翻开了案头的《双屿街道志》，“屿头村是个古老村落，有据可证有 600 年历史。”“余家在 1400 年前从江北龙桥移此”（《双屿街道

志》第74页)。“余閼，永嘉(今双屿屿头村)人。又，《鹿城区志》第1296页记载：余閼，南宋隆兴元年(1163)中举(进士)”(第442—443页)。一位史学家曾经说过志史考证之法：“所据之物，可信与否，当先加以审察；其物既可信矣，乃进而考其所记载者，虚实如何也”。我谈不上考证，就为屿头余氏查找一些佐证吧！窝居在家，无所事事，此举也是充实生活的调味品。

施菲菲《余氏风采》一文载，余氏历史可追溯到4000多年，远在公元前，夏禹之苗。余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群体。在历史长河中，他们为理想执着追求，勤奋努力，为国为民为族立下丰功伟绩。始祖“由余”公为秦相，曾助力秦穆公成霸业。宋时进士，余靖公(1000-1064)，北宋政治家，任议谏大夫，在仕一生，官至工部尚书。他恪尽职守，勇于进谏，劾罢奸庸，力荐贤才，为庆历新政的推行作出了积极贡献。宋仁宗御笔亲题“风采第一，广南定乱，经略无双。”

李庆鹏《金溪文脉》一书载，温州余氏尊余仲忱为始祖。余祖(指余仲忱)之祖，五代柴周时宦于瓯，后遂籍于瓯。其祖宅第于永清门(温州城区)东城宝珠桥，横冲直街，与东街衔接，宅第宽大，可容百骑。又查：余仲忱(1092—1162)，南宋高宗绍兴甲戌(1154)进士，文林郎，授徽州婺源知县，与朱子、十朋交往甚密。朱熹、王十朋先后称其“光明磊落，白日青天，金玉君子也”。第三世余閼，南宋孝宗隆兴癸未(1163)进士，知英州守。《永嘉龙桥余氏家谱》：“公讳閼，容貌秀丽，志气超腾，好吟咏善帖，官至提督江西学政，官绩昭于家乘”。谢世时，叶适为他写了两首挽诗。赞曰：“貌伟而丰，德厚而隆。文衔江右，名著浙中。养民惟惠，事上克忠。山高水长，先生之风”。五世讳庆裔公，开禧乙丑(1205)进士，后为戎捍大夫。

《金溪文脉》载，余氏第七世余凤仪，生三子。三子余崇三(1265—1348)，迁居永嘉江北蔑桥。易名灵桥(今瓯北龙桥)，是为第八世。至十四世，龙桥余彬二迁居屿头。从八世余崇三至十九世余元定，传11世，历367年，平均每代33.4年。据此推算，余氏迁居屿头，已有500多年历史。明万历年间(约1600年前年后)即十七世余禄三自龙桥迁入湖庄上庄(今隶属金溪镇)，迄今约400年，传16世。我还翻阅了《余氏家训》，此十四则家训，乃杂取古人之嘉言善行，每条言及立身处事，何可为，何不可为，以垂

为家范者也。安徽省纪委还专门下发《余氏家规家训金言，传承助力廉政建设》的通知。

今天的查证，对于余氏与屿头的起始情缘，加深了印象；对于余氏宗人为国为民为族的建树，增加了认知。同时，进一步理解“地方志”存史、资治、教化之功能。因此，志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秉持真实准确的态度，务求将内容与历史的客观状况相一致，严格资料鉴别、筛选、核订，文字表述也要恰当到位。力戒浮躁之气，切忌越界而书。

三、卧旗山补遗

卧旗山，位于鹿城区双屿街道牛岭村，北倚瓯江，南联前沿山，高度约50米。从前在这两山之间有一条东西通达的小山岭。我曾写过刘秀与牛护岭（现牛岭）、朱元璋与卧旗山，以及中国鞋文化博物馆境况等几篇短文。日前，站在鹿城工业区沿江景观带上，西望卧旗山，又想起了一些尘封的记忆。

1978年，我自南郊公社调任区团委主持工作，随区领导去双屿检查工作或参加会议的机会多了。得知双屿红旗大队（现牛岭村）位于红旗山西侧的红旗八队，是全市乃至全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主要是科学种田夺高产。生产队长陈忠森同志还被评为省级先进标兵。他吃苦在前，要求从严，管理求精，事迹很感动人。当时的红旗山满山是瓯柑，一棵棵柑树像一把把撑开的绿色大雨伞。在山顶望下，郁郁葱葱，一片翠绿。散发的清香，在空气中弥漫，令人心旷神怡。不知何时，柑树在乱砍滥伐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红旗山，原来是从卧旗山改名而来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破四旧、立四新”席卷全国，“改名运动”广泛展开。如武夷山的大红袍，因袍字有帝王服饰的影子，故改为大红梅，后又改为大红岩；铁观音，明显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故改为铁冠音。地名、单位名自然成为改名的重要内容。我们南郊公社的那些大队分别改为东方、民主、立新、灯塔等大队，卧旗山改为红旗山，以山名村，就是“以红改名”时期的产物。应该指出的是，地名不仅是地理符号，方位坐标，不少地名还蕴含着一段历史，述说着一个故事，寄托着一种期待。面对内心深处沉甸甸的乡愁，我们不要再对地名进行随意更改，好吗？

温州市西片污水处理厂，位于卧旗山支脉湾儿山东麓。2007年，我调任

市市政园林局工作，着手启动该项目时，了解到2006年5月、2007年1月及3月，市考古所三度对这里进行抢救性考古清理。发掘33座古墓，年代涵盖新石器时代晚期、汉、晋、唐、宋、明等时期，墓葬有土坑墓、瓮棺葬、陶棺葬、砖室墓等，其中包括新石器晚期好川文化墓，出土了大量陶器、瓷器等珍贵文物。综合1958年、1978年多次对卧旗山古墓进行发掘，可以证明卧旗山曾是温州先民聚落居住区。另据记载，从原双屿地区的太平岭古墓群、牛岭雨伞寺、岩门山、屿头山等遗址发掘的文物看，“双屿可能发现了温州人最早的祖先。”

时间让历史变得严肃，历史让时间变得警醒。千百年来，卧旗山“山形依旧枕寒流”。它记录诉说着历史，铭刻警醒着时间。时间属于奋斗者，历史属于奋斗者！

四、郑桥春暖

90年代初期，鹿城区在双屿郑桥瓯江沿岸规划建设鹿城工业开发区，我在双屿镇委书记岗位上兼任开发区主任，在区委区政府正确而强有力的领导下，一座现代化的工业城迅速崛起，成为温州第二次创业的一个典范。当时的工业区塔吊林立，马达轰鸣，工程车、载重车往来穿梭，呈现出瓯江潮涌，郑桥春暖的景象。大寒，是一年中最为寒冷的节气。然而，今天走郑桥脑海里无数次闪现昔日的场景，勾起了留存已久的记忆。人生道路各自选，难得重逢总是缘。故交旧友，萧疏鬓已斑，欢笑情如旧。郑桥之变，犹如瓯江潮水滔滔不绝，让我又一次感受“郑桥春暖”。

堤塘之变。工业区刚启动建设时，沿江还是老祖宗留下的“土堤”。记得是17号台风，今天想起，仍心有余悸。那天晚上我们再一次检查工地，当走到泰力路北端的时候，突然发现“土堤”开裂异动，我尽力嘶吼“大家撤退”。顿时声嘶力竭，土堤随之滑入瓯江之中。我们在汹涌的潮水追赶中，“逃”到了办公室。没有多少时间，整个工业区成了一片汪洋，一楼办公室的水位高达1.5米，我们只能躲在二三楼办公室。第二天一大早看到的是一片狼藉，惨不忍睹，心中有说不出的伤感。后来建起了50年一遇的标准堤塘。2013年，这里又建起了百年一遇的标准堤塘与几十米宽的绿化景观，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水闸之变。工业区一二期的雨水管网都汇入泰力路总管，然后通过水闸

排入瓯江。水闸不大，像一座小亭子，琉璃瓦屋面，连接芙蓉簇拥的回廊。我刚参加工作时的区委书记潘教明同志题写了“工业区水闸”，笔酣墨饱，气韵流畅。2013年，作为温州市城市防洪排涝工程组成部分的“北排工程”，在工业区内开工。箱涵自泰力路南北贯穿，改建了地下管网，重建了排江水闸。建成后有效地改善了双屿黄龙片区、中央涂片区的排涝能力，成为瓯海三溪片区排涝的重要门户。从而使原本为工业园区的“小水利”，变成了城市排涝的“大水利”，“水闸”实现了“小我”向“大我”的融合跨越。

园区之变。当年工业园区的建设，创新了工程审批的程序，重构了管理服务的模式，开启了拍卖路名的尝试，并且使之成为鹿城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与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四方宾朋，纷至沓来。我还记得曾借塔吊互勉的一句话，“做人要像塔吊一样，站稳脚跟，方能昂首环顾四周，伸展巨人般的臂膀，精准无误的运转。”而今的工业园区，已成为“退二进三”的热门话题。不少同志为此进行了再一次创新发展的探索，其发展规划也在不断地编制与优化之中。唐人高蟾有诗云，“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但愿鹿城工业区能描绘出更新更美更具生命力的发展蓝图。

每当站在郑桥这里的时候，心里总是有很多的感慨，最多的还是不舍。在话别离开之际，耳边响起了唐人权德舆《岭人逢久别者又别》的诗“十年曾一别，征路此相逢。马首向何处？夕阳千万峰。”道出了我的心声。

储庆寺考略

诸向东

鹿城方志

八二

一、储庆寺由来概述

储庆寺，位于现温州市鹿城区临江镇金岙村，是一座有近千年历史的古刹。相传始建于宋元时期，原名金峰庵。明朝成化年间改名为“储庆寺”。自此香火日盛，尤到清时更达鼎旺，寺僧多达几十名。明弘治《温州府志》、清光绪《永嘉县志·寺观》等古籍对此均有记载[注]。明成化年为明宪宗朱见深年号（公元 1465-1487 年），1465 年十八岁即位，故储庆寺所建年代最早不会超过 1465 年。至于之前的金峰庵系何人建造，规模多大，今已无据可考。

居住在临江后支村的诸氏第九世祖诸思禄，生于癸巳年（1413 年）。其长子诸怡庵从洪州任上解俎归田回到家乡，遵照其父思禄公之宏愿，重建庵院，更名储庆寺，并乐施良田百有八亩，“以粥僧家，供养佛火。”其时间可推到成化 1465 年，以致有储庆寺五百余年来的香火鼎盛。

中国一些名门旺族历来有修谱族谱家谱的传统，以昭示家族沿革，传承先贤遗训。这些谱牒秉承了儒家如实写史的优良传统，并有一整套严谨的规范和礼仪，因此往往成为了正史的有益补充，所写内容一般比较翔实，可信度较高。《诸氏族谱》经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族人的共同努力，得以重修。所描述的基本史实应当可信。其中录存了一篇诸氏先人所写《储庆寺记》的碑文，详尽记载了储庆寺的地理环境和沿革变化，是现今考证的重要依据（详见附件：《储庆寺记》）。

二、储庆寺地理沿革

在大中华的版图上，临江镇实在只能算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然而，当我们翻开历史沉重的一页，拂去岁月尘埃的时候，却不难看到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浙南

小镇，同样有着撼人心魄的故事。

临江镇地处温州鹿城区西南面，距市中心直线距离约 20 多里路。然而千百年来却长期处于半封闭状态：这里在改革开放前一直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江。瓯江从村子的东北方向流过，前行不远便是瓯江的东海出海口了。村子临江一面，地势平坦，由瓯江长年冲积形成，沟渠交错，土地肥沃。人们出行全凭水路一途，在那时也算极为便利了。这块总面积仅为 30.7 平方公里的土地，处在人丁稀少的农耕时代，能有如此进退便利、适于避开战祸、繁衍子孙的地理环境，已足可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相媲美了。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临江镇东面的山洞被开凿，修建了宽阔的公路，才把临江与温州城区直接连接了起来，从而结束了临江人走出村庄唯有靠水路的历史。

过去长期以来，临江后支村则是瓯江中上游地区去温州城的中转必经之地。商旅迁客需先从后支村江边的路亭上船，经二个小时水路才能到达温州江心寺码头，再转往别处去。

这是储庆寺保持千百年来香火鼎盛的客观地理条件。

后支村北临瓯江边的路亭，曾是商旅中转要衢。图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由诸氏后裔诸云波等村民出资新建的路亭。

储庆寺周边的地理环境，更称得上为风水宝地。《储庆寺记》里有详细的描述。《记》云：“环溪皆山也，其金皇诸岙，钟毓独奇，望之耸然，而灵秀者马岱也，径曲兮通幽，竝（同并）有源泉混混（同滚）而流出洞桥之外者，莺溪也。溪迴路转，有庵敞然峙于溪上者，金峰庵也。”又云：“甌盖接于妾扇，稻仓压于芭蕉，黄坤尖峙三祝岭之南山者，寺林之四旁也。山而明，水而秀，四旁之胜良多，而福也无穷也。”详尽地描述了金峰庵（储庆寺）周围的地理环境：庵后有锁马岱、甌盖、妾扇，稻仓、芭蕉，黄坤尖峙、三祝岭之南山等诸山耸立；庵前有洗莺溪汨汨流过。如此好去处，自然成了佛家胜地。

《储庆寺记》原注中还特意注释了洗莺溪和锁马岱的来历，称：锁马岱是因“时太祖购寺，每跨马考工，即纵马系此山中。待暮，仍跨马而回，故取名也。”而洗莺溪则是由于有“莺名山鹊，知来事，俗云长尾巴鸟。此溪常有此鸟洗身，故名。”如此生动形象的描述，怕是连今天许多后辈也搞不清楚。

三、储庆寺周边人文历史

据史料所载，至少早在宋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时，临江便以乡之建制存在了。历史延绵，朝代更迭，临江曾先后有过永安、横山、山福、外垵等称谓。

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逐渐形成并聚居着程、孙、白、诸、虞等 20 多个主要姓氏家族。他们大多来自中原各地及福建，在这块热土上得到了安定的生息和繁衍。

先讲驿头程姓。程姓一脉，是北宋名儒程颐的后裔。程颢、程颐为宋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伊洛道学”的创始人。后同朱熹理学并称为“程朱理学”，成为有宋以后封建社会正统学说，对我国的文化起着巨大的影响。程颐的第四代世孙程灏，理宗宝庆二年（1226 年）随南宋皇朝由河南洛阳迁徙来到临江，以此繁衍开来。后代多有文士和乐善之举，明成化年间曾因捐粮 1800 斛，得到皇帝的立石旌表彰。

程氏于今最为世人瞩目的后裔，是身居非洲加蓬共和国的程让平。英文名让·平，曾任加蓬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合作部部长、第 59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非洲联盟主席等职。让·平的父亲程志平 1928 年赴海外谋生，1932 年到非洲加蓬经商，成为当地著名富人。母亲晓莉平非洲裔，精通法语，使让·平从小便受到了良好的中西方文化熏陶。让·平自 1994 年以来，多次回到中国的故乡临江驿头探亲访友，折射出他浓浓的乡情和拳拳赤子之心。

再看金岙孙氏。始祖孙颖，富春人，望出山西太原，为宋景祐元年（1034 年）甲戌科进士，任洪州（今江西南昌），后迁调东嘉郡邑（今温州），因喜山水之胜，遂“卜居临江二十六都三里”（今金岙），迄今已繁衍至第 31 代，现村里孙姓达 1200 多人。

还有江南上村白氏。宋朝时始祖白兴公，原居闽省泉州府（今福建泉州），迁来永嘉二十六都二里外垵后支（今临江后支村）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因患洪水之灾，迁居到今江南上村，现白氏人口 1200 多人。

另外，双潮村冯氏也值得一提。冯氏一世祖冯守信，河南滑县人，为北宋鲁国公中书令，其曾孙冯熙绩，于南宋建炎四年，作为宋高宗赵构扈驾将军来到温州。其后冯颖叔，登淳熙甲辰卫泾榜进士，任常州司马，官礼部侍郎。他居官清慎，恩惠及民，眼见南宋半壁江山摇摇欲坠，无意仕途，归家

杜门，以经史为友，独善其身。

可见，正是临江悠久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造就了储庆寺的持久以恒的兴盛。

四、诸氏与储庆寺之渊源

这里着重要说的是居住在后支和前盈两村的诸氏。储庆寺之所以取“储庆”二字为寺名，《储庆寺记》中有明确记载：“更名者谁，施主之意也。施主解俎，重造梵宫，造化有庆，而人又氏诸，故名储庆寺也。”（见附件）。这段文字清楚表明了寺名的来由。当然，在临江众多名门旺族中，要说有钱，绝非诸氏一家；要说礼佛，也决非再无他人。为何独有诸氏一族出来捐田造寺呢？这要从诸氏的南迁历史说起。

据族谱记载，诸氏始祖大德公，系山东琅琊人，生于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清明日，举进士，曾任洪州（今南昌）刺史，后从绍兴越赴福建，迁居温郡永嘉二十六都浮石（今后支村）。其后有二世一清公为南宋光宗年间进士、任浙东道宣慰司，五世崇志、崇本二公为南宋理宗时进士，崇本公任福建崇安县教谕，九世思禄公之子怡庵为进士，复任明朝洪州“刺史”（此处有误，后有述）。直到笔者祖父诸亦平为清同治年举人，后不仕，经商，成为一方富户。诸氏一脉到笔者一辈已整整二十七代。现定居在后支村的诸氏后裔已达1700余人。

古山东琅琊，为今山东诸城临沂一带，自古为华夏儒学的发祥地。诸葛亮、大书法家王羲之、颜真卿皆这一带人氏。诸氏一族代有人才辈出，或耕读乡间，或出仕为官，不仅知书达礼，而且具备了开阔的胸襟，所以能够不以一家为念，而把礼佛济世作为己任，能够拿出自家家产修建储庆寺，并将良田108亩无偿捐赠给了寺院，以供佛火，以养僧人。应当说，这一非凡的义举并非任何有钱人都能做到的。这是其一。

其二，再看明成化年间曾经发生的大事件：

成化年自1465年到1487年。宪宗朱见深即位之初，平反了于谦冤案，使大量被贬官员复职，朝廷颇有振兴气象。但是好景不长，宪宗渐渐沉迷于神仙、佛道和长寿秘术，政务松弛，纲纪崩乱，佞臣汪直受宠，大批贤能之士遭贬或被罢官。

成化元年三月发生荆襄流民起义，入山垦荒开矿者达一百五十余万。明

廷多次强令驱散，流民走投无路揭竿起义，在刘通、石龙、冯子龙领导下，占据梅溪寺称国号汉，任命将军元帅，拥众数十万，分兵进攻襄、邓、汉中等地，朝廷大惊。成化三年，派官军镇压下去。

成化九年明宪宗接受刘大夏和项忠建议，废止了下西洋。

成化十年，朝廷上下已难有直臣容身。

成化二十年，华北大旱，北京居庸关地震。

成化二十一年，吏科给事中李俊上书宪宗，直陈时弊。宪宗表面接受，私下对进谏大臣怀恨在心，密书六十余人姓名于墙壁，伺机贬逐。西厂横行不法，王室贪污成风，下层民不聊生。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宪宗去世，时年 41 岁。

以上可见，成化前后凡 23 年，是个动荡不安定的社会。在这种情势下，九世祖诸思禄的儿子诸怡庵从洪州解俎归来，是可以理解的。诸思禄父子撒钱财重构寺院，施田百有八亩，以供佛火，也在情理之中。表明了：一是社会动荡，钱财放着也是祸害。所以由思禄公作出决定，拿定主意；二是怡庵公解俎回到故乡，手头有了活络现钱，具备了修建寺院的物质条件。根据思禄公生于癸巳 1413 年、成化年到 1487 年终止来推算，储庆寺建寺时间应在 1453—1487 年间。

解俎，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解除职务，革职了。至于因何被革职，已无从考证。至于诸怡庵在洪州府究竟担任过何职，《储庆寺记》中语焉不清，而重修的《诸氏族谱》则称为“刺史”。其实这是不准确的。据史料记载，刺史一职始于隋朝，至宋朝已成虚职，到元朝时被废止。故有明一代序列中已没有刺史一职。

在明朝地方官员序列中，文职设布政司，最高官员是左、右布政使，从二品，掌一省之政。明洪武九年废行中书省，分全国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为省一级的最高行政机构。同时设提刑按察使司，最高长官为按察使，正三品，掌一省刑狱之事。又设管军事之“都指挥使司”，合称一省“三司”。在温州方言中“按察使”，“察使”和“刺使”的发音最为接近，所以诸怡庵的官职很可能是按察使。

搞清官职其实已经意义不大。因为有《储庆寺记》碑文在，诸怡庵从洪州任上解俎归来，已是言辞凿凿。诸怡庵在任上如有犯案，是绝无全身而退带着金银回归故里可能的。由此可以推断他或是受到同僚倾轧，或是不满官

场黑暗，辞官归田。无论哪种情况，都足以说明诸家父子已看破红尘，但求太平蛰居。

其三，108 亩良田不是一个小数目，当视为诸家几代人积累。身为八世祖伯颜公（生于洪武壬子 1372 年）育有儿子六人：思禄、思恩、思寅、思象、思观和思毓，作为长子思禄公要把一笔巨额祖产捐出去，是要有很大的决心和担当的。据笔者回忆，小时候曾隐约听长辈们讲起，金岙寺院是诸家先祖修建的，每逢寺院大典或岁末年初，父亲都要背着年幼的笔者去寺院参加佛事。长辈们还说到，先祖赠送给寺院的田由族内各家轮流耕种，每年收成后除了留足口粮和种子外，余下的由寺院安排僧人口粮，调剂诸氏一族灾年余缺。所以《储庆寺记》中有云：“僧人知林泉之福，而不知施主之福。地之由施主崇而福，而不知施主之福其福也。生能同其福，殁能立以祠者，施主也。施主谓谁？太主思禄公也！”（见附件）足见此言非虚，可与笔者幼时所闻相印证。

由此可见，诸思禄作出重修寺院和捐赠良田的决定，决非一时兴起，而是有着现实和长久考量的。把家产留给后代，难免吃用一空，挥霍殆尽。不如交给寺院，反倒成全了礼佛利家的好事一桩。

历代诸氏先祖在从文、尚武、出仕，为国效力的同时，礼敬佛事已成风尚。无独有偶。十一世阳泰公（名杰，字春浦），于明嘉靖初年（1522 年）也建一僧院“金山寺”于今址，并“施肥田 18 亩以供僧火”。先祖中更有直接出家当和尚者，可谓与佛之渊源深厚了。

五、今日之储庆寺

改革开放以来，临江镇的社会经济步上了快车道，人口也得到了大发展。如今已发展为一个拥有两万余人常住人口的大镇。据 2009 年 3 月前统计数字 17755 人，散居在全国和世界各地的临江人更以数千人计，下辖后支、前盈、驿头、仁地、金岙、巽岙等 16 个行政村。全镇侨居国外户数共 728 户，达 1794 人，主要分布在欧洲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地。改革开放以来外出到全国各地的户数达 1715 户，5274 人。其中后支村计 121 户，占 7%；357 人，占 6.8%。寺院的建设和发展，获得了海内外众多信众的资助。储庆寺于 2008 年 9 月获得政府部门立项批准，先后在原址建起了大雄宝殿、天王殿（2009 年）、观音殿（2010 年）等，目前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

(本文作者系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国际美术交流协会理事、杭州知青书画院院长、浙江工商大学客座副教授)

附件:

储庆寺记 ——仿《醉翁亭记》

寺在金岙锁马岱之下^①，洗觉溪之上^②，前名金峰庵。吾太祖思禄公由子怡庵公刺史解俎归来，重构此寺，并施田百有八亩，以供佛火，更名储庆寺。僧感遗爱，立祠堆像，以祀迄今，馨香勿替。爰为之录，而托之载诸家乘，聊表太祖之微意。

云尔：环溪皆山也，其金皇诸岙，钟毓独奇^③，望之耸然，而灵秀者马岱也，径曲兮通幽，竝（同并）有源泉混混（同滚）而流出洞桥之外者，莺溪也。溪迴路转，有庵敞然峙于溪上者，金峰庵也。创庵者谁，山之僧也，更名者谁，施主之意也？施主解俎重造梵宫，造化有庆，而人又氏诸，故也自名曰储庆寺也。储庆之意，非邀福在乎林泉之间也。林泉之胜假之禄而寓之福也。若夫莺迁而仁里，连萼而光山，比祖宗积德者，寺邻之孙吴也^④。甌盖接于妾扇^⑤，稻仓压于芭蕉^⑥，黄坤尖峙三祝岭之南山者^⑦，寺林之四旁也。山而明，水而秀，四旁之胜良多，而福也无穷也。

至于朝则茹乎素，春则宣乎经，钟则叩，磬则鸣，罢蕘贝叶，披衲而盘旋者，众梵唱也。旁（野）有田野，平而（田）饶^⑧，酿稻为醴，稻香而醴浓。溪毛涧藻，杂而荐涓者，施主惠也。惠化斯民，非暮非邀。近者悦，远者来。士女顶俎豆而馨香者，众民祷也；乌帽青山主乎其中者，施主唱也。由是修德获报，幽光必发。施主逝而孝慈出也。堂构深严^⑨，祖孙遗爱。施主庆，而僧人福也。

然僧人知林泉之福，而不知施主之福，地之由施主崇而福，而不知施主之福其福也。生能同其福，殁能立以祠者，施主也。施主谓谁？太主^⑩思禄公也！

【原文注】

①时太祖购寺，每跨马考工，即纵马系此山中。待暮，仍跨马而回，故

取名也。

②莺名山鹊，知来事，俗云长尾巴鸟。此溪常有此鸟洗身，故名。

③金岙、皇岙俱地名。皇岙在邹湾，现有庙在，俗名皇岙殿。

④“时有金岙孙氏，仁地吴氏”云，此处所说祖上积德者后世当有福，就像仁地的孙、吴二家。我爷爷亦平的原配夫人吴氏即系仁地的吴家。

⑤⑥⑦此处均为寺院前后的几座山名。（笔者注）

⑧此两处括号内的“野”和“田”二字原文有，然我以为是抄录者笔误。似无须此二字。（笔者注）

⑨指储庆寺代有诸氏子孙修复。

⑩“太主”之称，按当地习惯，一般是相隔四代的后辈对太爷爷的称谓。或可说明这篇传记为思禄公之后第十三世诸周百所著？周百生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

温州瓯海关的前尘往事

小科

鹿城方志

九〇

最近，温州市区望江路在整改，有很多老旧的房子被拆除，其中有一座望江路 50 号西式建筑的大楼也在拆除的范围内。这座大楼看起来平常无奇，之前是温州市公安局水上分局，然而在一百多年前的温州城里却是鹤立鸡群，而且在当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它是晚清温州瓯海关的办公楼。

1876 年，温州因《烟台条约》成为新增的四个开放城市之一。1877 年 1 月，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委派英籍税务司好博逊（H. E. Hobson）筹设瓯海关，同年 3 月 2 日，英籍税务司好博逊来到温州，把海关关址选定在朔门附近沿江岸边。4 月 1 日温州海关建立，从此温州成为名副其实的商埠。温州海关始称温海关，半年后改称瓯海关。

好博逊也就成为了瓯海关第一任税务司，不过好博逊在温州的任职并不长，1877 年 11 月 7 日，好博逊离职。

这里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海关本身是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机构，为政府征税，那么当时中国的海关为什么由一个外国人担任税务司，管理海关税收呢？这个就不能不回顾晚清糟糕的历史以及一个不能不提的关键人物——英国人赫德（Sir Robert Hart）。1863 年赫德开始出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首任为英国人李泰国），直至 1911 年，主持清政府的海关长达近半个世纪（48 年）之久。在赫德任内发展和完善了中国海关的建设，结果成为清政府最高效、最廉洁的行政部门。

东瓯旧事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本有“土著”海关建制。乾隆二十二年（1757）确定广州单口贸易制度后，朝廷即令粤海关统一管理行商交易，征稽关税。但旧海关的技术相当草率，收入也较少，乾隆末年粤海关每年账面收入

不过 110 余万两白银，仅占岁入的 3%。所以，朝廷也并不重视海外贸易。1842 年后，单口通商变为五口，朝廷仍以旧海关负责人在新开埠地区筹建新关，并以两广总督兼任管理，实质仍是老一套。这五个海关人手既不足，又缺乏统一章程，自然难有业绩。

1853 年 9 月，小刀会起义军攻占上海县城，苏松太道兼江海关监督吴健彰缒城而走，江海关衙门也遭洗劫。如此一来，洋商乘机拒纳关税，并向英法等国代表寻求许可。但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认为：取消关税将在各国商人之间引起恶性竞争，对市场稳定不利；清政府与欧美各国关系尚处于微妙阶段，明火执仗地侵害中国利权会带来冲突。为体现公允，英法美三国领事决定在租界成立一个具有国际色彩的新机构，“暂代”瘫痪的江海关执行关税征收和缉私任务；作为回报，两江总督怡良批准洋货只缴纳一次进口税，在内地流通不必另行纳税。

由此可见，西方人非常注重贸易流程的公平化，否则可以带来短期的利益激增，但是会影响平等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1854 年 7 月，新的江海关在苏州河北岸挂牌办公，它的章程出自英国驻沪代理副领事、22 岁的李泰国(Horatio Lay)之手，规定：英法美三国领事每人可推荐一名外籍人士担任税务司（最初为领事代表），由他们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作为单一体联合行动；税务司可以自由调阅、核对海关文书账册，所有公文非经其副署不得公布；任何装卸货物准单、税款收据、结关准单或其他正式文件非经税务司副署，不得签发或使其生效。1855 年，李泰国本人成为江海关英籍税务司。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因为通商口岸增加到 15 个，李泰国竭力说服新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把江海关制度推广到其他商埠，获得恭亲王首肯。1861 年，总理衙门正式委任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统领各口岸新设海关。

但是李泰国过于器张跋扈，超越了清政府的底线，最终为清政府所不能容忍，1863 年 11 月李泰国被解职，留在北京替他代管日常工作的赫德因祸得福，接替了其职务。这一年赫德不过 28 岁，已经由清廷加按察使衔、成为三品大员；1869 年又晋级布政使，官阶从二品。从此，开启了晚晴海关——赫德时代。

与骄横狂的李泰国相比，赫德谨慎温和，他在上任之初致信各口岸税务司，要他们对中国官员以礼相待，并敦促本国商人服从管理。在注重礼仪

和形式的中国官场，这种谦卑的姿态显然非常吃得开。

不过“中国海关”本质上又是一个国际化的独立王国，人事、行政权力都由外籍雇员掌控。1865年全国14个新关共有报检员以上中高级雇员71人，其中英国人46名，美国、法国人各9名，其余德意志人5名，丹麦、瑞士人各1名。英语是海关内部的工作语言，一切报表、公文都以英语起草。为防止舞弊，赫德对各地分关实行垂直统一领导，进出口货物须按章征税，申报、查验、估税、审核、征税、交款直至验放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章程作为依据。中国政府既无从插手、又不通内情，使得海关意外保持了高效和廉洁，与清廷的颟顸腐败形成鲜明对比。

从清政府角度上看，为什么会允许赫德大包大揽，和1850年代以来国家财政的动荡不无关联。太平天国战争之前，国家税收大宗来自田赋，每年收支大致相抵，清廷自不会对仅占岁入3%的关税太过上心。但席卷16个行省的“太平天国暴乱”在起事第一年就耗尽了户部存银，加之作战省份无法解拨京饷，中央财政事实上已经瘫痪。与此相反，伴随通商口岸的增加和管理规章的建立，洋税收入逐年见增，成为一项规模可观的财源。和名目繁多、操纵在地方督抚之手的厘金（内地商业税）相比，关税的来源更为清晰，中枢自可以更方便地掌控。鉴于赫德“虽系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顺，语言亦多近礼”（恭亲王语），清廷也就不打算插手他们完全不熟悉的海关业务，以免引发财政动荡，而让赫德的人马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于是，从1865年到1875年，海关岁入由白银830万两稳步增加到1200万两，1885年更增至1450万两；而当时的账面岁入不过银6000万两左右，洋税已占近20%。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赔偿英法的1600万两军费即由关税收入拨出。

1866年后，对外赔款已经付清，六成洋税便由朝廷分拨给各省，用于中央直辖的自强事业。如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及船政学堂、天津机器局、长江口至南京下关等9处炮台以及后来的京师同文馆、幼童赴美留学等项目，经费均来自海关。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朝廷又从六成洋税中每年拨出400万建设海防。左宗棠在西北用兵所耗1470万两的英国贷款也系以关税作为担保。

由此，赫德也创造了“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大清海关”，1911年，赫德去世，还被清政府赏加太子太保銜。随着赫德的离去，大清也落下了她的帷幕。但是，海关税务总司依旧在洋人的管理之下，一直到1950

年，美国人李度（Lester Knox Little 1892-1975 年）的卸任，最终结束了洋人执掌中国海关税务总司的历史。

中国海关历任英美籍总税务司（1859 年—1950 年）

- 1.[英]李国泰（H. N Lay）公元 1859 年至 1863 年，实任。
- 2.[英]费子洛（G.H.FitzRoy）公元 1861 年至 1863 年，代理。
- 3.[英]赫德（Robert Hart，1835 年 1 月 20 日 -1911 年 9 月 20 日），公元 1861 至 1863，代理；1863 至 1911 年，实任。
- 4.[英]裴世楷（R.E.Bredon)公元 1908 年至 1910 年，代理。
- 5.[英]安格联（Francis Aglen）公元 1910 年至 1911 年，代理。1911 年至 1929 年，实任。
- 6.[英]梅乐和（Frederick Maze，1929 年—1943 年）。
- 7.[美]李度（Lester Knox Little，1943 年—1950 年）。



正是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之下，随着 1876 年烟台条约的签订，1877 年温州正式开埠，4 月 1 日，近代历史上温州第一个海关正式出现，从此温州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温州发生的这一刻变化比新中国 1978 年的改革开放还要早整整一百年，这也使得温州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比同时期的很多中国人更早观察和了解

到西方世界。

一度寂寞的东南小城，惊诧地开眼看世界，重新坐上了大航海时代的对话圆桌，迎接世界。

面对风口浪尖，所有风吹草动都牵系着瓯江两岸。

1877年4月，英国首任驻温领事阿尔巴斯特（阿查理）乘英舰“莫斯特克”号抵达温州，他一眼就相中了江心孟楼——这座相传为纪念唐代诗人孟浩然而建的建筑。18年后的1894年，江心屿东塔山下的新领事馆建成。

第一艘进港的英国怡和洋行商轮“康克斯特”号自上海满载棉布等洋货驶入温州。1878年，中国招商局“永宁”轮自沪抵温，开通宁波、福州、厦门、汕头等沿海港口，以及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航线。温州轮船招商局也不甘落后，在朔门建起了第一座浮码头。

温州开埠后，各国外交官、商人、传教士纷至沓来。西风东渐，新式学校、医院、报刊和邮电局纷纷出现，以及思想观念、生活习俗、衣食住行都打上“洋”字烙印。

西方的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建筑风格与温州本土的营建技术水乳交融，蔚为大观。电灯、通讯、摄影、电影、交通、餐饮、新式报刊、新式婚礼以及洋火、洋油、黄包车等开始流行，形成了崭新的时代风尚。一批使用机器加工的工厂崛起，以吴百亨、李毓蒙等为代表的民族工业的领军人物脱颖而出。

根据温州文史爱好者吴旭东《晚清瓯海关的人与事》一文的描写，1886年7月12日，赫德乘海关巡逻艇凌风号来温视察，翌日离温前往福州。那时，著名传教士苏慧廉与妻子苏路熙在温州生活，赫德是他们夫妇俩的好友，曾在北戴河度假时共处过，现在温州又得以重逢，大家自然是倍加开心的。

那天，赫德坐在这座温州海关办公楼里听取税务司的汇报，从窗口望出去，瓯江奔腾不息，对岸青山连绵起伏。他不知道的是，在他走后，苏路熙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对岸瓯北的一座山峰，叫“赫德峰”。吴旭东后来亲自去瓯北大田山考察并发现了一个刻着“海关总税务司”的石碑。另外据说，这样的碑有好几个，立在山上不同的位置。据此推断，大田山应该就是“赫德峰”，“海关总税务司”碑立在山的四界，作为界碑。



根据瓯海关档案记载，从 1877 年 4 月至 1949 年 5 月瓯海关历任税务司（代理税务司）总共有 46 人。首任温州海关税务司为英国人好博逊（H.E. Hobson）

1877 年 1 月 3 日，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委派英籍税务司好博逊（H.E. Hobson）筹设瓯海关。好博逊奉命后，即于 3 月 2 日乘海关巡逻艇“凌风”号抵达温州。他在温处道方鼎锐的协助下，对瓯江沿岸一带进行视察，“凌风”号船长弗洛（Farrow）对港内航道作了半个月的测量，最后，好博逊把关址选定在北门城外沿江岸一带（今望江路老港务码头）。4 月 1 日温州温海关建立（后改名为瓯海关），温州港正式对外开放贸易，开关征税。1877 年 11 月 7 日，好博逊离职。

从开关至同年 9 月 30 日为第一税收年度，本年税收系 67.68 两结征收数。而据瓯海关历年税收统计表得知 1877 年税收总计为：2656 库平两。1878 年税收总计为：2992 库平两。1879 年税收总计为：5480 库平两。1880 年税收总计为：11344 库平两。1881 年税收总计为：11941 库平两。

根据 1877 年瓯海关贸易报告：进口货物有棉制品，五金，杂货，鸦片。出口货物有茶叶，橘子、药材、笔杆、木炭、板子。1877 年出口贸易货值为：18117 关平银两，进口贸易货值为：255737 关平银两，减复出口值

10328 关平银两，总值为：263526 关平银两。

除了首任瓯海关税务司好博逊（H.E.Hobson）之外，今天我们从史料中还可以看到另外几位曾经担任过瓯海关税务司外籍人士的相关资料。

瓯海关第九任税务司孟国美（P.H.S.Montgomery）系英国人。1876 年入中国海关，1888 年 10 月任头等帮办。先后任职津海关、台南海关、苏州海关、亚东海关、瓯海关税务司。1889 年 9 月 25 日至 1891 年 4 月 3 日任温州瓯海关代理税务司。

清光绪六年（1880 年）正月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动工，德璀琳事必躬亲，特别是材料采办、施工质量，德璀琳亲自检验监督。同时还从津海关抽调熟悉施工、营造的华洋关员参与设计与管理，有税务司带头，这些关员们更是“勤奋趋公，异常劳瘁”，并且“概不另领薪俸”。这让李鸿章大为感动。他上书朝廷替德璀琳等津海关人员请功，给德璀琳颁了个头等宝星勋章，帮办贾雅各、欧森赏赐五品顶戴花翎，孟国美赏给二等宝星勋章并五品顶戴，以下人等皆有赏赐。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成立，根据《马关条约》，苏州辟为通商口岸，遂设海关于交通要津之灭渡桥外。苏州关管辖范围为嘉兴以北，丹阳以南，昆山以西，设税务司总领其事，首任税务司为英国人孟国美，现存三栋西式别墅式建筑，建筑南向，均为红瓦尖顶，红砖外墙。占地 2436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774 平方米，东为二层楼，平面近凹字形，西为三层，中为平房。建筑内设壁炉，屋顶烟囱高耸，东西两楼南北立面变化丰富，为较有代表性的英国风格的近代建筑，相传曾为当时税务司署高级公寓。见《苏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清光绪十五年 1889 年 9 月 25 日至光绪十七年 1891 年 4 月 3 日任温州瓯海关代理税务司。孟国美（P.H.S.Montgomery）著《温州方言入门》（Introduction of the Wenchow dialect），1893 年由别发洋行出版。

瓯海关第十二任税务司那威勇(A. Novion)系法国人。1863 年进中国海关，先后任职天津、镇江、汉口等地海关税务司。1892 年 4 月 26 日至 1900 年 3 月 25 日任职瓯海关税务司。

1875 年任职汉口海关税务司。

1876 年 12 月 26 日总税务司第 12 号通令：公布筹备 1878 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代表团名单，团长赫德，下分三组，A 组负责在华准备收集展品，有：

吉罗福、德瑾琳、裴式楷；B组负责在巴黎的前期安排，有：赫政、金登干、那威勇；C组参加博览会代表团成员名单(尚未定)。

那威勇留在马赛负责接收中国展品：哲美森在巴黎领导中国工匠和一些法国工人修建中国展馆和布置展区。

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温州设立邮局，瓯海关税务司那威勇（法国人）兼首任邮政司。

瓯海关第十五任税务司史纳机（J.F.Schonicke）德国人。一八六九年进入中国海关，曾任琼州海关头等帮办。朝鲜仁川海关税务司，朝鲜海关代理总税务司。广州海关税务司。1900年4月19日至1900年5月16日，上海邮政总局兼职邮政司等职。一九零三年四月十七日至一九零四年五月五日曾任瓯海关税务司，同年退休回德。

1885年10月，赫德根据墨贤理的请求，将朝鲜海关不妥各员遣散，另派头等帮办史纳机（J.F.Shoenicke 德国人）署理仁川关税务司，头等帮办帛黎（T.Piry 法国人）署理釜山关税务司（后帛黎调至总署，由何文德继任釜山关税务司），二等帮办格类（E.F.Creagh 英国人）署理元山关税务司，并派二等帮办何文德（J.H.Hunt 英国人）、三等帮办富日阿（Fougret 法国人）、三等帮办李蔚良（W.G.Lay 英国人）等在各关充当帮办人员。经过这次大换血，朝鲜海关“比较高级的职位都逐步由调自中国海关的人员担任”。

1889年11月，墨贤理离开朝鲜，海关总税务司职务由仁川关税务司德国人史纳机担任。在史纳机担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期间，美国人李仙得（Le Gendre Charles W.）积极怂恿朝鲜国王摆脱中国，独立自主，深得国王宠信。当时传闻李仙得将向日本贷款二百万，以朝鲜海关为抵押，并由李出任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听到传闻后，立即指示史纳机，万一朝鲜“有裁撤之议，则应坚守不让不离”，后又再次指示史纳机“无论他人来索关务，概不交付，各口亦不许韩派一人”，坚决抵制其它国家向朝鲜海关渗透势力。正是在史纳机和清政府驻朝大臣袁世凯的合力对付之下，李仙得夺取朝鲜海关总税务司职位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琼海关职员（The Kiungchow Customs staff, 1898）

照片上共有22人，8名外国人，14名中国人。

1.一号船员（No 1 Boatman）

2.过磅员（Weigher）

- 3.过磅员 (Weigher)
- 4.办公室三号听差 (Office Boy No 3) 阿云 (Ah Yun)
5. (W. Prutchnow), 二等稽查员 (2nd Class Tidewaiter)
- 6.灯塔员 (H Atkinson, Lightkeeper)
- 7.助理检验员 (R. Henkel, Asst. Examiner)
- 8.一等稽查员 (T. Shirdan, 1st Class Tidewaiter)
- 9.监察员 (W. Forsaith, Tidesurveyor)
- 10.高级帮办 (Dr J.H. Lowry, Senior Assistant)
- 11.低级帮办 (R.F.C.H., Junior Assistant)
- 12.宋迎春 (Sung Ying-ch' un, Chinese Clerk)
- 13.税务司办公室听差 (Head Office Boy) 阿连 (Ah Kl ê n)
- 14.吕先产 (Lü Chien-ch' an, Shupan), Shupan
- 15.书记员董林 (Tung Lin, Writer)
- 16.办公室二号听差 (No 2 Office Boy)
- 17.沈进群 (Sh ê n Chin-k' un, Shupan)
- 18.邮政员孙康峰 (Chun Kang-f ê ng, Postal Clerk)
- 19.二号船员 (No 2 Boatman)
- 20.职员戴挺佩 (Tai T' in-pui, Clerk)
- 21.职员陈申五 (Chan Shen-wo, Clerk)
- 22.税务司史纳机 (J.F. Schoenicke, Commissioner) 德国人

瓯海关第二十任税务司阿歧森 (S.Acheson) 系英国人。他先后在梧州海关、琼州海关、瓯海关等地任职税务司。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三 (1897 年 2 月 4 日), 清朝廷与英国政府签订《中英续议缅甸条约》附款条约规定: “今彼此言明, 将广西梧州府、广东三水县城、江根圩开为通商口岸, 作为领事官驻扎所。” 广西梧州成为对外通商口岸; 五月初四日 (6 月 3 日), 梧州正式开埠。当天, 英国就派领事驻扎, 划河西三角嘴白鹤山一大片地建领事署。第二天便成立梧州海关, 地址在梧州大东桥下。首任税务司是英人阿歧森, 关员由英人、葡萄牙人充任, 控制着梧州海关和府关。开埠后, 外国轮船直达梧州; 英国的渣甸、天和、人和 3 洋行在梧州开设分行, 很快即垄断了西江航运。梧州关自设关至 1949 年的 53 年中, 由外国人任税务司 47 年。梧州关在前 36 年, 对外贸易入超达 11553 万两关平银; 而从 1933 年至

1944 年的 11 年，入超又达到了出口总值的 7 倍。

1914 年 4 月 27 日至 1916 年 11 月 7 日，阿岐森（S.Acheson）出任温州的瓯海关税务司。当时的瓯海关监督是冒广生。此时的税务司阿岐森在海关任职已经近二十年时间，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海关高级管理人员。

瓯海关第二十一任税务司谭安（C.E.Tanant 1865--?），法国人，系清末民初中国海关聘用的高级职员，亦是当时颇有实力的外籍资深集邮家，其具体生卒时间不详，大约出生于 1865 年前后。根据惟一与谭安有过多交往的中国集邮家姜治方的生前记载，此人自 10 岁起即开始集邮，他收集全球邮票及实寄封、片乃至印花税票、珍稀古币等。不过，琳琅满目的各种早期华邮，无疑是他收集成果中最值得骄傲的部分。

青年时期的谭安，由法国前驻英国大使瓦亨顿介绍，经过“大清海关”驻伦敦办事处考试合格，于中法战争结束两年之后的 1887 年 7 月来华，获得“大清海关”英籍总税务司赫德的首肯，踌躇满志地进入主要由英国人控制的“大清海关”任职。最初，获任驻广州的粤海关“四等帮办后班”，并有了一个固定的汉文名“谭安”。他努力学习中文，颇有长进，并得到赫德的赏识，担任过京都同文馆法语教习、署理邮政副总办，又先后在芜湖海关、上海江海关、湖北沙市海关、广东三水海关、重庆海关、蒙自海关、岳州海关任职，并在 1916 年到 1921 年之间，担任第二十一任瓯海关税务司长达 5 年之久。也正是在此期间，时过中年的谭安告别了长期的单身生活，迎娶当地的浙江温州女子为妻，在温州组成了一个“中西合璧”式的家庭，后来他们有了一个中、法混血的女儿。

从 1916 年至 1920 年温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分九个方面：本关课税、洋货贸易、土货贸易、出入内地之货、船只、旅客、金银、药土、杂论，都是由瓯海关税务司谭安论述呈报。大约 1921 年前后，谭安又被调到 18 年前曾经任职过的上海江海关，但可能出于个人或家庭的原因，他离任休假了 1 年多。1923 年 4 月 16 日，谭安最后一次得到总署的调令，来到设于福建三都澳（现属宁德市）的福海关任税务司。不过，当年 10 月 31 日他即离职退休，在获得一笔丰厚的养老金后，携妻女二人及内容丰富的个人藏品衣锦还乡，从而结束了在华 36 年的海关职业生涯。

早期，出任各地海关的税务司的都是由外国人担任，但是随着晚清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中国人与西方接触更多地加深，逐步有一些中国人开始进

入海关任职，从基层雇员到管理层，随着他们的优异表现，最终出现了中国海关史上第一个华人税务司——夏廷耀（温州人）。

夏廷耀（1892—1949），字雄尘，浙江永嘉碧莲人。少时就读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温州艺文学堂，1912年考入北京税务专门学校，大学学习三年，家境困难，边工边读，1915年毕业，成绩优异，被保送宁波海关工作，当时已二十三岁。1918年调长沙海关。1920年任杭州海关税务司帮办。1922年，调嘉兴海关，以作风正派，治事严谨升任代理副税务司，为中国海关史上第一个华人税务司。

1926年调任上海海关，1932年调任福州海关副税务司，1934年10月调任龙口海关，1944年出任兰州海关税务司，1948年4月22日调回家乡温州出任瓯海关税务司，1949年3月27日在职时因脑溢血逝世。

1877年4月至1949年5月瓯海关历任税务司名录
(瓯海关档案)

序号	职务	姓名	国籍	任职时间	接任时 职衔	附注
1	税务司	好博逊 H.E.Hobson	英	1877.4.1— 1877.11.7	税务司	
2	代理税务司	马吉 J.Mackey	英	1877.11.8— 1881.12.11	一等一级帮 办	
3	代理税务司	贺璧理 A.E.Hippisle	英	1881.12.12— 1882.4.23	代理税务司	
4	代理税务司	德达那 G.d, Arnoux	法	1882.4.24— 1886.5.11	一等一级帮 办	
5	税务司	惠达 F.W.White	英	1886.5.12— 1886.10.1	税务司	
6	代理税务司	白来喜 J.R.Braziey	英	1886.10.2— 1888.3.23	二等一级帮 办	
7	代理税务司	柯尔乐 F.A.Carl	美	1888.3.24— 1889.1.10	副税务司	
8	代理税务司	聂务满 J.Neumann	德	1889.1.11— 1889.9.24	代理税务司 (二等一级 帮办)	

续表

序号	职务	姓名	国籍	任职时间	接任时 职衔	附注
9	代理税务司	孟国美 P.H.S.Mont-gomery	英	1889.9.25— 1889.4.3	一等二级帮 办	
10	代理税务司	李明良 A.Lay	英	1891.4.4— 1892.3.15	代理税务司	
11	代理税务司	阿岐森 J.Acheson	英	1892.3.16— 1892.4.25	一等一级帮 办	
12	税务司	那威勇 A.Novion	法	1892.4.26— 1900.3.25	税务司	
13	暂代税务司	富日阿 J.H.Fougerat	法	1900.4.23— 1903.4.16	三等一线帮 办	
14	代理税务司	李明良 A.Lay	英	1900.4.23— 1903.4.16	代理税务司	
15	税务司	史纳机 J.F.Schoenicks	德	1903.4.17— 1904.5.5	税务司	
16	代理税务司	穆厚达 J.H.M.Moorhead	英	1904.5.6— 1908.4.21	代理税务司	
17	代理税务司	师范西 F.J.Smith	英	1908.4.22— 1908.10.30	代理税务司 (副税务司)	
18	暂代税务司	沙博思 H.J.Sharples	英	1908.10.31— 1909.1.13	二等二级帮 办	
19	代理税务司	包来翎 C.T.Bowring	英	1909.1.14— 1914.4.26	代理税务司 (超等一级 帮办)	
20	税务司	阿岐森 S.Acheson	英	1914.4.27— 1916.11.7	税务司	
21	税务司	谭安 C.E.Tanant	法	1916.11.8— 1921.4.24	税务司	
22	税务司	阿拉巴德 E.Alabaster	英	1921.4.25— 1922.5.8	税务司	
23	代理税务司	威立师 C.A.S.Williams	英	1922.5.9— 1925.4.12	代理税务司 (超等二级 帮办)	

续表

序号	职务	姓名	国籍	任职时间	接任时 职衔	附注
24	暂代税务司	卜朗 I.S.Brown	美	1925.4.13— 1925.5.14	四等一级帮 办	
25	代理税务司	裴纳玘 E.Bernadsky	俄	1925.5.15— 1927.4.18	代理税务司 (超等二级 帮办)	
26	暂代税务司	吴兆熊	中	1927.4.19— 1927.10.21	三等二级帮 办	
27	代理税务司	铃木藤藏 T.Suzuki	日	1929.10.22— 1929.7.27	代理税务司 (副税务司)	1929.7. 27 在职 时病亡
28	暂代税务司	谢永软	中	1927.7.28— 1929.9.10	二等二级帮 办	
29	代理税务司	张伯烈	中	1929.9.11— 1931.4.26	代理税务司 (副税务司)	
30	税务司	周子衡	中	1931.4.27— 1933.5.24	税务司	
31	代理税务司	杨明新	中	1933.5.25— 1934.3.25	代理税务司 (超等一级 帮办)	
32	暂代税务司	李可任	中	1934.3.26— 1934.4.20	二等一级帮 办	
33	税务司	克萨梯 A.Casati	意	1934.4.21— 1934.9.20	税务司	
34	暂代税务司	李可任	中	1934.9.21— 1934.10.25	二等一级帮 办	
35	税务司	莫尔根德 H.C.Margan	英	1934.10.26— 1935.4.19	税务司	
36	代理税务司	马多隆 E.A.Macdonald	英	1935.4.20— 1936.4.29	代理税务司 (副税务司)	

续表

序号	职务	姓名	国籍	任职时间	接任时 职衔	附注
37	代理税务司	德世堪 S.Toscani	意	1936.4.30— 1936.11.6	代理税务司 (副税务司)	
38	暂代税务司	乔汝镛	中	1936.11.7— 1937.1.3	超等二级帮 办	
39	税务司	莫尔根 H.C.Morgan	英	1937.1.4— 1941.1.12	税务司	
40	代理税务司	葛敦诺 W.A.B.Gardener	英	1941.1.13— 1943.9.13	副税务司	
41	税务司	陈祖 禾巨	中	1943.9.14— 1946.1.20	税务司	
42	税务司	李秉光	中	1946.1.21— 1946.4.23	副税务司	
43	暂代税务司	宋克诚	中	1946.4.24— 1948.4.21	税务司	
44	税务司	夏廷耀	中	1948.4.22— 1949.3.27	税务司	1949.3. 27 在职 时病亡
45	暂代税务司	麦僖曾	中	1949.3.28— 1949.4.24	二等二级帮 办	
46	代理税务司	李秉光	中	1949.4.25— 1949.5.6	代理税务司 (副税务司)	

1877 年 4 月—1945 年 1 月瓯海关历任监督名录
(瓯海关档案)

序号	姓名	任 期	任命机关	附 注
1	方鼎锐	1877.4.1-?	清政府	任期间的税务司为好博逊、马吉
2	温忠翰	不详	清政府	任期间的税务司马吉、贺壁理、德达那
3	蒋国楨	不详	清政府	任期间的税务司为德达那
4	唐树森	不详	清政府	任期间的税务司为德达那、惠达
5	苑池	不详	清政府	任期间的税务司为惠达、白来喜、柯尔乐
6	王景澄	不详	清政府	任期间的税务司为柯尔乐
7	苑池	不详	清政府	任期间的税务司为孟国美
8	李光久	不详	清政府	任期间的税务司为孟国美、李明良
9	赵舒翹	不详	清政府	任期间的税务司为李明良、阿岐森、那威勇
10	王祖光	1900—1901	清政府	
11	童兆蓉	1901—1905.8.5	清政府	
12	锡纶	1905.8.6—1905.9.6	清政府	官衔为花翎三品顶戴兼护浙江分巡温处兵备道监督瓯海关
13	程恩培	1905.9.7-?	清政府	官衔为二品顶戴署理浙江温处海防兵备道监督瓯海关，任期间的税务司为穆厚达
14	贺元彬	? -1908.10.7	清政府	任期间的税务司为穆厚达、师范西
15	启续	1908.10.18—1908.11.8	清政府	官衔为赏戴军功花翎兼护温处道监督瓯海关

续表

序号	姓名	任 期	任命机关	附 注
16	黄祖经	1908.11.9-1909.7.29	清政府	官衔为二品衔署理浙江分巡温处兵备道监督瓯海关
17	郭则云	1909.7.30-?	清政府	官衔为二品衔接受浙江分巡温处海防兵备道监督瓯海关，任期间的税务司为包来翎
18	冯学典	? -1910.11.1	清政府	任期间的税务司为包来翎
19	恽流珂	1910.11.2-1911.2.14	清政府	官衔为二品衔赏戴花翎署理浙江分巡温处兵备道监督瓯海关
20	郭则云	1911.2.15-1911.11.7	清政府	辛亥革命爆发后，即于 11 月 8 日留下印信，次日逃离温州
21	梅占魁	1911.11.8-1912.5.31	(临时兼任)	原系温处巡防统领,1911 年辛亥革命后,即于 11 月 8 日暂时担任温州临时军政分府负责人
22	陈范	1912.6.1-1912.9.15	浙江都督府财政厅	
23	姚志复	1912.9.16-1913.3.28	浙江都督	
24	冒广生	1913.3.1-1917.11.30	北洋政府大总统	
25	徐锡麒	1917.12.1-1919.2.28	北洋政府大总统	
26	周嗣培	1919.3.1-1922.3.22	北洋政府大总统	兼任温州交涉员，死于任期内，曾一度由欧阳保筱暂代
27	胡惟贤	1922.3.23-1924.8.15	北洋政府大总统	兼任温州交涉员
28	蒋邦彦	1924.8.16-1924.10.15	北洋政府大总统	兼任温州交涉员

续表

序号	姓名	任期	任命机关	附注
29	杨承孝	1924.10.16-1925.3.11	闽浙巡阅使兼浙江督理	兼任温州交涉员
30	程希文	1925.3.12-1925.4	浙江督理	兼任温州交涉员
31	高尔登	1925.4-1925.6	北洋政府临时执政	
32	程希文	1925.6-1927.1.29	北洋政府临时执政	
33	刘强夫	1927.1.30-1927.3.7	国民革命军浙江省防军司令部	兼任温州交涉员
34	徐乐尧	1927.3.8-1927.10.31	第二十六路国民革命军司令部	
35	庄智焕	1927.11.1-1927.12.23	国民政府	兼任外交部温州交涉员
36	何家猷	1927.12.24-1928.2.29	国民政府	兼任外交部温州交涉员
37	贝志翔	1928.3.1-1935.10.20	国民政府财政部	兼任瓯江口内地税局局长
38	徐鸿宾	1935.10.21-1940.8	国民政府财政部	
39	陶承润	1940.8-1945.1.31	国民政府财政部	



图选自《温州老照片》一书

(本文内容由相关资料汇编而成，部分数据有待商榷，如有错误，欢迎指正。——作者)

“夫书者，玄妙之技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

——(传)东晋·王羲之《书论》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又不易谈好的话题。

现在回头再来说这个话题，是因为近日美术史论家陈传席先生在北京办了一场书法展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想起一年前陈先生的一篇宏文《书法是文化不是技术》，又翻出来看看，联系学界近年颇多类似的议论，不由生出许多想法。

上了年纪的人喜欢谈文化，劝年轻人多读点书，是一种正确的姿态。但文化的内涵又太过庞大，以至于许多相关的论调很容易成为正确的套话、大话，譬如类似于“书法是一种文化而不是技术”的论断恐怕就很难严谨而周全，事实上于事无补，我们先来聊聊一些具体的问题。

一、技法的性质

这里引一段陈先生的话：

“书法的技巧如果不故弄玄虚的话，一天就讲完了，但练起来却是一辈子的事情。技巧占5%，学问要占95%。没有文化，书法基础只能越来越差。”（陈传席）

在大多理论表述中，“技”与“道”是割裂的，似乎“技”是固定、静态、可以被量化的东西，是一个可以被使用最后被舍弃的通道，不是那么重要。类似于“技进乎道”、“舍筏登岸”这样的描述。而在实践的进程中，我们发现这样的理论却是不成立的。技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技与道共生共进，不断进化，没有一成不变的技，也没有超乎技法之上的道。更为深层的发现是，技的认识、选择与实施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道，从这

个意义上讲，过程就是结果。具体而言，在书法创作中，书写行为本身就是道的展现，这是书法艺术本身重要的魅力之一。

可以肯定，粗陋浅薄的书法作品是不可能有高明的技法支撑的。

如果，我们姑且把这个“道”看成是陈先生所说的“文化”，那么我们在实践中合理、高明地使用的这些“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因此，将技法与文化割裂来谈书法其实是一种外行。当然，事实上这里的“道”还不仅仅只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

二、书以体道

书法的高明必定在于其表达了许多重要的精神内涵，从书法史的演进来看，不同时期的内涵所指又有所差别。但是绝非现今理解的书卷气、文雅的所谓“文化涵养”所能够包含的。

（一）宋以前

文字之初，法天则地、依类象形，在对秩序的理解与建立之初，书法要表现的是自然之道及其生成法则：

“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

（东汉·蔡邕《九势》）

“然则字虽有质，迹本无为，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达性通变，其常不主。”

（唐·虞世南《笔髓论》）

而晋唐之际，书法的艺术性、表现力得到进一步发展，于表现自然万象之外又突出了形其哀乐的抒情功能：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

（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

值得注意的是，晋唐间书家大多来自世家士子，家学渊源深厚而修养全面，作书、论理以自然万象、生命体验、精神追求以及情绪波澜为主旨，同时，士大夫的身份往往又使得其书法带上人格化的特点，典型的是唐代颜柳书风，被誉为“端人正士”、“唐代冠冕”。

这一时期论书都不会涉及书卷气、文雅之类具体的文化意味，而且，也不会有人提及书法为诗文、政事之余事，是不值重视的小道，相反被当成与人生、道义、境界直接相关的重要艺术实践，“道”与“器”同样重要。从这个情形出发，唐代书法家极其注重技法的锤炼与摸索，也留下了很多关于用笔方面传法、悟道的故事。这种对于艺术本体的持续深入的研究促成了唐代书法波澜壮阔的大格局。这些，大概是后世文人以为书法为余事末技的认识里不能梦见的。

(2) 宋及宋以后

五代离乱之后，人物凋零，宋代世家文脉自然不及唐代繁荣。大量中下层文人以科举中式跻身主流文坛、政界。“士”这一阶层转变为“文人”阶层，是唐宋间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反映在书画艺术领域里就是“文人画”、“文人书法”成为主流。

这一时期起直至后世各代，各种书论中关于读书、学问的重要性论调层出不穷，书卷气、雅驯、成为重要的考量标准：

“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

（北宋·苏轼《柳氏而外甥求笔迹二首》）。

“书之为技，末之末也，胸无数百卷书，不能作笔”

（明·王绂《论书》）

“学书尤贵多读书，读书多则下笔自雅，故自古来学问家虽不善书，而其书有书卷气。故书以韵味为第一。不然成其技，不足贵矣。”

（清·李瑞清《清道人论书嘉言录》）

这大概也是我们今日很轻易地认定“书法是一种文化而不是技法”的理论来源。但是，我们隐约地发现，过于强调书法的文化品格和附庸属性，使其逐渐失去艺术本体中技法上继续变革发展的机制，帖派在元明清时期的持续衰落可见一斑。“器”毁而“大道”将堕，案头雅玩成为致命的精神诱拐，正如宋人刘摯曾戏言“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读书可以改变气质，倘若不能立志、养气、壮怀，徒成温柔端雅，多了一些知识、学问，那与读书的初衷是背离的。

书法的雅驯形态成为文人人格化的表现，有时也成为一种伪饰而有效的人生面具，特别在那些特殊的历史时期。

显然，清中期以来的碑派书法运动，就是在技法上对之前旧传统的一次

纠正，“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康有为），尽管碑派书法的革新举措今日来看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但是致力于关注技法本身，丰富艺术语言这点上，理论和实践都有积极的意义。

何绍基就说过：

“心声心画，无可矫为，然非刻苦用一番精力，虽人已成就，不见得全能搬移到纸上，所以古来名人，不是都会诗文字画。”

（清·何绍基《东洲草堂书论钞》）

三、一点思考

现在，学界中像陈先生担忧书法家普遍缺少文化一样，书法领域也普遍认为学术界、思想界今日会书法的长者已是寥寥。大家乐于以民国文化界、政治界、甚至商界、帮派界人物虽不以书法为怀，而能出手不凡来佐证技法不重要，却忽略了彼时人物自幼持毛笔书写，钻研书法也是常态，而且往往终生秉持。这与如今学界名流朝甫操管、暮已出名的情形有着根本的区别，如今看来，此中没有任何可比性。

去年以来，有几位享有大名的文化人都跨界办了书法展览，反响也很明确。我们的困惑甚至是他们为什么要办一个书法展览，这种冒险就像我这样一个不擅长文章的人，深夜坐在电脑前敲下这篇文章，难免惹专门家笑话。知易行难，自知更难，或许，我们都应在感兴趣的领域里真正下有用的功夫，即使是跨界也一样。

资料来源

屿儿山遗址： 藤桥四千多年前温州祖先的故居

李岳松

纵
横
一
一

2019年12月10日,《温州晚报》发表了记者傅芳芳的文章,揭开了藤桥镇屿儿山遗址的神秘面纱。屿儿山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被评为“2019年度浙江省考古重要发现”(全省10个),是一处距今4000多年新石器时代晚期好川文化的小型墓地、聚落遗址以及汉六朝的砖室墓的遗存。展示了4000多年前温州祖先生产生活场景。

屿儿山遗址位于鹿城区藤桥镇上寺西村祖师湾自然村北部一座小的孤丘上,南与阴山、龙山相望,北依戍浦江,海拔仅20米,分布面积约5000平方米,发掘700平方米。2018年5月,由当地村民承包平整土地时发现了墓葬装饰木,且采集到了陶片,而后上报文物部门进行文物开掘。

挖掘区偏山体中西部,分墓地和聚落两类,清理出土墓坑16座,随葬器物29件,以豆、钵、圈足盘等陶器为,并有少量玉、石器。在聚落遗址中清理出灰坑、柱坑等聚落类遗迹76个,大致构成4组长方形建筑。在山体制高点处有石柱遗迹,面积约40平方米的中心建筑。在遗址中南部区域有“木骨泥墙”类红烧土废弃堆积,面积约10平方米。

聚落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陶片标本,主要有釜、鼎、罐、钵、豆、圈足盘、壶和纺织轮等石器270多件,以镞、铍、钺最为常见,有锥形器、镞和纺轮等玉器4件。此外,还有可鉴定的植物遗存90粒,水稻12粒、小穗轴45粒。

屿儿山遗址是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藤桥曹湾山遗址之后温州市第二处发掘的重要史前遗址。从屿儿山遗址柱坑底部有垫石、周边有夹石等现象,与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曹湾山遗址颇为一致。

在屿儿山西北坡区域,发现3座汉六朝的长方形单室券顶砖室墓,出土环首刀、壘等各类随葬品30件。



出土的圆铤石镞

其中多件为瓯窑瓷器，有瓯窑盘口壶、青瓷碗等，瓷器装饰风格以莲瓣纹、水波纹、褐色点彩为主。还有玉簪、玉握等。此外，还有一座为凸字型券顶砖室的东汉墓。

可以说，屿儿山遗址不是孤立的遗址，它是“好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何为好川文化？

2004年6月，中央电视台拍摄《南曲戏文八百年》，其中有一段赞美瓯江的话：

八百里瓯江，似一条长龙，尾搭龙泉山，头枕温州郡。龙口大张，内含宝珠一颗。那珠，便是人称瓯江蓬莱的江心屿了。

话说瓯江上游源头，仙霞岭南麓的大山深处，有一个好川村，这是丽水市遂昌县三仁畲族乡一个普普通通的村。村后面有一小高地，名岭头岗，是个31米高的谷间低丘，面积约5000平方米，岗顶相对平整，一条发源上游约8公里处的忠溪，流经好川汇入松阴溪。

1997年4月18日，遂昌县农业局工作人员王元茂驾着推土机在岭头岗进行推山改田作业时，发觉推土机推开的黄泥中出现好多陶器碎片和泥碗，有见识的王元茂，找来塑料袋将眼前这些破烂玩意儿装好藏起来交县文管会

鉴定。结果一个深藏了 4000 多年的秘密就这样被揭开了。

4 月底到 6 月底，经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力量进行抢救，发掘面积近 4000 平方米，发掘出墓葬达 80 座，出土文物 1028 件（组）。经鉴定，是个距今 4300~3700 年之间的遗址。正好是中原地区由新石器时代晚期步入青铜时代。显然，长眠在这个墓地的，可不是一般的平头百姓。专家们将该墓地遗址以村定名为“好川文化”。

好戏并未结束。

在发现好川墓地之后的第 5 年，2002 年 11 月至次年 4 月，浙江省和温州市文物部门对鹿城藤桥上戍曹湾山（其山体貌像老鼠，又名老鼠山）进行发掘工作。结果这里又是一处好川文化遗址。与遂昌好川墓地相比，曹湾山墓地在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方面有一定的区别，但两者的文化面貌、内涵特征基本相同，出土的文物如陶鼎、陶罐等的形制、纹饰基本一致。遂昌好川墓葬与曹湾山遗址是同一类型文化。

从两处墓坑规模、随葬品数量和组合情况方面去区分，好川墓地的等级远远高于曹湾山。如果好川墓地代表的是核心聚落的话，曹湾山墓地就如一个地区的中心聚落；好川墓地是贵族墓地，曹湾山墓地是平民墓地。

专家们认定，从曹湾山山脚发现的文物其年代在距今 5000 年左右。这不仅比曹湾山山岗上文物要早，也比遂昌好川墓地要早。那就这支南下族群最晚也应该是在 5000 年前迁居到这里，由此可见，南下的这支祖先就不是良渚晚期，而是良渚的早期了，也就可能不会是遂昌好川村的一支往瓯江下游迁徙到曹湾山。

遂昌的好川文化虽号称为文化，但发现的还只是墓地，聚落尚未发现。根据考古界不成文的规定，一支被单独称作为文化的考古发现一般要有三个遗址以上。可见当年的专家预见瓯江流域必有其他类似的遗址，故超前命名遂昌好川墓地为“好川文化”。好川墓地、加上后来发现的曹湾山遗址，先后揭开了瓯江流域先民生产生活的一角。之后相继又在鹿城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山福镇下龙山遗址（原横山遗址）、双屿街道卧旗山遗址和瓯海仙岩镇穗丰村杨府山遗址，如今又发现了藤桥屿儿山遗址。

张立新著《瓯人与东瓯国》评述：考古学家的认定是很有分寸的：好川文化与良渚文化在文化因素上有着十分密切的亲缘关系，但不是直接的传承与发展。??好川文化在新的环境中融入当地土著的血液，并脱胎而成为另一



航拍的屿儿山遗址发掘区域

种具有独立意义的文化。就是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使好川文化形成自己的文化类型。

目前，温州市二处发掘的重要史前遗址都集中在藤桥，可见藤桥是温州祖先最早选择生产生活的地区之一。

从曹湾山遗址发现水稻颖壳的双峰形植硅石，经判别式计算后，表明是栽培稻。这意味着生活在曹湾山的先民们已经有了原始的农业生产，他们在山脚的滩涂田地里种植水稻，将收取的稻谷挑到山上居住区储备食用。从屿儿山出土的水稻和小穗轴等植物遗存可以推定，水稻是好川文化时期，温州先民们补充以淀粉质为营养成分的主要食物来源，并辅以捕捞、采集和狩猎获得鱼类和动植物作为食物不足的补充。由此可见，早在 5000 年前藤桥戍浦平原已经形成，为种植水稻提供了耕地。

据有关史书记载，远古时温州沿海没有平原，包括藤桥是瓯江流域或者说是温州海湾中的内海。《温州水利志》载：江河水与海水挟带的两类泥沙相遇后，会产生物理和化学变化，形成丰富的淤泥细粒，高平潮时每立方米潮水的含沙量为 1.1 公斤，低平潮时高达 3.4 公斤。在平潮静止时，便下沉形成水底淤泥层，学界称之为“海相沉积物”，俗称“青紫泥”（俗称“烂涂泥”）。潮涨潮落，遂使温州沿海青紫泥层层沉淀加码，顺着坡度逐渐露出海面，接受阳光曝晒，空气氧化，渐渐成为日益增高的“硬壳层”。

经过多年自然的植物生长或人工改造种植，土壤渐渐地经过改良，逐渐

适应水稻种植。随着沿海淤泥不断的堆积，陆地不断向大海延伸，沿海就出现了平原。复旦大学吴松弟教授在《温州沿海平原的成陆过程和主要海塘、塘河的形成》一文中说：约在三四千年前温州许多浅海区逐渐成陆。可见藤桥平原形成比温州浅海区平原早一二千年，因此，藤桥片自然成为温州最早先民生产生活聚落的区域。

据史书记载，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藤桥石鼓山也有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只因后来随着花岗岩矿山开采、石碾（俗称石擂）开发加工遭到破坏。在藤桥平原上除了上面讲到的曹湾山、屿儿山和石鼓山有先民居住外，还有戈恬的屿坳山、坑古山、上寺山村阴山和龙山、姜村鲤鱼骑、枫林岙独屿山等小山都成为温州祖先居住生活的理想之地。这些小山丘海拔均不超过 70 米，都位于平原上，上下山方便，又可防备洪涝灾害；肥沃的小平原既有利种植水稻作物，几个小山又靠近戍浦江或者支流，便于捕鱼，又便于水陆交通，可通达瓯江上下游，方便与其他部落联系，兼得山水平原之利；蜿蜒曲折的戍浦江，又是可成为有效防备大山里下来的野兽侵害的天然屏障，为温州先民提供了生产生活的良好环境。

2020 年 2 月 28 日

知青亭记

严云林

瓯越山水，素负盛名，其西南诸地，峰俊峦黛，林茂溪澈，以桐岭村尤为秀美。由村口往北拐进河头路，沿路小溪潺潺有声，渐行十数步，溪廻路转，豁然一石亭，依山临溪，翼然立于官山尖下。亭呈六角，采花岗岩砌筑，六根圆柱托起亭盖，挑檐凌空飞翘，姿态矫健大气，盖顶一葫芦状石锥直指苍穹，犹在仰天长啸。亭额有石匾，上题“知青亭”，字体风流飘逸，亭柱一隶书楹联：“八载芳华许阡陌，七秩皓首感乡恩”。

何曰“知青亭”？又为何人所建？

时空穿越 54 年前。

1964 年 10 月 10 日，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历史背景下，我们 28 位来自温州各所中学的高、初中毕业生，被敲锣打鼓送到桐岭村插队落户，其中年纪最大的 19 岁，最小的仅 15 岁，称之为“知青”。

桐岭村山青水秀，民风淳朴，知青被村民热情接纳入村，并安插在各个生产小队。在村民的教授和帮助下，从插秧、耘田、割稻，到上山砍柴、挑担，原本“五谷不分”的懵懂少年，经过几年劳动磨炼，学会了各种劳动技能。从最初挑几十斤担子，到挑起二百多斤



早年知青留影（一）

的两箩谷子也能健步如飞，挑着一百多斤柴禾在山路行走也如履平地，期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酸甜苦辣与种种磨难，甚至面临性命之虞。

一次，我随队里上山砍柴，那时柴草稀缺，见陡坡“郎枝”^①茂盛，为更好完成任务，不顾艰险，攀岩砍柴，不料脚下踩空，整个身子直向坡下深谷滑去，幸好刚滑下几米，缠在身上的“团蒲绳”^②鬼使神差地勾住枯树枝丫，得以避免悲剧演绎。知青张大奎，随队里上山挖番薯，下山时挑着一百多斤番薯，尽管人乏肠饥，仍咬牙坚持，在山路转弯处，一边陡壁，一边深沟，箩筐碰上陡壁倒弹外倾，压在肩上的担子把人带向深沟，大奎敏捷，急蹲身并松手，两筐番薯连着扁担滚落深沟，湍流冲过散落的番薯，竟自东



早年知青留影（二）

去，大奎瘫坐在地，呆望沟底的箩筐、扁担、番薯，尽管心存懊恼，但是刚才若稍一迟缓，滚落的不仅是这百多斤番薯……

每一个困难、每一次历险，未能使知青退缩，更是磨砺了我们的意志与坚韧！

与村民的同甘共苦，凝结下深深友情。村里给知青每人指定一位师傅，把手教农活并照顾生活。我的师傅张银松，兄弟中排行老三，村里人都亲切地称“三叔”，三叔虽在中年，但能挑得四箩谷子，农活样样是里手，性格豪爽，宅心仁厚。三叔悉心教我各种农活，还放手教我划船，后来我搭伙三叔家，三婶待我如同自家孩子，甚至更多照顾。山村人每顿饭都要一半米饭一半番薯，可三婶每餐都不许我吃番薯，净吃米饭，看着三叔一个壮劳力每餐也是吃着番薯饭，我心不安，只能说自己喜欢吃番薯，才能打点番薯饭。寒冬腊月，我仍是冷板床薄凉席，三婶见到后就彻夜赶制稻秆蓆^③，亲手给铺垫床上，并给我加个装满菜籽壳的枕头，使我夜里能睡的安稳、暖和。我的被窝暖了，心窝更是暖流翻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与三叔家人已如同亲戚，返城至今，每年春节都要去桐岭拜个年，看望老人家。

桐岭村没有学校，文化贫瘠，生活单调。知青决心把文化知识、文体活动带给村里。在村民支持下，知青开办了夜校。教室设在岭根宫，摆上十多张课桌，知青带来各自旧课本，并转身成了执鞭授课老师，村里年青人争先恐后报名学习，晚上，宫里点上煤气灯，琅琅书声飘出宫外，响彻夜空。知青项光荣打那时当老师，即爱上这神圣职业，并想尽己所能，为山村文化知识给力，后来考上师范，毕业后仍回到老竹乡中学（辖桐岭村）教书育人，一教竟是十数年，如今桃李遍故地。

知青又办起俱乐部。知青中人才济济，编剧、演员、唱歌、器乐样样拿手，岭根宫有个旧戏台，每当俱乐部演出，村里人、甚至邻村人把岭根宫挤得水泄不通，女知青夏宝宝夜莺般的歌声、男知青徐哲钦行云流水似的二胡，至今还被村里人啧啧称道。会武术的知青陈胜贤，在村里的“晒谷坦”办起“武术学习班”推广武术，村里小伙子趋之若鹜，这批小伙子中的胜山、顺三等，后来多次在全国性武林大赛中获奖，如今已是温州武术界名师，陈胜贤后来一直担任温州市武术协会会长，并在花甲之年参加香港中华武术大赛，获得金奖。

知青，犹如一股春风，吹进山村，使得沉寂又单调的桐岭村风生水起



知青亭

.....

八年后，知青陆续返城，有参军、有直接分配到工厂、有父母顶替进了企业、也有考上大学……

八年历练，晨昏雨露滋润了善良与朴实，寒暑风云铸就了勤劳与坚韧，这是人生珍贵的财富、生命顽强的源泉。返城后，投入改革开放大潮的知青，怀揣美好愿景，肩负时代使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勤奋努力，踏实耐劳，求索创新，做出喜人业绩和社会贡献，成为企业所需骨干、社会有用之才。我进了市副食品公司，从事农副产品生产、收购工作。70年代，我曾带上技术员到桐岭村帮助山林队培育、种植西瓜、柑橘等，并组织收购，为桐岭村的经济发展奉献绵薄之力。80年代，知青李大年担任市商委主任、笔者时任市供销社主任，知青自豪又语重心长地说：政府把全市人民的生产、生活资料都信赖地交给了知青当家调度，我们更应同心协力、尽职尽责做好这份工作，以不负政府所托、不负江东父老期盼！

2018年春节，知青在古稀之年相聚桐岭，在这里，我们留下足迹，洒下汗水，付出青春！芳华随岁月流逝，记忆却铭刻心中，面对在最艰难岁月给

我们帮助和关怀的父老乡亲，深深感恩。大家商议筹建纪念、感恩凉亭，知青陈大樑等慷慨解囊，众人积极捐资。在村民支持下，知青张大奎、陈锦棣、林莉英等，顶着烈日酷暑，选址、考察、做基础、选石材、拟楹联、撰碑文，至夏末，终于建成石亭，即名“知青亭”，并推选笔者题书、撰楹联及碑文。按照乡村习俗，知青在村里摆上简朴又热闹的完工酒，与村里父老乡亲，共聚一堂，杯筹交错，笑脸喧哗，主宾皆欢。风闻桐岭建了“知青亭”，邻村村民和知青都前来瞻仰游览，流连忘返。村民坐在避日遮雨的“知青亭”憩歇，啧啧称羡知青善举。知青坐列此亭，别是一种情怀：回眸芳华东逝水，笑看青山尽霞辉……

知青一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地虽悠悠，历史终湮没，然知青之精神将香飘久远！

2018年9月15日

①郎枝：草本植物，晒干可作柴料。

②团蒲绳：捆柴的麻绳，一头有木勾。

③稻杆荐：稻杆编的褥子。



知青年又相聚在一起 摄于2018年09月16日

部队调防，情融温州经历难忘

纵横一二一

写在：温州军分区部队调防50周年
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成立80周年

王邦志

1975年5月，奉中央军委命令，我所在的江苏省军区独立一师师部机关率直属队及两个团，从苏北调防到浙南，接替原温州军分区机关以及洞头、苍南守备团，肩负起了东海前哨海防守备和民兵预备役工作两大重任。

此次部队调防，缘于文革后期温州地区受派性影响，导致军政军民关系受到严重破坏，引起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发出“军队要整顿，军民关系要改善”指令这一历史背景。于是部队从苏北盐城，来到浙南温州，我的身份由原江苏省军区独立一师政治部秘书科干事转变为浙江温州军分区政治部群联科干事。在此后10年军分区工作中，我来到温州，认识温州，进而融于温州，爱上温州，并成为新温州人，期间留下诸多难忘经历。

难忘初来温州新异感受

部队从北风呼啸、盐碱之地的苏北，来到气候温暖，鱼米之乡的江南，反差不言而喻。对于这次部队调防，既感到突然又为之欣喜，毕竟是回我浙江家乡了，而且是进驻这“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的东瓯古镇，一座“温州好，水土甲东南”（清·孙扩图《忆江南·温州好》）古今共唱温州赞歌的历史名城，其心境可想而知。

由于调防时在特殊的形势特殊的季节，部队进驻温州市区当初对环境的感受很是新奇。那时地方形势还很复杂，文革派性的影响尚存，武斗破坏的痕迹还在，五马街的店铺商行，铁井栏的街面墙上，依稀可见少量大字报和明显枪弹眼。面对复杂环境，新的军分区领导审时度势，严格管理部队，避免重蹈覆辙，严令部队“三不准”：不准个人单独上街，不准与地方上人交朋友，不准在驻地谈恋爱。这当然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纪律，随

着形势好转恢复正常，“三不准”自然不再，但部队初到温州时那种特殊形势紧张氛围由此可见一斑。同时从干燥的北方到多雨的南方，感觉气候大不一样。记得部队调防温州的那年，恰逢少见的长时期霉雨季节，到温州后一直是持续阴雨连绵天气，竟然连续数月没见着太阳。以至于有温州人开玩笑说：是你们部队调防过来也把雨水捎带过来。

此外，感到新奇的是那个时期温州市区既简单又时尚的居民生活市井百态：我们会在大清早注目于市民挑着铅桶去路边公共自来水龙头排队等水，端着马桶在街头等候环卫工人冲洗的日常现象，更会好奇于大街上留长发穿喇叭裤新潮青年招摇过市的亮眼景观。而最令我们好奇瞩目的是，几乎天天一大早，在经飞霞北路公园路去华盖山下军分区机关大院上班的路上，总会遇见长长的送葬队伍，披麻戴孝，乐队吹号，放着音乐，煞是热闹。

记忆犹新的是，部队调温州不久，我参加了温州地委在人民广场召开的万人党员大会，时任地委书记陈作霖在会上作报告。记得陈作霖在脱稿讲话中，精准地把上年所有中央文件，按照下发时间、文件序号、标题内容逐个陈述，并紧密结合温州情况一一阐释，发表见解看法，提出贯彻意见。陈作霖高屋建瓴的讲话，尤其那过人的记忆，清晰的思路，演讲的魅力，让我感到十分新奇：真是位有水平有魄力的地方领导。陈作霖其后调任中纪委副书记。

调防后的军分区部队，注重弘扬老部队严明的纪律与作风，着力修复被严重损害的军政军民关系，积极开展军民共建活动，社会治安日渐好转，重现“军政一家亲、军民鱼水情”的喜人新局面，《解放军报》对此在显著位置作了报道。

难忘四十多年海霞情缘

部队调防那年，以洞头女子民兵连成长过程为原型电影《海霞》在全国热映。作为电影主角原型的汪月霞，成了那个年代的人物明星，洞头县女子连名扬四方，成为全国民兵战线一面鲜红的旗帜，耀眼的标杆。

刚调防温州新的军分区领导，敏锐地意识到，要重视抓好洞头女子民兵连这个先进典型。为此，1976年上半年，军分区政治部确定我去洞头女子连驻地联防单位南京军区守备29团二营五连挂职副指导员，时间一年，主要任务即全力抓女子连的全面建设及军民联防工作。

去五连后，首先去汪月霞家里拜访，此时汪月霞已去洞头县委担任领导工作，但仍兼任女子连连长。汪连长很高兴我的到任，表示感谢军分区领导对女子连的关心与重视。她端出一叠女子连的资料和照片，给我介绍女子连的成长历史，讲述她 1960 年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发言，还作为 16 名代表之一，参加毛主席接见合影，并接受毛主席赠送的我国第一批次生产的半自动步枪。毛主席还笑着对她说：“我到你那儿当个民兵要不要哇？”

正是借助这巨大的荣誉和精神鼓舞，汪月霞回来后即发起成立了洞头女子民兵连，并通过不懈努力，在军事训练、守岛护岛、军民联防活动中表现非凡，绽放光彩。著名作家黎汝清以此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著名电影艺术家谢铁骊拍摄了文革期间为数不多的最美电影之一《海霞》。

实际上，电影《海霞》的问世，经历过一段曲折复杂的斗争。《海霞》拍好送文化部审查不予通过，因主管文化的江青不同意，认为电影小资情调太浓，“三突出”不明显。北影厂专为中央领导放电影的一位师傅，将尚未政审的《海霞》影片调给病中的周总理看，周总理看后又推荐给朱德、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看，受到他们的肯定和高度评价。江青得知后，大为脑火，下令封尘电影拷贝，大肆讨伐谢铁骊，并追查所谓的背后黑手。谢铁骊忍无可忍，上书毛主席陈情。毛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邓小平根据毛主席批示，亲自组织政治局同志审看《海霞》，肯定了这部片子。在邓小平支持下，历经坎坷的电影《海霞》终于得以在全国公映。

电影《海霞》的问世，惊动中央高层所有领导。一部电影竟然得到如此“厚遇”，实属罕见，这也是那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

我到洞头女子连没多久，“四人帮”被粉碎，随着对江青打压电影《海霞》的批判，洞头女子连扬眉吐气，名声在外，影响广泛，由此更引起社会各界对女子连的关注，部队工作组来女子连蹲点指导，地方学校和文艺团体来女子连体验生活，来访人员络绎不绝。这时期，组织女子连学习讨论，开展军民联防活动，接待外来团体来访，成为我在女子连工作的重头戏。

我到女子连时，因连长汪月霞已去洞头县委工作，女子连的具体工作和大量事务活动，主要由指导员陈玉兰负责，在这一年里，我天天和陈玉兰碰头商量工作。白天一起组织女子连军训打靶，民兵整组家访，军民联防活

动，晚上或是一起开会学习，或是共同海边巡逻。

陈玉兰出身贫苦，待人热情似火，工作风风火火。她能双手打抢，人称“双枪老太婆”，是电影《海霞》中阿洪嫂人物原型。陈玉兰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奉献给了女子民兵连的事业。在和陈玉兰共同战斗的一年间，我俩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我挂职一年结束返回前，陈玉兰郑重提出和我结认姐弟，我欣然赞同，从此我们姐弟两家走了四十多年亲戚。

结缘女子连，结识“海霞”，结认玉兰姐，有机会在“红色娘子军”当了一年“党代表”，是我一生中十分幸运的事，我为之庆幸。虽然和女子连并肩战斗的时间只有短短一年，但结下的战斗情谊弥足珍贵，情深谊长。四十多年来，和女子连老战友联系不断，向汪月霞老连长问候不断，与陈玉兰老大姐来往不断。

值此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建连六十周年之际，作为当年“党代表”，衷心祝愿女子连“昔日巾帼风采，今朝战旗更红！”

难忘莲花山上爱民修路

今天，温州居民收看电视，谁也不会想到温州电视台的建设，温州电视信号的输送，离不开温州军分区大力支援，凝聚着当年部队官兵为之付出的辛劳与汗水。

70年代末，各地拉开普及电视的帷幕，温州也计划以温州电台为基础力量筹建温州电视台。

播放电视，离不开电视信号的发射，建电视台，离不开电视发射塔的配套建设，而电视发射塔，需要相应的高度。

北京电视塔 405 米，武汉龟山电视塔 311 米，中央广播电视塔 405 米，上海明珠电视塔 468 米，广州“小蛮腰”电视塔更是高达 600 米，是中国第一高塔，世界第二高塔，仅次于东京晴空塔。

温州市区最初的电视信号发射，仅限于华盖山半山腰几十米高的发射塔，高度远远不够。于是计划另外修建电视转播发射塔，接受由丽水中转的浙江电视台信号。但那时温州政府财力有限，苦于建设资金和施工力量的紧缺，电视塔工程建设迟迟无法上马。

1978 年下半年，时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电视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后任温州日报总编的吴军代表温州地委、行署到温州军分区求助，请求部队

支援电视塔工程建设。计划筹建的电视塔，位于温州市区周边最高峰、海拔695米的白云山主峰南侧莲花山顶，为此，需要修建一条从山下至山顶长11.6公里的盘山公路。而当时政府拨款修建电视转播发射塔的资金总共只有15万元，还不够建塔和购置设备费用。

军分区急地方政府之所急，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欣然接受地方政府的求援，应承修建莲花山盘山公路的工程任务。

为此，军分区成立了莲花山公路建设工程指挥部，并确定由华东一级战斗英雄、军分区副司令员李经章任工程建设总指挥。

工程指挥部设在温州南莲花山下的慈湖乡林场场部，指挥部人员由军分区抽调司政后机关有关人员和温州人民广播电台有关领导及技术人员组成。我是政治部抽调人员之一，也是唯一驻工地指挥部坚持到工程结束的军分区机关人员。

我的工作任务是，搞好驻地军民关系，做好群众工作；负责施工新闻报道，拍摄施工现场图片；了解施工突出事迹，编写工地播音简报。

1979年1月，军分区从所属部队调集10个连队的兵力进驻慈湖乡，在莲花山下安营扎寨，并调用军分区弹药库15吨硝胺炸药支援。军分区司令员刘绍毅、副司令员李经章、副政委柳跃胜等首长亲临一线，组织和指挥部队展开紧张的施工。

那年的天气特别冷，下了一场大雪，但施工现场依然热火朝天，参加施工的部队指战员，每天迎着寒风冰冻，攀上山腰石崖，炸石挖土，驳坎填方，肩背人扛，克服施工设备条件差的困难，硬是用双手和意志劈山筑路，用军队的勇于担当履行宗旨，为温州人民能早日看上电视而出力流汗，奉献力量。

大部队施工一个季度后，留下一个营的部队，又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终于完成了近12公里长的盘山公路修建任务，开通了前往莲花山顶建造电视塔的光明之路，也开辟了成功组建温州电视台的胜利之路，让千家万户收看到清晰的电视画面，为温州人民做了一件功垂千秋的大好事。

而今回忆此事，甚是感慨：当年军分区部队出动数百指战员，驻扎在莲花山下帐篷，风餐露宿，日晒雨淋，每日施工筑路，连续奋战数月，还调用了部队15吨硝胺炸药，其人力、物力若按当今市场经济计，价值几何？这是多大的支援与奉献啊！

引以为傲的，我也是参与这支援和奉献行动队伍中的一员。也因此，其后我被评为浙江省拥政爱民先进个人，并参加省“双拥”工作大会受表彰。

2020年6月于杭州

瓯江畔山福镇横山村的记忆

浮石

纵横
二七

鹿城区山福镇依山傍水，瓯江带着龙泉青瓷的圆润从这里穿越而过，将沿江而居的横山村烘托而起。在薄雾弥漫的日子里，远远眺望如同漂浮在江面一般。翠竹在江边绵延，黄梅雨季时，伫立江畔侧耳静听，便能听到雨滴从竹梢滑落滴进江中的清脆，微风拂来，那竹林便会翩翩起舞，摇头晃脑挑逗着脚下的瓯江潮起潮落。无论是朝霞还是晚霞都会降落在江流和山麓拥抱的地方，将横山、金岙、驿头、双潮、夏嘉一带涂抹得灿烂无比，活力奔放。

四十八年前我和我的发小曾经到过横山村，当时没有公路，是从江对面永嘉桥头方向，乘坐木渡船摇摇晃晃地到达。沿着码头那经常浸泡和裸露在潮汐之中的石阶而上，便到了横山村。高大的榕树巨伞一般枝叶繁茂地庇护着古朴的小村庄口，村民们在榕树下纳凉，悠闲地谈天说地，一派安详和谐的山村风貌。村民们望着我们投来热情友好的目光，顿时让人感觉到这里民风的淳朴和友善。小巧玲珑的街道，实质上是蜿蜒的小巷，被两旁的砖木结构的老屋紧紧地包裹着。踏着长年累月被人们脚板磨得锃光瓦亮的青石板路面，感受着古民居的静谧，聆听着小山村的古往今来。街道两旁无数的小商铺一个挨着一个地有序排列着，附近的村落的百姓都会到这里购买所需的物品，一种浓缩了的繁华让人瞬间产生坠落时空隧道的感觉，着实令人流连忘返。幽静在古色古香的村庄里，我等被那种徜徉着的“茶马古道”滋味缠绵。

最近我有幸再一次地来到山福镇的横山村，公路已经四通八达，开阔的柏油路直通村里。镇干部金怡然女士陪伴我感受着今非昔比的横山村新貌。变化很大，我在街道上尽力地不断刷新留在脑海里已淡漠的印象，倒是那保留和保护完整的古民居重新启动着我的记忆，凸显出曾经的轮廓。那苔藓斑斓的明末清初时期的山墙依

然讲述着遥远而古老的故事，已经褪色依然依稀可见的当年留在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标语，彰显在一个时代的风云。金怡然女士带领我们参观了当年让人记忆很深的供销社旧址，虽然已经修缮一新，依然袒露出原来的那种结构和风姿。现在已经成为镇（村）文化中心，被聪慧的山福镇人变成一个留在美好记忆的博物馆。我不知道他们花了多大气力，收集了那么多的老物件，琳琅满目地成了一个极为珍贵的本土文化展示馆。从当年的粮票布票，永久牌自行车，煤油灯，手电筒、9寸黑白电视机、录放机，搪瓷脸盆，到生产农具，老式家用木器等等，完完整整地展现了半个世纪前横山村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让人们在这里感受曾经，体验翻天覆地变化的反差。同样，如果需要回忆曾经的生活经历，请到这里来，必然酸甜苦辣咸的滋味如同潮涌一般。这里收藏了几乎一个世纪的历史的点点滴滴。

横山村附近的瓯江上，每年的深秋季节时的海洋禁渔期，这里成为一个天然的避风港，便会上演一幕宏伟壮观的景象。近百艘的捕鱼机帆船汇集在江畔，连成一串，并排在一起休整，冬眠一般地在这里度过禁渔期。桅杆林立鳞次栉比地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都说山福镇是温州市鹿城区的后花园，距离市区并不远，（驱车二十分钟的路程）那山，那水，那清澈的氧吧，那热情的村民，那浓郁的文化氛围，能够让烦躁的心情顿时舒展静谧下来，能够添加许许多多的记忆。不同的季节这里的农产品又会让你大饱口福。洁白滑爽的扁面片；清脆香喷喷的小烧饼，咬一口直流油；黄蜡腊的大枇杷，个大肉厚；本地特产大红芋茼清凉可口；令人陶醉的“黄金茶”，这一切都会扎根在忆念之中。

2020.5.29

找寻张璠楼第

朱继亮

初春的清晨，我独自一人驾车往鹿城区松台山，去找寻当年嘉靖皇帝赐给张璠而兴建的宝纶楼和府第遗迹，找寻那久违的古城亲情和名人遗迹。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十月，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把温州现在的大士门、张府基、三牌坊、妆楼下等地赐给张璠建楼第，真是美轮美奂，雄丽壮观。三十余年，温州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城市化建设日新月异，伴随着古城砖瓦房的“倒地”，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条条古街古巷面目全非，文化古迹也被湮没在现代楼宇之中。

—

我在松台广场附近找好车位停好车，环顾四周，此处高楼鳞次栉比、人车川流不息。松台山北麓的张璠楼第早已没有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是宝纶大厦、大士门大厦、万丰大厦等建筑物。据介绍，张璠楼第位于温州市鹿城区松台山北麓、信河街中段西侧，东起信河街，南至三牌坊，西临九山湖，北到石坦巷，建筑壮观，规模宏伟。

清孙同元、徐希勉《永嘉闻见录补遗》载：“张孚敬第在大士门，广一百余亩。相传嘉靖欲赐孚敬第，命侍臣呈图时，亲加一小圈，即召敬予之，初不知若是之大也。”民间传说，当年张璠奉旨兴建楼第，赐造于温州城内。皇帝命侍臣呈上温州地形图，在图上信笔一圈，却不料这个“小圈”实际面积很大，且正好圈在繁华的五马街一带。勘定造府地址后，官府就下令居民迁居，弄得百姓叫苦连天。后来，有张璠的三位少年朋友受众人之托，前去求情，请求移地筑府，张璠于是择定移到松台山边清静偏僻的地方兴建楼第。不管这民间传说是否可靠，但张璠的爱乡惜民之情是值得肯定的，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今天，更具有现实意

义。

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载：“张文忠公宅，乃肃皇所赐第，敕将作大匠治之，门屏、河桥俱拟宫府，前代所未有也。”另外，清《光绪永嘉县志》卷三十一艺文志七录有温州知府郁山（字子静，号水轩，华亭人，或嘉靖十年或嘉靖十三年始任温州知府）《上张罗峰书》。现全文录下：“阁下以敕建宝纶楼，大治第宅，广基地，强市买不已。夫居第传子孙，阁下今移易几何家，匝垣里余矣，而意犹未足，殆非所以善后。且阁下居朝常，喜称伊、傅、周、召之为相，独奈何所以处家者，顾出萧何、李沆下也。山亦知圣天子方向用，阁下还朝日月，而不职在太守，便葛巾野服，何所不可，岂驱赤子猎浮荣哉！地决不再广。”据此文，张璉楼第有“匝垣里余”。清《乾隆温州府志》卷十八名宦郡宦下郁山本传有同样记录。

明姜准《岐海琐谈》卷十四有录：“来福门右一带，城堞横亘松台山脊，郭外山麓前列民居，直抵河浒。张文忠以养痾归乡，议自城闉抵绿野桥，尽撤民居，将城移甃此地，松台围归私第。兴工有期，莫可如何。偶有承差寓在妙果寺，众就问计，其人曰：‘此难以口舌争，惟用激变之策，差可弥耳。令诸人栖旗为激变字，削苦竹成枪，屯聚高喊，抑或知惧而止矣。’至日，文忠躬至，督撤民居，众从其计，遥见其状而咤之曰：‘何此辈逞凶一至于此乎？可置度外，勿与较也。’事因以寝。”

明《太师张文忠公集》奏疏卷八录有《请赐楼藏额名》：“兹于郡城中得善地一区，谨更建楼座，尊藏圣制，以图永久。乞皇上光赐额名，俾臣子孙世守之。”《世宗实录》卷一百六十八嘉靖十三年十月己亥条：“上尝赐大学士张孚敬书院额名贞义，孚敬建楼其中，尊藏圣制。至是，复以楼名请，上览奏，赐名‘宝纶’，令工部制匾，遣鸿胪寺署丞朱守宣赍送妥悬。”

据金文平《温州老街巷掌故》介绍，嘉靖皇帝敕建张璉楼第并赠精雕石狮一对，派太史两人装船押运来温。不料遇风浪，将至码头时石狮沉江，两位太史殉难。张璉闻讯十分悲伤，为纪念两位太史，便在码头（今望江西路的帆影广场附近）边建起一座“太史爷庙”和一座“太史爷亭”，人们便把江边的码道取名为“太史码道”。

二

明《嘉靖永嘉县志》卷八外志宅载：“少师张孚敬宅，赐额“荣恩”，

乃献皇帝御笔。前有宝纶楼，俱在松台山北，嘉靖十三年敕建。四召亭在放生池，为张少师建。”

明《万历温州府志》卷三建置第宅载：“少师张孚敬宅在松台山下。有敕赐荣恩堂，献皇帝睿笔‘荣恩堂’三大字，世宗皇帝又题，‘皇考手泽’四字，旁注‘孝子皇帝识’五字。慕恩亭在荣恩堂后。”

明《嘉靖温州府志》卷四官室载：“敕建宝纶楼，在西隅松台山麓，嘉靖十三年十月七日，少师张孚敬奉。”尊藏御札五百七十五道（明《万历温州府志》卷三记为八百七十五道）、诗文五十二道。清陶元藻（1716—1801）有《东瓯杂咏》：“峨峨赐第彩云浮，争说罗山宠未休。五十二篇宫禁草，苍颉衔出宝纶楼。”（清《光绪永嘉县志》卷二十一）

明《嘉靖温州府志》卷四官室载：“制敕亭在宝纶楼前，碑七奉勒，制敕二十一道。”“四召亭在松台山北，碑三奉勒，制敕六道。”“荣恩堂在宝纶楼后。”“恩荣一品家庙在荣恩堂左，前有亭奉勒。”

张璠楼第坐北朝南，第南有长池，名为静明池，通九山湖落霞潭和放生池等处。大门中央署“大学士”三字直额，故称大学士府。左右悬“中兴贤相”“佐命中兴”两横匾。楼第内分三大区，中区有制敕亭、宝纶楼、荣恩堂、慕恩亭，东区有恩荣一品家庙，西区有含春堂、妆楼、四召亭、众芳园等。

楼第长池前有巨型石牌坊，雕刻精致。明《嘉靖温州府志》卷二坊门载：“元辅东西二座：御札封识每书张元辅，赍贤：御札诗有云赍作邦珍，孤忠：钦谕有云卿特孤忠尔。俱在宝纶楼前街。柱国东西二座，大学士、三少已（以）上俱为张孚敬立；贤孝为中书舍人张逊志立，笃庆为中书舍人张逊志立，俱在宝纶楼后街。”共录十坊门。明《万历温州府志》卷三建置坊表，少录了大学士、三少，柱国无注明东西二座，共录七坊表。明《嘉靖永嘉县志》卷二建置志牌坊，仅录柱国、孤忠、赍贤、贤孝、笃庆五坊。

另据《普门张氏闻知录》卷一坊表载，孤忠、赍贤，在松台山麓，两牌坊楼有“玉音”字直悬。元辅在赐第前葶路，一左一右，牌坊楼直悬“玉音”字。柱国二坊在赐第的一东一西，明万历甲戌（1574年）西柱国坊为飓风所摧，今阶楹俱在。荣恩在净光山麓赐第前，中兴硕辅在赐第大士门内，已上二坊明隆庆间被回禄，坊额都燬，四楹及遗址并存。父子中书为松泉公郡、东白公承明立，在阁老第南，坊久圯，两楹犹留。兄弟中翰为静修公逊志、

瓯江公逊业、瓯海公逊肤立，在东柱国左坊。父子京兆为别驾前符丞瓯江公治中，前问丞太衡公汝纪立，在东柱国坊右，明天启初年建，此与兄弟中翰坊一左一右，额久圯，其余柱至今具在。秋曹赞法 京兆宣劳为汝纪公立，在松台山麓新河街，是坊明天启壬戌（1622年）丑月建，凡八字分镌两面，昭然可考。

那么三牌坊为哪三个牌坊？说法不一。一种说法为柱国、孤忠、赍贤三坊，这可能源于《嘉靖永嘉县志》卷二记录。另一种说法为元辅、赍贤、孤忠，可能源于《嘉靖温州府志》卷二和《普门张氏闻知录》卷一。

三

《世宗实录》卷二百嘉靖十六年五月戊子条：“孚敬又奏谢敕建宝纶楼，得旨：楼令有司拨人看守，毋致损坏。”宝纶楼、张璁府第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十月始建，十六年（1537年）五月建成，后张璁移家居之。明末清初人邢昉（1590—1653）《石臼前集》卷三录有《四召亭歌》中“今永嘉城中有大宅，规模仿佛同京师。御札千道贮高阁，雕槛文窗严匾。”作于辛巳年。《石臼前集》录明事，《石臼后集》录清事。此处的辛巳年即明崇祯辛巳年（1641年）。当时其建筑雄丽壮观。

嘉靖十八年（1539年），一代贤相张璁逝世。后因子孙式微，张璁楼第开始荒废。清初周茂源《过张文忠故第》：“赐第松台麓，元臣主眷优。天章悬废阁，相印没荒丘。议夺千官气，身无十世谋。立谈工巷遇，何似富民侯。”（《鹤静堂集》卷五）周茂源（1613—1672），字宿来，号釜山，江南华亭（今上海松江）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康熙二年（1663年）、五年（1666年）三度来温。从“天章悬废阁，相印没荒丘”句知，皇帝御笔的匾额犹在，但府第已有荒废衰败景象。

据清沈炳巽《权斋老人笔记》卷二载：“明张文忠孚敬第在温州府城之东门。余幼时随先学博之任平阳，犹及瞻仰。第中宝纶楼者，藏明世宗御札及先世诰敕之所也。康熙庚午之秋，火从楼中起，延烧厅事、书斋，皆为灰烬，文忠所藏书画宝玩及御书宸翰悉毁无遗。”此处“东门”误，应为西南门。先学博指沈炳巽父沈雍，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任平阳县学教谕，康熙庚午年即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沈炳巽也称得上是亲历者，所记应不误。从文中可知，宝纶楼及府第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秋天一场大火

中被毁。

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载：“温处观察驻扎，定以温州府城。城之北有松台山，上有望阙亭。傍山下有宝纶阁，为前明赠太师张文忠孚敬之相府也。”“今子孙虽式微，其府第犹存。”此处“城之北”误，应为城之西南。“宝纶阁”应为宝纶楼。刘廷玑（1653—1716），字玉衡，号在园，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任温处道，三十九年（1700后）离温。此处记为“府第犹存”，与前记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失火，至少差五六年。又据清《光绪永嘉县志》卷二十一古迹志一名胜载，制敕亭、四召亭、朝阙亭在《康熙温州府志》记录为“今废”。有点我们可以确定，宝纶楼及府第于康熙年间的一次大火中被毁。

清孙同元《永嘉闻见录》卷下载：“张文忠公旧第在松台山麓，其旁即为祠堂。余于癸巳冬仲入祠游览，大有坍塌之虞。”“第中垣墉剥落，屋宇倾颓。院落尽成街道，所居者皆张姓。其子孙亦零落无几，不但无出仕之人，并读书者亦复罕闻。第前有长池，池前有大石牌坊三，今里俗称其地曰三牌坊，即在山之麓，相传系进士第大道。今虽荒烟蔓草，迥异昔时，而当时甲第巍峨，气象赫奕，犹可想见其规模也。”孙同元，字雨人，仁和（今杭州）人。道光七年（1827年）二月始任永嘉县学教谕，此处癸巳即道光十三年（1833年）。

福建长乐人梁章钜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居温州，二十九年（1849年）病逝温州。其在《浪迹续谈》卷五载：“余来温州，寻宝纶楼遗址不可得。”可见，其时的宝纶楼建筑已全毁，府第已徒有“张府基”之名。刊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的《光绪永嘉县志》卷首舆图新定有《城池坊巷图》，其中载有三牌坊、张府基、张祠之名。

据介绍，民国以后，张璠府第门台已拆除无剩，原有石狮一对，也被人移作他用。民国时期，进入张府的进第大道上尚铺有长方形大石板成百条，后由国民党温州专员张某移作他用。

在松台广场北侧，我巧遇今年86岁张明材老人，他家世居在大士门附近。据他说，少年时，他们都在大士门的石牌坊旁边玩耍，偶尔攀爬柱石，牌坊上面精雕细刻。三牌坊的石牌坊，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尚在，惜在“文革”中被拆除，后柱子被砌入民居。本世纪初有媒体报道，旧城拆建时出土的三牌坊的石牌坊的三根牌坊柱石，却被铲车野蛮挖断。温州摄影家邵

度于上世纪 30 年代拍摄的三牌坊之一石牌坊的照片流传于世，图中石牌坊很是雄伟，蔚为壮观。

四

张璠楼第在清康熙年间的一次大火中被毁，而三牌坊、大士门、张府基、妆楼下作为街巷一直沿用着。清《光绪永嘉县志》卷三建置志一隅厢街巷载：“寿宁坊即宝纶楼前，今曰三牌坊。浣纱坊俗曰普觉巷，今曰大士门。”

三牌坊，据说旧称“袞绣坊”，待考。相传，宋代时此地已成为街坊。因坊内住有一位寡妇，丈夫在卫国战争中牺牲，后寡妇因皇服被撕破跳井自尽。皇服在古代称为袞裳，故袭其此典，将坊命名为袞绣坊。明时，此坊有三座牌坊，故改名三牌坊，“文革”时曾一度改称三八巷，1982 年复称三牌坊至今。

大士门，据资料载旧称“龙首湖坊”，待考。明《万历温州府志》卷三建置坊表载，龙首湖坊为大学士张孚敬立，位于安丰桥西大街至大来桥净光山前的街南。按照方位，大士门应位于来福门内新河大街至八字桥的街西，寿宁坊、浣纱坊均在此段。大士门是张璠府第大学士府的大门或正门，原来位于府第南面，整修府第时移于东面。今虽府第门台已拆除，但地名仍称“大士门”。据介绍，由大士门进去，走过一段路，就是张府正宅所在，留有一大块空地，故称“张府基”。

张府基，因府第旧址得名。南起大士门，北至石坦巷，原是一条石板路面的巷子，张府基在“文革”时曾经改名“猛进巷”和“建福巷”。1982 年恢复原名。张府基在前几年信河街改建工程中被拆，被建成居民区。

妆楼下，南起胜昔桥，北至石坦巷。因此巷紧靠张璠府第西侧，系张府女眷梳妆的妆楼之下，故名。如今“妆楼”早已不存在，但“妆楼下”却由此而得名。

在张明材老人指引下，我们在松台山北麓山脚下，找到当地人称之为“阁老井”的水井，据说这是当年张璠楼第的生活饮用之井。明《嘉靖永嘉县志》卷二建置志坊市载：“寿宁坊，今宝纶楼前街，有井。”此井为城内二十八宿井之一。因位于三牌坊巷西首，又称三牌坊古井。井栏为六角形青石栏杆，高 0.4 米，边长 0.75 米。井壁用花岗岩块石垒砌，井深达 6 米左右，

水源常年充沛。

三牌坊古井于2005年8月与松台山仙人井与八角井合并为松台山上下井（含三牌坊古井）公布为温州市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1月13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二十八宿井（之三牌坊古井）榜上有名。

五

原位于张璁府第东侧的恩荣一品家庙的一部分，现称“张璁碑亭”，立于松台山麓的妙果寺西侧。

修成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八月的《嘉靖温州府志》卷四官室载：“恩荣一品家庙在荣恩堂左，前有亭奉勒。御制诗一首，同前，又奉勒。钦赐更名‘孚敬’二大字，钦赐更字‘茂恭’二大字，皆御笔横书。”可知，恩荣一品家庙于楼第同时建。后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为纪念张璁增敕建。终明之世，春秋二季，必由有司致祭。

据《普门张氏闻知录》卷二祠祀载，家庙赐御祭凡十有四坛。每年春二月、秋八月，俱初十日致祭。清道光二年（1822年），张铭随先君子谒拜公庙，见夫亭中供御书碑二座，遗像碑一座。其楹联云：幼学壮行，极儒臣之懋宠；进礼退义，继明哲之休风。仪门联云：四召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寝堂鼓钟齐列，有秩祀事宜，并遣官致祭牌数面分揭。其庙门联云：报德报功，国典春秋二祀；致爱致愬，家俎俎豆四时。又云：君臣际遇兹为盛，终始安全此独难。堂中直悬“太师”额，前傍曰“恩荣一品家庙”，曰“三朝锡命”。乾隆己巳（1749年），提学于敏中署曰“貽泽钟祥”。家庙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重构。刊刻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普门张氏闻知录》卷首录有《敕建太师文忠公庙图》（在松台里赐第敕建宝纶楼后），可见一斑。

1958年2月，温州市人民政府将家庙单体建筑之碑亭及三座丰碑移至妙果寺旁，称“张璁碑亭”。碑亭木构建筑，面阔三间，四面回廊，重檐硬山顶，基本上保持了原构风貌。

亭内竖立汉白玉石敕制三碑三座。中为张璁像刻碑，“貌极瘦挺，颇有威气，须长过腹，连鬓丛生，执笏侍立。”像之上端刻有嘉靖七年（1528）正月初十（此时张璁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御赐古诗一首：“戊子新正吉，春

享祖庙亲。祀礼忻已成，肃驾回宫宸。登輶偶回顾，輿南一辅臣。貌奇真才杰，形端志气伸。外焉秉贞一，内则抱忠纯。诚正辅吾躬，清白飭乃身。予喜荷天眷，赉贤作邦珍。庶几皋夔辈，望以康斯民。”戊子年（1528）新正，春享宗庙回，嘉靖皇帝见辅臣张孚敬以陪祀出侍立道傍有作。“嘉靖丁酉立秋日，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臣张孚敬谨识勒。”此碑也称御制诗碑。明《嘉靖温州府志》卷一录有御赐古诗。

清《光绪永嘉县志》卷二十四古迹四有《御制诗碑》下，存有《恭和圣制诗》一首：“都宫左清庙，尊祖兼亲亲。承祀拟同日，龙旗出枫宸。纲常自天地，父子与君臣。吾皇匪建极，正论胡由伸。乖违陋光武，奏对羞张纯。咸知縻尔爵，孰肯忘吾身。迷邦忍怀宝，待聘谁席珍。遭逢尧舜主，康济唐虞民。”《再恭和圣制》一首：“圣作万物睹，莫不知尊亲。有官入秘阁，无日离严宸。忻忻臣遇君，恐恐君择臣，国是到今定，吾道原自伸。用贤岂惟急，所贵心能纯。从兹得联属，永终成乃身。稼穡代食宝，藜藿忘味珍。利见天上人，只是山中民。”后加“臣张孚敬顿首赓和”。此为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张璁六十三岁时所书。碑刻原均藏于恩荣一品家庙内。字体工整端庄，书法出入颜柳，并有十分明显的明代所流行的台阁体楷书特征，与现存的《观荷亭记》及《先考叶公圻志》如出一辙。从张璁传世的楷书碑刻来看，可以领略到明代士大夫在科举书法上所下的功夫和当时的审美趋向，无论是诰命、碑文和典籍、科举试卷都必须是十分标准的楷书。

张璁的书法传世很少。近年，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张璁碑刻的资料。温州市博物馆库房中有关张璁的碑刻拓片有十几幅，其中除一批嘉靖皇帝诰命拓片外，有张璁草书《金陵秋兴》和楷书《慕恩亭记》，上面提到的《恭和圣制诗》，这碑刻一直封存在库房中，从未公开发表。其中《慕恩亭记》碑刻原藏于张璁楼第故宅后。从《慕恩亭记》中可以看到，嘉靖皇帝对张璁的厚爱和张璁对皇帝的忠心，碑文部分内容详见《嘉靖温州府志》卷八和《张璁集》P414。这些资料对研究张璁，特别是研究其书法提供了第一手史料，极为珍贵。

另，草书《金陵秋兴》为嘉靖元年（1522年）秋，张璁在南京任刑部主事，历览山川，伤时感事而作的八首律诗，名为《金陵秋兴》。此为两面刻石，每面各刻诗四首，高约一尺，宽二尺四寸，正反各27行，中间有断裂。据载，清嘉庆间（1796—1820），此刻石辗转入曾任湖南粮储道的族裔张瑞

溥手，藏于其别业如园（今池上楼）中，1952年其后人将刻石捐献给市文管会，现藏市博物馆。据考，张璉草书受怀素、赵孟頫和宋克书法的影响，用笔婉转清晰，结体严谨，字字独立，略带章草特征。张璉虽不以书家传世，但此碑在明人传世书法中亦属珍品。

亭内东西是御笔大书名字碑二座，分别是嘉靖皇帝御笔书赐张璉名、字的石碑。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张璉以名有嫌于御讳，请改，皇帝赐名孚敬，字茂恭。东碑为“赐永嘉张元辅名”，下平列“孚敬”二字，西碑为“赐永嘉张元辅字”，下平列“茂恭”二字，其上各有“广运之宝”玺文，左右有“御笔”“嘉靖”两圆形图章。“孚敬”“茂恭”，字大尺许，笔势雄伟，诚钜观也。

张璉碑亭是温州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大的碑刻。1981年6月11日就被列为温州第一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1月13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张璉碑亭为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碑亭后侧就是春意盎然的松台山公园，是个春季踏春的好去处。

张璉楼第巍峨，气象赫奕，颇具规模。可惜，张璉楼第在清康熙年间的一次大火中被毁，而三牌坊、大士门、张府基、妆楼下作为街巷倒一直沿用着，从这一方面，可见温州人对张璉怀念之深。然而旧城改造，使信河街星罗棋布的七十二条半巷弄逐步消失或荡然无存。若干年后，这些熟悉的街巷将成为老人的记忆，而我们的下一代只知道高楼大厦了。

我一直深思，在城市化建设，历史古迹在轰鸣着的推土机下被毁灭，这是一种无法补偿的遗憾。一座城市对名人遗迹和文化古迹的特别保护和敬畏，才得以使这座城市具有相当知名度，更为世人所景仰和崇拜。

玉介园： 温州的大观园

苏德来

别墅阳湖、玉介者，悉幽邃郁纡，擅丘壑之美，手所种树，大者鄙牛，其次巢鹤，小者亦鸣蝉矣，益斥治池馆台榭，朱廊碧槛，与清流嘉木相映带，若仙都洞府然，平泉金谷无论也。（摘自《福建参政阳谷王公墓表》）

这段话描述阳湖别墅、玉介园之景色优美。至今读来令人神往。这里专谈玉介园，谓之温州的大观园，不为过也。

玉介园，介于何处？

永嘉为风景佳胜之处，早年王叔杲为诸生的时候，就赞赏阳阳湖四山环绕，三溪之水入注，实为胜景，于是购地建阳湖别墅在阳阳的东面山脚下。

王澈从乡下搬迁到城里墨池坊居住，墨池坊南面清渠环绕，东面围着华盖山，山水交错景色别有情趣。

王叔杲见其景色秀丽，于嘉靖己未（1559年），购买了华盖山麓和太玉洞西面之间的橘子园，共有十来亩地面积，建玉介园。

华盖山麓有太玉洞天。

据弘治《温州府志》记载，华盖山洞，天下第十八洞天，名曰“容成太玉之天”在温州在鹿城区华盖山上。山上昔日有“三生石、五粒松”等古迹。

王叔杲有阳湖和玉介园两处园林，非常精心经营，种植花竹，建亭阁台榭，疏通池塘，园林景色一天比一天优美。他游赏于之间，大有就此养老之意。

修建玉介园

玉介园，嘉靖三十八年，开始动工。

除杂树、杂草，筑路，修建围墙，四周种植松树、竹子、槐树、柳树。建造连廊，面朝华盖山，取名挹华轩。挹华轩靠近小巷，街市喧哗杂乱、混杂，因此，购

买了益园的左角的一块地，以隔离外面吵杂之声。

王叔杲友人程君喜好花卉，尤其喜欢种菊花，就把园林交由他来打理。

嘉靖辛酉年，王叔杲北上江苏任常州府靖江县知县。玉介园暂时停建。

丁卯年王叔杲“以使事过家，复理旧业，稍稍就绪，随复北去”。

万历元年（1573）王叔杲晋升为安察使司副使，同时，又兼监管粮诸事。

万历元年，江苏旱灾和涝灾，粮食欠收，给征收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王叔杲提出粮食折价为银子，指出这样做有很多益处，又方便上下。上报到上级，户科给事中石应岳，上奏章，揭发他是因为军饷周转困难，故意用这事来遮掩自己的过失，明确反对这件事情，并且诬告王叔杲因为沉溺、迷恋诗歌和酒，荒废政务。于是，贬官降职。王叔杲知道这件事后，认为“出我乎丛脞鞅掌之藪，还我于九斗二雁之间，诚德我也”。

遂飘然南归。

王叔杲自嘉靖四十二年至万历五年，任内外官共十五年。家乡永嘉是他梦绕的家园。

回到家乡，见当年种植的松树、竹子、花卉在程君的辛劳培育下已经蔚然成阴。“念河清之难期，抚榆景之可惜”。

于是，重新开始修建玉介园，召集工人百来人，建玉介园。见狭窄的道路给它拓宽，缺的树木、花卉、景致给补上，颓垣断壁的重新修复，把旧的换成新的。

万历五年，辞官回家，玉介园落成。

修建玉介园时间长度为嘉靖三十八年到万历五年，共十四年时间。修建期间每天动用工人百来人。

温州的大观园

“玉介园之胜，闻名于一郡。”堪称温州的大观园。

园林分东偏、西偏，中央为园林的精华，亭台楼榭，罗列其中。

从西门入经“团云经”，路曲折向东为栽橘树园，苏轼有诗“最是橙黄橘绿”故署名“最景园”；景园中有两颗圆柏中建亭，亭周围种植桂树、香草沿路松树夹道直达“爽然台”，站在台可观瓯江，瞭望江心屿。由爽然台向东，有斤竹琳琅鳞比，云披炎蒸，有亭叫“苍雪坞”。亭后门复辟小门进

入“从兰馆，馆内有幽兰数十棵，有静室，静室栏杆靠近小池，养有数百条花色鱼，室内有名家书画器玩。馆西有庭院，北是海坛山，左右松竹交荫署名“华麓山房”。向西入小门为“挹华轩”，出轩二百步就是华盖山，举目可挹，岚光霁翠。挹华轩为园中之精华。轩两侧有古槐树夹立，轩后有奇石，由覆盖松柏。轩内有奇花异草，四季如春。轩右侧有门，出门向东为有“翠云扉”；步入翠云扉，转向南面署名“餐英馆”，北面有楼，楼东面为橘园，登楼园内景色尽收眼中。晨曦，初阳升起光闪翠丛中，朝景尤丽，为此署名“青旭楼”。楼下有室，有古书名画，休息的处所。楼的一侧为墨池坊，再有右将军洗砚处。池轩左侧小门入“团云径”直达“苍雪坞”。坞东门出百余步，夹道种植桂柏树，沿路而上登华盖山，叫“通华经”。

步出玉介园沿路上华盖山有“太玉洞天”、“蒙泉亭”、“清泉亭”、“江山胜览”、“花园净宇”、“凌翠楼”、“冠华亭”。山东面有“资福寺”，王叔杲修建玉介园同时，捐钱叫寺院住持重新整修，寺院改建得非常富丽壮观。并在寺院左边购置了一亩余地，向南面建小堂，由回廊而入，站在连廊上可以观看到郡城东南面远近景色，称华阳净宇。寺的右边本来是靠近山岭，王叔杲购置山岭北面相距十余丈的空地，建五间大楼，站在楼上俯视瓯江，如在脚下，江心亭浮在海面，双塔刺天，云帆来往，四处看如在画，其景色不亚于西湖，而松竹交错翠，拥有圈腹地，不见街市相连，故称凌翠楼。

寺后另有冠华亭，可以直视玉介园，绿荫环接林麓，则若跬步之间。

王叔杲称华盖山为东山说，“园密迩居室，望着华盖山如家山，朝昏风雨，予尝憩其中，偕昆弟朋友讌笑卒岁，是娱晚景而乐天伦咸属于兹园也。”玉介园落成，王叔杲感叹“山人自家食至入仕，寤寐于兹园培植布置，率预于数十年之前，乃今亭台池馆次第幸成，而华盖上下诸景亦烂然易观，其微惠于兹山者岂一旦一夕手足力哉。”

景园之美“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从园林中可以看出王叔杲崇尚自然之美，喜欢真山真水。玉介园是他心目之寓，惟琴、棋、禅、墨、丹、茶、吟、谈酒。其美为诗画一体，也可以出王叔杲对理想和诗意生活的追求。看，遇风日和畅带领孩子、朋友、亲戚畅游。有时候以家乡的名胜为题材，编写乐府诗教孩子唱，兴趣来了，还邀请一帮朋友郊游，过着神仙的日子。有言道：蓝与画舫，娇歌急管，申旦不寐以为常，里人望之若仙。

玉介园又是“巧于因借，精在提宜”，强调“随基势高下，体形之端正”，即园中的处理以所在地形地貌之高下正欹为根据：“借着园虽别内外，得景无拘远近”，“俗则屏，嘉则收之”，即充分考虑它四周远近的环境。

玉介园融入在东山，东山怀抱玉介园，山中有园，园里有山，此为，玉介园之大气魄。陈高《不系舟鱼集》有诗赞华盖山：

寓鹿城东山下

大隐从来居城市，幽栖借得草堂清。

鸟鸣花语疏疏落，鹿卧岩云细细声。

石眼汲泉煮翠茗，竹根锄土种黄精。

艰危随处安生理，何必青门学邵平。

从温州民谣到白鹿古城『七大门』

王拓

虽然我出生在鹿城，却童年有不少时间生活在龙湾，也就是名声叫得响的永嘉场；后来上学才真正来鹿城同父母住在一起。对于这座古老而美丽的白鹿城知之并不很多，大都的地理历史和人文知识是通过“乡土教材”才逐渐了解。但一首《叮叮当》的鹿城民谣一直伴随我成长，留下我深刻的少年记忆，因而觉得自己应该是一名正宗的鹿城人。

2020年春节之后一段时间蜗居家里，我翻阅了光绪年间编纂的《永嘉县志》部分章节，大体了解了温州的老城即是曾经的白鹿城也是一座古老的郡城，素有历史名城之谓无疑没有问题。高中就读的温州中学重视学生人文素养的熏陶，由此我比较爱好琢磨白鹿城的旧城布局 and 街坊规划，大学选读“同济”的土木建筑似乎同这一初始的兴趣冲动有关吧。《志》书从描摹的城门图、城墙构成图，到城市街坊图，再到城郊河道分布图，我都看得比较具体而细致，从中详细地领略到古代温州人的才能与智慧。

温州之“白鹿城”是一座具有近一千七百年历史的古城。据《永嘉县志》载，温州有城门七座，分四向而立。相传东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著名学者郭璞采取依江、负山、通水的原则为之选址规营，设计了东庙、南市、西居和北埠的城池布局，形成了“门前流水、户限系船、花柳饰岸、荷渠飘香”的江南水城基本特色；并且，根据城内外九座山头的不同方位，在不同年份建城过程中于四周筑建成七座城门，就是有名的白鹿城“七大门”的缘起。

“叮叮当，罗嘞。叮叮当，罗嘞。山脚门外，罗嘞，罗罗罗嘞，孤老堂。松台山上仙人井，罗嘞。妙果寺里猪头钟，喔罗嘞。”在这首温州人耳熟能详的民谣《叮叮当》中，歌词的第一句就提到“山脚门外孤老堂”。这句歌词中的“山脚门外”就与古鹿城的城门有

关，只不过把来福门俗称为“山脚门”。兴趣所致，我又结合有关网络寻找到关于这些古城门的大体材料，慢慢地组合起来，觉得这也是很好的安居并把准诗与远方的某种途径和方式。

永清门

永清门，又名“麻行门”，麻行即江心南码头道路，永清门便坐落在路口。所谓永清门，以永嘉、乐清首尾二字来取名，有名的“麻行码头”就在永清门附近。

迎恩门

迎恩门，坐落在旧城的西北面，温州人习惯叫作“西门”。其遗址就在今天西门大街的最西端。相传南宋高宗皇帝从这西面城门出入时，百姓们便跪倒在地，口称万岁，迎候请恩，因此得名叫“迎恩门”。

来福门

来福门，位于旧城西南处。明代以前，叫做“三角门”，还说由“山脚门”演变过来。历史上，此城门一直作为郊区百姓经商和城内出殡的必经之门。过去温州俚语曾有“担进菜咸，抬出尸柴”的讲法，人们感觉从山脚门进出不是很吉利。当地人认为这个“山脚门”不雅致，也不吉利，就把他改为“来福门”，意思是从此以后福星高照、幸运尽来了。

永宁门

因温州在唐武帝五年公元（622年）得名永宁县，故取名永宁门。如今的人民中路和人民西路的交接处，便是原永宁门的遗址。因为永宁门位于瑞安门（俗称大南门）之西，其城门洞较大南门要小，人们又习惯称之“小南门”。

瑞安门

瑞安门，坐落旧城南侧，遗址就是现在人民路开发之前的人民东路和人民中路的交界处。“瑞安门”出处要追溯到宋咸淳元年（1265年）。据载，因温州当时曾称过“瑞安府”，所以将当时南侧的城门取名叫“瑞安门”。又

因为这城门坐落在古城的正南方，所以人们习惯称作“大南门”。

镇海门

镇海门，坐落在古城的东面，温州人习惯叫作“东门”。“东门”就是当年的镇海门。城门上有城楼，下有拱门，是城内外的交通要道。镇海门的遗址在今天康乐坊的东端，当时是在海坛、华盖二山相接枢纽处，也即现在华盖山北麓石级的登山处。这座城门过去都是用石陶瓷筑成的，所以也有人称作“石窟门”。古城“东门”的位置大概在现今市区环城路和康乐坊的交叉口，市民对此处的明确叫法是“涨桥头”。但是，很多温州人仍是习惯地称此处为“东门”。

望江门

望江门，坐落古城的正北门，位置就在旧城拆迁前的屯前街、港务巷、北鹿巷，以及朔门街四条街巷的连接处。以前望江门旁边原来还有一扇小水门，现在水门底、水门头这两条巷就是由此得名的，所以当时温州人习惯将这里称作“双门”，后人又将此地以方言谐音更名为“朔门”，并一直沿用至今。现在市民所熟悉的朔门街，就是古城“望江门”的出城街巷。据《永嘉县志》，朔门街及附近的七枫巷、永宁巷等就有大小七个寺庙。正因为寺庙多、香客多，又紧靠瓯江的南埠头，朔门街成为北边乡下进城的通道，由此朔门街形成为当时白鹿城的商埠中心，沿街两旁的商店鳞次栉比，不论柴米油盐、布匹针线、蜡烛高香，店铺里应有尽有。久而久之，这里就形成了南北货物的集散地，而繁华一时；直至今日成为“古城风味一条街”。

可能对于这几个“古城门”的陈述含有某种怀旧的情愫，才令我为之追怀。今天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基本上对它了解甚少，更枉谈其他的白鹿城城墙旧址。因此，我又从前几年出的《鹿城区志》和最近出的《鹿城地名志》寻找相对应的城门位置和时代变化的古城历史痕迹。那天，等疫情有所好转，我从新城这边出发，骑车直上市府大道、过划龙桥之后，远远地就看到巽山塔，一座当年建城时凭山而成的旧塔；转入人民路，经大南门、小南门，再从环城路一直到华盖山下、五马街和朔门街、康乐坊；而后又转麻行码头，直上郭公山一线；又转向西城路和九山路，返回妙果寺和松台山轻松

地回家：脚下骑车，心里则在怀想和琢磨所谓的沿路、沿江七个城门，只觉得历史的陈迹不再模糊和神秘，似乎它们只不过一个个生命旅程的过客，与行人擦肩而过，与风云同行。

下午日头还在天顶出发，回来时恰沐浴着一身余辉。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变得更加成熟些了，也更是潇洒多了。

身为温州人，无论长在龙湾，还是学在鹿城，我都为自己是一名出身在这么一座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文化名城而骄傲。

2020.5.18

百里坊 『严升记』 开创及其家人们

严云林

温州老城区的“百里坊”以“八字桥”为界，分为百里东路与百里西路。百里坊的由来，据说来源自一首《瓯江竹枝词》：“百里风荷百里芳，拗莲作寸爱丝长，送郎直到平阳畴，羞对花光卸晚妆”。后取“百里芳”作现百里坊之地名。八字桥原先有两座桥。清光绪八年《永嘉县志》记载：八字桥一桥在德新坊（天雷巷南），跨东西，一桥在新^①河街北，跨南北。两桥形如“八”字，故而得名。从古到今，从百里坊口到八字桥一直是温州老城的繁华街区。2007年，八字桥的拆迁工地出土了珍贵的宋代漆器。这些漆器中，有朱漆盘、银扣朱漆盘、花瓣式朱漆碗、收口黑漆盏及黑漆碗碟等，上刻“己酉温州□□张记”、“辛卯温州新河周三叔上牢”等楷体墨书铭文，可以窥见这一带是当年的富人区，也折射出当时经济的繁荣。在清代，文人周衣德留下一首诗：“半间殿里鳌山簇，八字桥边锦幕添。最是嬉春游女盛，沿街不肯下湘帘。”可以想象当时的繁华和热闹。



旧时百里坊街

温籍著名作家林斤澜先生祖居百里坊，他在一篇名为《榕》的散文中写道：“坊口到我家老屋，不过三四百米，从老屋再走一二百米，是个三叉路口。原先街边都有河，有两条桥像八字搭在三叉河上。这里就叫做八字桥。八字中间，又是一株大榕树，也两人不能合抱。枝叶盖着河，河上的桥，过街，盖住周围的店面。团圈围着榕树的有酒米店、糕饼店、扁儿店，还有两层‘洋房式’的百货店叫严升记。”这“严升记”即是我的祖父严钟杰老先生开创的百货字号。祖父字仲衡，温州市区人，生于1892年^②，卒于1975年1月22日。祖父出身贫寒，祖屋原在市区百里坊八仙楼。听祖父母辈说，不知几代前，严姓祖上也出过大官，曰：“御史太”（御史，相当于现在的监察职能，是负责弹劾、调查等工作的官员），原麻行僧街曾立有牌坊，但后辈却不知为何逐渐衰落，至我曾祖父时已只能以钩制“和尚帽”^③为生，养有六子三女。

自我记事时，大阿爷、四阿爷、三阿婆及我爷爷均健在。大阿爷整天胸前挂着个破三弦琴，在八字桥头弹琴说唱，嬉皮笑脸地混吃，有时还替人算算命。大家都叫他“蟹浆伯”，意是指他身上很邋遢、很脏，也是瞧不起他，颇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他常到我家，与小孩开开玩笑，像个老顽童，有时也在我家蹭饭，有次吃了饭还顺便把我爷爷放门口的新鞋穿走，把自己已露出脚趾的破鞋留下，爷爷也只摇摇头。后来听大人们只是淡淡地说“蟹浆伯”已死了。四阿爷很有爷爷气质，我们叫他“碎阿爷”，“碎”的温州话谐音是“小”，温州人认为“四”字不吉利，就用“碎”代替。碎阿爷家是个大家庭，碎娘娘（四祖母）生有10多个孩子，但也有夭折的，与我们最亲近的是堂大伯、堂二叔、双胞胎堂五叔、六叔及其家人。碎阿爷死的时候，我大概有5、6岁了，依稀记得丧事排场蛮大，送殡人很多，我们兄弟姐妹也都穿上白色的丧服为他送殡。

兄弟中算我祖父最有出息。祖父自幼勤勉节俭，不但继承了曾祖父的手艺，还扩大至多品种的“肩挑货郎担”，最终发展至在百里坊街八字桥置业，开创百货字号“严升记”。鼎盛时期，货通三江，名播浙西南，店员百余人，兴盛绵延数十年。

我出生时，往日繁荣早已成云烟，唯一能遐想昔日情景的就是现存的一幢“严升记”楼房，即林斤澜先生笔下的‘洋房式’的百货店铺。听父亲说，严升记是祖父开创，事业发达时缺少人手，遂叫闲居的碎阿爷帮忙做



坐落于八字桥两层洋房式的严升记楼房

事。此后，祖父主内，碎阿爷排街^④，兄弟同心协力，严升记生意更加兴隆。

严升记逐渐衰落，直接原因据说是二起：一是碎阿爷在上海时一笔生意因遭人算计，亏了血本，二是抗战期间堆在朔门码头的一批货物被日本鬼子飞机所扔炸弹毁于一旦，但内部管理不善，也是一因素。听我父亲说碎阿爷家的叔叔们都可以随意到店堂的铜钱笼里拿钱零

花，更有甚者，在店堂地上，竟随时都有被脚踢到的银元。从此，严升记一蹶不振，直至解放前夕倒闭。解放后，严升记店铺由政府收去改为“温州市国营第二百货商店”，能有“温州第二”之排座，也足见其昔日之声威。

按温州人习俗称祖父为“阿爷”，我自出生，一直与阿爷一起生活，直至他去世。

我儿时因父亲忙于工作，后来父亲身陷囹圄，所以记忆中都是阿爷带我玩的多。阿爷喜欢看戏，有时天雷巷底的“大爷殿”有演戏，他就让我骑在肩上，挤在人群中看戏，捲索巷的“永嘉戏院”刚开张，他也带着我去看一本接一本的京剧，我看不懂，只是听敲锣打鼓看热闹。逢端午节划龙舟、三月三拦街福等节日，阿爷也让我骑在肩上，挤在人群中看热闹。我骑在阿爷肩上，觉得特别开心，有时还拍手踢脚，阿爷就会被我摇得晃动，现在想起，当时他已是 50 多岁的人，也是够累的。

从我记事起，早就没严升记百货店了，只见阿爷每天一早，就扛起几根木头棒（是插在大柜上的遮阳棚），到八字桥黄先生的药店门口摆烟摊，我有时也屁颠屁颠地跟着去。阿爷推出寄放在药店里的货柜，货柜像课桌那么大的，上面撑起遮阳棚，柜子上面摆着各种香烟，有“大前门”、“老刀牌”等，我最喜欢“老刀牌”，因为“老刀牌”的烟盒里面是一张张“人儿版^⑤”，等阿爷把烟卖完，这烟盒就归我了，回家用剪刀把人儿版一张张剪下，就可与小伙伴炫耀自己有那么多人儿版了。阿爷卖烟除了收纸币，也收铜板或铜钱，铜板是光绪年的最多，我也会拿几个铜板给自己玩，阿爷都会依我。

阿爷也有生气的时候，一生气，他的口头禅就是“倒娘入娘”这句“市骂”。记得有次俊弟把我一心爱物品损坏，我一急，随手抓起一只棉手套摔过去，刚摔到他眼睛，俊弟“哇”一声哭了，我慌了，赶紧去看他眼睛有没有摔伤，阿爷一见也急了，口里“倒娘入娘”，伸手给我一个“后枕光”^⑥我脸上马上起了五条红手指印，我也哭了。

阿爷买东西很会讨价还价，一次，有人送木炭到家里卖，一番讨价还价后，阿爷要自己再过秤。卖炭人走后，阿爷还在算账，突然，他一拍脑门：“哎呀”一声，我问怎么啦？他说账算错了，刚才砍价都白砍了。我看他懊恼的样子，心里只想笑：精明的阿爷也有失算的时候。

在家里经济最困难时期，阿爷去菜场买回来的菜都是菜叶子，他说，这菜叶子很便宜，不是论斤卖，而是“团堆”^⑦来的，吃也是一样的。

阿爷在我眼里节俭的近乎吝惜，如同“儒林外史”中临死还不忘要家人把油灯的灯芯灭掉一根的严监生，但有几件事却使我对他的“吝惜”另眼相看。一是为了医治祖母的眼疾，他毫不犹豫的卖掉半座住宅。另一件，他考虑到碎阿爷家人口多，把严升记洋楼的住房统统分给了碎阿爷家。足见阿爷在物质与亲情上更重亲情。

1975年冬天，阿爷已不能下床行走了，一个星期天，阳光暖洋洋，二姐来家和我一起把阿爷身体擦洗干净，让他在太阳底晒晒暖，他连说真舒服，然后我和二姐把他扶到房间躺下。第二天早上，我去上班时，问阿爷想吃什么早点，阿爷说想吃八字桥的松糕，我赶紧下楼去八字桥头松糕店买了两块松糕递给阿爷，他说：“先放边上，你赶紧去上班吧，我等下吃。”我到大南门鲜批上班还不到一小时，家里就来电话叫我赶紧回家，说阿爷不行了。我赶回家时，阿爷已然辞世，放在床头的两块松糕还只吃了半块。



摄于三十年代的照片：左为笔者祖母，右为祖父，中为叔叔

阿爷去世，我心里一阵阵哀痛，想起他一辈子的辛劳、节俭，小时候骑在他肩上玩的情景，我不禁潸然泪流。

严升记的内当家是我祖母。祖母严李氏（户口簿是这样登记，其实也有名字叫李冬香）娘家是百里西路李宅（现百里路小学旁）。李宅也是一大户人家，祖屋系三进五间的中式建筑。祖母兄弟姐妹众多，其中我见过的大阿婆（祖母的大姐）嫁与西门陈姓，其外孙是我中学同班同学，最亲近的二阿婆嫁与南门张家，其孙子阿煦也是我中学同班同学，还有三阿婆，嫁与李宅对面马家桥陈姓，其孙女是我小学同学。温州人习惯称祖母为“娘娘”，娘娘是姐妹中的幺妹，长相很秀气，这是我在听老一辈人说和看她年轻时照片得知，待我记事时，娘娘已是老太婆了，其实年纪并不大，也许旧时的衣着打扮使人显老，如今 60 多岁的女人都打扮得像朵花，但我记忆中娘娘从没穿过花衣裳，都是青或灰色衣裳，而且是用排钮扣的那种旧式装。娘娘的头发很长，盘成一个标准的老太婆髻，用“掠头柴”^⑧刷得整齐油光。娘娘缠小脚，双足仅约四寸长，比“三寸金莲”稍大，我小时好奇，每当娘娘洗脚时，我总要问娘娘：你的脚怎么是这样？据娘娘说，小时候缠足时疼的受不了，就早点把裹脚布取掉了，所以还达不到“三寸金莲”的美足。我念一年级时，娘娘眼疾复发，落下双目失明。娘娘是位吃苦耐劳、勤勉持家的旧式妇女。听老一辈人说，严升记鼎盛时期，每天员工吃饭有十多桌，都是娘娘一人操持打理，人说娘娘是“严升记”的王熙凤。

但我想，娘娘仅是像王熙凤那样操劳，却没有王熙凤那样专权和心计，更无从谈享受与奢侈。记得有一次过年“掸新”^⑨，娘娘迈着小脚走到道坦角落清扫地面，那角落长满青苔，娘娘一下被仰面滑倒，后脑勺重重碰在摆放兰花罇的石条上，我赶紧过去扶她起来，一看，娘娘的后脑勺已被碰破，鲜血汩汩往外流，我都吓哭了，娘娘却说：“没关系，没关系。”说着就到中堂“长龙桌”^⑩上的香炉里抓把香灰敷在摔破处，将血止住，再用手帕往头上一系又继续干活。我想：头上摔得那么重，又出血，肯定很疼，可娘娘居然都能忍住，还继续干活。后来虽然眼睛看不见，家务事主要还是娘娘干的，生火煮饭、烧菜洗碗、端午包粽、过年炊松糕等，甚至穿针引线缝补，但是她花的功夫远比常人多。夏天大旱时，院里水井都干涸了，娘娘就半夜起来，用铁罐头盒做的小“挈梁”^⑪打水，待我们起来时，她已打满两大水桶，谁都不知要打上几百次。娘娘不识字，但是记忆力极好。每当夏天晚上，我们姐妹兄弟坐在晒棚上纳凉。微风习习，满天星斗，我们围着娘娘，她会指着天上的星星，告诉我们哪是银河，哪个是牛郎星，哪个是织女星，“七月七”吃巧食时，牛郎与织女会相会。她教我们许多童谣，如“月光圆圆，轮金盘盘，外甥囡儿外生员，掉地金，掉地银，掉地秀芳好成亲……”。她还很生动地给我们讲许多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她听“唱词”听来的，如“陈十四娘娘降妖”、“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等。她喜欢听“唱词”，眼睛失明后，每次听说阮世池^⑫来唱，她都要我领她到珠冠巷边的唱词场听唱词，一本本接着听，我有时陪她听，那唱词的鼓板、弦琴打弹起来也蛮好听，有时，我领她去，待坐好位子，我就回家，估摸差不多要结束，我就赶紧去领她回家。

娘娘对娘家很是依恋，娘家的姐妹、侄儿等，她都很关心，也常走动。二阿婆家因住房失火，娘娘就腾出自家楼上的几间房，让二阿婆全家住了好几年。在娘娘眼睛还看得见时，有带我去过西郭的大阿婆家，迈着小脚，一手拎个手巾包起的“伴手”^⑬，一手拉着我，从八字桥慢慢走到西郭。我参加工作后，每月发了工资就给阿爷2块零花钱，并买些饼干、香糕之类放在抽屉里给他们，每当这时，他们特别高兴，也许他们觉得孙子终于长大了，终于享到了孙子的孝心。

阿爷过世后，娘娘就显得很落寞。阿爷在世时，经常凶娘娘，娘娘习惯了逆来顺受，现在阿爷不在了，听不到阿爷的凶喊声，反而是不自在了。过

完年没多久，春寒料峭，娘娘终于病倒，她撑不住了。

父亲被准假回家，在娘娘卧病的近一个月时间里，都是父亲为娘娘侍奉饮食、拉尿拉屙。父亲对我说，娘娘对他从小抚育照料，可是自己都没尽孝，这次算是免罪过吧。

在刚要春暖花开时节，娘娘终于永远地闭上了原本就看不见的眼睛，不知在她闭上眼睛之前，对自己的一生有否遗憾？

阿爷娘娘生有二子，我父亲为长子，名祥光，次子名祥准。我叔因从小患小儿麻痹症，身体一直不好，16岁时不幸病亡，阿爷娘娘很伤心，却还是为他配了阴亲^⑤。亲家是皮坊巷的叶姓人家，叶家也是一大户，叶家爱女因患脑膜炎病逝。虽是“阴亲”，却走的很亲，我小时每年也随我大姐去叶家拜年，以此也可见双方父母对爱子爱女延续的爱心。

我父亲的一生谈不上传奇，但可谓命途乖舛。父亲生于1920年6月21日，卒于2003年1月27日，享年84岁。

父亲在温州中学读书时，也属思想激进学生。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时，学校里的胡景城^⑥等几位进步学生被当局逮捕羁押，父亲也参与了同学们组织的请愿、营救活动。阿爷得知儿子参加激进活动，把父亲关在家里直至迫其辍学。阿爷托人送父亲进钱庄学生意，后来考取温州地方实业银行作练习生。父亲聪敏好学，业务日趋干练，深受董事会赏识，不久擢升为襄理，时年20岁。父亲长相英俊，身材修长，据老辈人说，父亲年轻时被誉为百里坊街的美男子，经在海关做事的好友汪子良介绍，与其小姨子周月娥（即我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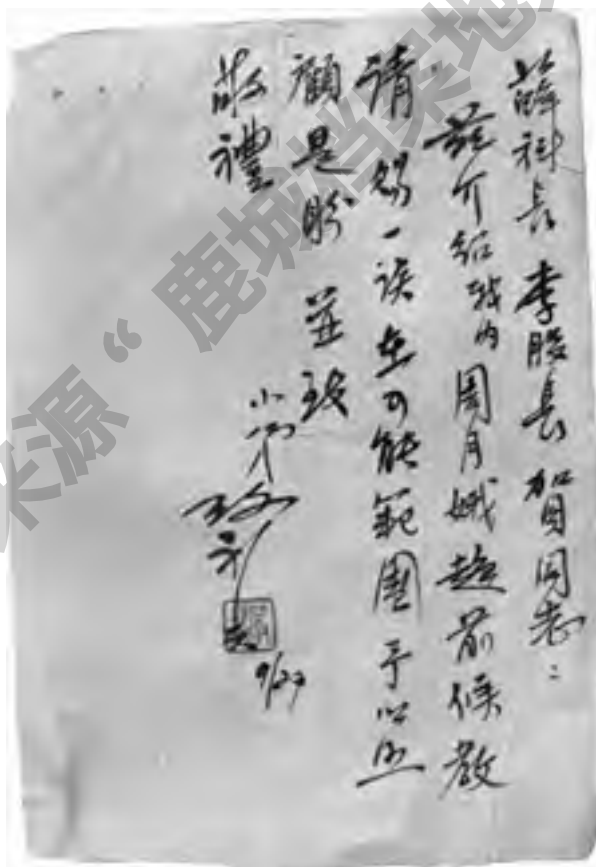


父母结婚照

亲)认识,不久结为伉俪。

父亲是个颇具创业精神的人,交友又广,待友慷慨。听母亲讲,有一次,父亲银行的朋友陈君来家做客,回去时,天空飘起大雪,父亲赶忙把母亲刚买给他准备过年的呢大衣拿来披到陈君身上并说:“不要还我,就送你。”一次,父亲同学郑君,来家与父亲说自己想去广州考读黄埔军校,苦于无盘缠。父亲二话没说,转身拿出自己的积蓄——一包银元放到郑手中。以至数十年后,郑君移居美国,还想方设法联系到父亲并寄来照片和美元。父亲在银行干了几年又辞职与人合股创办面粉厂、合作金库,但因各种原因均以“倒场”告终。特别是合作金库倒场后受牵连入狱,被羁数月。出狱后,重新进入银行界,直至温州和平解放。父亲多年从事金融业,精通成本会计业务,在银行界算一把里手。温州成立人民银行,父亲作为老银行人,被留用并成了业务骨干。

父亲手迹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

1953年，为支援山区建设，父亲被调至泰顺县人民银行工作。那时泰顺是个边远山区县城，交通极不方便。父亲先到小南门坐小火轮到瑞安，再改乘“舢舨舟”抵百丈，再步行爬山路。据父亲说，去泰顺乘“舢舨舟”是逆水，一路要花七、八天，回来是顺水只需三、四天。父亲若没公差到温，一般过年才回家。

1957年夏天，正逢“反右”高潮，父亲因为工作调动事与领导发生口角，遂被罗织罪名打成“右派”、“现行反革命”，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押往金华某劳改场。

得知父亲蒙难，全家人顿觉如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父亲由泰顺被押往金华监狱服刑前，曾托人带来口信，望母亲带儿女在“三角城头”（现人民路温州大厦处）待他由轮船码头转囚车时，能见亲人一面。谁知那天当母亲依信上所约，带上我大姐在寒风中颤抖了整整一天，却连父亲的影子都没见到。后来听父亲说，被押往金华时，正值腊月天下着雨雪。押送的“公安”见父亲穿着雨鞋，觉得犯人还这般享受，便强令父亲脱下雨鞋，把雨鞋拎手上，任其赤脚踩在冰冷的雨雪地上。父亲无奈，一边瑟瑟发抖，一边听着光脚在雨雪地上摩擦所发出的吱吱声。路过一面摊时，父亲忍不住向公安恳求说：“又冷又饿，想买碗面吃。”公安一听，就骂道：“你这反革命，想得美，还想吃面？给你个‘五条面’吧！”话没说完就顺手一个大巴掌掴在父亲脸上。父亲是近视眼，这一巴掌来得凶猛，竟把父亲的眼镜都打落在地。父亲赶紧弯身找取眼镜带好，本已发抖的身子此刻抖得更厉害了，看着这位颇为自得的公安，父亲一股热血冲上脑门，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回手“啪”的一声，一个清脆的巴掌就落在那公安的脸上，父亲颤抖的声音吼道：“你这样侮辱人，还算国家干部吗？还有人性吗？”公安惊恐地一手捂着脸，一手指着父亲气急败坏地嚷道：“反了反了，你这反革命！”他万万没想到，这个被“专政”的犯人居然胆敢还手。“严祥光，你已判刑五年，现再加你五年！”

他这话还真是法律，父亲被送达劳改场后，即被宣布：因认罪态度差，动手打公安干部，加判五年。就这样，一个巴掌又换来五年徒刑，后来又被强制“留场”。直至1978年三中全会后，父亲才得以“平反”复职，蒙冤共达22年之久，期间，父亲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苦难与屈辱。父亲与我提到二件事：一次，大姐从宁夏回温，途中特意去劳改场看望父亲。大姐带了

两听“麦乳精”给父亲，嘱他每天吃上一、二调羹，以补身体。父亲待大姐走后，即开始吃，先是取两调羹泡上喝，这久违的味道实在太诱人了，父亲忍不住又吃，两三天时间，两听“麦乳精”都被吃光，结果大闹肚子，病了一场。另一次，父亲戴着脚链随着一队囚犯被押到监狱外面的农田劳动，晚上收工回来时，还没走近监狱大门，只见监狱里火光冲天，原来是监狱失火。大火中许多犯人为了活命冲出牢房逃生，也可能真有犯人想借机越狱，但对着大门的是几挺机枪，只要有人冲出监狱大门，就会被打死。父亲说，自己运气真好，刚好外出劳动，如果在关押中，遇见火灾，不逃就会被大火烧死，逃吧，混乱中说不定被机枪打死。我听父亲平淡地说出这些经历，我的心无比震撼：父亲啊，你真是吃尽苦头。但我也惊诧父亲的生命力竟如此顽强。

1966春，父亲所在的安吉南湖林场领导准许他回家探亲，这是父亲自1956年离家后第一次回家。时隔10年，俊弟已戴上红领巾了，可至今未见父亲的面。父亲回家只有十天假期，所有亲人都见到了，唯独还没见我。我当时作为插队知青正在泽雅的雷峰水库劳动。父亲借了辆自行车骑到雷峰水库终于找到我，但父子见面互相不敢相认。对我来说，印象中的父亲是英俊、精神的模样，可眼前却是满头白发的老头，对父亲而言，儿子是聪慧、活泼模样，而眼前却是头戴箬笠、赤脚芒鞋，一身满是补丁的衣服沾满泥土。父亲见到我的模样，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父亲后来与我说：当见到自己宝贝儿子沦入这般境地，心如刀割一般，眼泪夺眶而出。

这年，我们全家拍了第一张“全家福”。

1978年冬，三中全会的阳光也照到了我家：父亲有望“平反”。我向单位请了假，与父亲一起到泰顺，去人民银行、公安局、法院等部门申诉，要求平反并落实政策。

一路上，父亲感叹地对我说：“法院判我是‘反革命’，爸其实一辈子是连个鸡都不敢杀的读书人。”父亲又说：“云林，这次到泰顺，我先要办两件事。第一件，尝尝泰顺的特产‘煎饼’，我已几十年没吃了，味道很好的。第二件，找到原人民银行行长王某某，是他害我受了二十多年的苦，我要给他一巴掌，出出冤气。”

我想都满足爸的愿望，下了车站，找到了一家煎饼小摊，买了两块煎饼，一人一块，父亲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这煎饼味道确是不错，难怪都二

十多年了，父亲还惦记它。吃完煎饼，我们就打听王某某，听银行的人说，王某某因在“文革”中犯路线错误，已被撤职，现在泰顺县人民医院门诊室挂号。我们找到人民医院，见挂号处小窗口内坐着一老人，戴着老花镜，有气无力地问：“挂号吗？”父亲把头伸进去大声说：“王某某，还认识我吗？”王某某有点莫名其妙，扶扶老花镜，迟疑地说：“你谁啊？”父亲又大声说：“我是严祥光！”王又眯起眼，看了看父亲：“严祥光？”他似乎是真的想不起了，过去了那么多年。

父亲终究没打他一巴掌。后来父亲说：“看他这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没一点当年的嚣张气焰，我也就下不了手了。”

第二天，我们到了银行，银行里的行长、科长都来听我们的申诉。我从父亲出事后，家里的凄惨状况，祖父祖母的祈盼，母亲的辛劳，子女的影响，特别是对我的影响，从读书、到农村，甚至婚姻，说到伤心处，自己止不住泪如雨下。在座听的人，特别是几位上岁数的女同志竟边听边陪我流泪，还伴随着啜泣声。

在整个平反申诉的过程中，面对银行、公安、法院的领导、同志，父亲几乎没有说一句话，都是由我在诉说，他像不是当事人似的，但是听到伤心处也不免哽咽落泪。真没想到我印象中英俊倜傥、能说会道、意气风发的父亲，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囹圄后竟然变了个人，直像鲁迅笔下木讷胆小的“闰土”，我的心中泛起一阵悲凉。

父亲终于得以平反，并恢复公职，回到泰顺县人民银行工作，平反书写着：“撤销原判，免于刑事处分，承认革命工作 30 年。”共 18 个字，父亲囹圄 22 年，算下来，一个字要一年多的代价，还没算上我们家人所受的连带代价。这份“平反书”实在是太沉重。这年，父亲已 59 岁。

父亲平反，给全家人带来喜悦，特别是母亲，几十年的委屈总算到头了，我们都过起了扬眉吐气的日子，母亲还到泰顺陪父亲住了一段时间。父亲重新工作仅一年多，就面临退休，本打算退休后与母亲共享晚年，却不幸母亲病故。母亲一走，给晚年的父亲又是一沉重打击。

父亲退休后，精力仍充沛，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在老友王思本^⑥、卓力文^⑦等支持下，创办了“温州市民革函授学校”，发挥自己所长，主要函授会计专业。函授学校越办越红火，既为社会扩大了受教育机会，也为温州民革增添了经济来源，父亲的生活也变得充实了。

2002年冬，父亲的双腿已难以行走，我去买了辆手推车，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我把父亲搀扶到手推车上，推到松台广场。父亲呼吸着清新空气，暖暖的阳光洒在身上，父亲哈哈大笑着说：“真爽呀！”看着父亲开心的模样，我的心里既欣慰又愧疚：能使父亲高兴，我很欣慰，但父亲要求并不高，我如能多陪陪他，多用手推车把他推到松台广场，他就很开心了。令人想不到的是，我特意为父亲买的手推车，仅用了二次，另一次是外甥阿冲把外公推到松台广场“潇洒走一回”。

真是“子欲孝而亲不待”。

2003年刚过了小年，父亲平静辞世，终年84岁。父亲是个普通城市平民，无政治信仰，亦从不介入党派，只干实事，谋生养家。他聪敏好学，大胆创业，待人有礼，待友慷慨，性情刚直，却生不逢时，又撞在“反右”潮中，大好年华却在“劳改场”度过。亦为可悲，但与他同时代人有更可悲者，呜呼，但愿父辈的厄运别再降落在后辈人身上！

严升记的字号及其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淡出了历史，但严氏后裔依然顽强、兴旺地在瓯越的土地上生息繁衍！

注释

①今为信。

②壬辰年，龙年，即清光绪十八年。

③一种手工棉线睡帽。

④温州方言，即采购。

⑤小画片，印刷在软纸版上的各种图画，大多是人物画，约半张扑克牌大，旧时可供儿童收藏及玩赏，小孩常用来玩输赢，如“飞人儿版”，即用“人儿版”用手飞摔出去，飞最远的人可首先用“人儿版”去盖飞近的“人儿版”，盖住了，该“人儿版”就归他所有了，是谓“赢”了一张。

⑥温州方言：耳光。

⑦温州方言：把剩下的全部买下。

⑧亦称“刨花楠”，一种乔木，木材刨花的浸出液有粘性，可供润发。旧时人们掠头时常用它来湿润头发。

⑨即“掸尘”，指过年时大扫除，打扫门庭、居室。柯灵《春节书红》：“一是掸尘，就是在春节以前，出动全家，里里外外进行一次大扫除，以便

干干净净过新年。”

⑩亦称“长条桌”，狭长板桌。《越谚》卷中作“长?桌”，旧时大户人家摆放在中堂，上面供奉佛像、香炉等。

⑪有提梁的吊桶，常用于从井里汲水。

⑫瑞安人，“温州鼓词（唱词）”名家。

⑬温州方言，礼物

⑭冥亲，冥婚。

⑮胡景城，生于1917年，鹿城区人，是温州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浙南游击纵队第一副政委，温州和平解放谈判我方的首席代表。解放后曾任温州市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杭州市委副书记、温州地委副书记兼温州市委书记等职，1987年病逝于杭州。他由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成长为马列主义者与浙南党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是浙南广大革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之一。

⑯王思本，原名弘汉，是民革温州市委会的创建人之一。1949年，王思本与国民党军第200师师长叶芳等密谋起义，为温州和平解放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解放后，王思本先后担任温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市政协委员、常委、副主席，市民革筹备委员会副主委，市民革副主委、主委等职务。因年迈于2011年3月25日辞世，享年101岁。

⑰卓力文，浙江省永嘉县楠溪人，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毕业。后任国民党200师新兵团政工室主任，1949年5月，随师长叶芳、副师长夏雷在温州起义。5月9日，温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郑丹甫任主任，邱清华、曾绍文、卓力文任副主任。后任民革温州市委会副主委。

骂他、赞他，论文背后的故事

滕增寿——一位从来不用讲话稿的企业家

王邦志

人物 一五九

二十多年前，在市委党校《温州论坛》杂志发表过几篇文章，可惜数度搬家，刊登文章的杂志遍寻不见……退休后闲来无事，欲将往年写过的东西整本集子。经人提示，我去市图书馆从存档的《温州论坛》查寻。时间太久，存档不全，查了半天，只查到“学习滕增寿、秦振华时代精神做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一文。但已然让我欣慰，这正是我最想要找的一篇，因为它寄寓着我和著名企业家滕增寿一段难忘的情缘交往史。见文如见人，不禁勾忆起这篇论文背后的故事……

1989年政治风波后，根据上级部署，准备成立温州市民兵应急营，鹿城区人武部具体承担筹备建立温州市应急民兵营相关事宜，并且，拟在广场路体育馆召开应急民兵营成立大会。

市委、市政府对此很重视，确定市委书记刘锡荣大会讲话，市政府陈文宪市长为应急民兵营授旗，大会由市政府秘书长陈桂连主持。会后还要进行阅兵游行。

会议议程之一，作为重视国防建设事业的企业领导，东方集团（原玻璃钢建材厂）董事长滕增寿，代表建有人武部的市属企业民兵单位在会上表态讲话。为此，时任鹿城区人武部副政委的我，会前特意去东方集团拜访滕增寿，接洽落实讲话事宜。此时，滕增寿已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知名人士。

不料，去后在会客室足足等了两小时。进了办公室，我说明来由，之后，只听滕增寿侃侃而谈，讲企业改革的宏图大略，足智多谋的经营妙招，生产效益的屡创新高，让我这个不懂企业的政工干部，听得一愣一愣的。

让我惊讶的是，滕增寿介绍说在北京大会上，曾做了几小时企业改革发展报告，记者将其录音整理全文发表，水平之高令我咂舌。但没想到，接下来还有让我更为惊奇不已的。当我言归正传，再次提出要把他大会讲

话的事宜敲定时，滕增寿竟然表示：参加大会讲话可以，但是不用讲话稿，理由是他从没有用稿子讲话的习惯。我明确提示说明：这不是报告会，是民兵营成立大会，正规隆重，履行程序，和市委书记刘锡荣一样，都需要讲话稿讲话，讲话稿我可代为起草。

但是，滕增寿铁定坚持不要稿子讲话，要稿子就不讲，几无商量余地。滕增寿的态度令我大跌眼镜，大感意外，难以理解。我好说歹说，愣是说不通，只好无功而返。走到半路，心有不甘，想想又回头，再说再劝，依然无果。

这可把我给气的，不讲就不讲，没见过这么奇怪的“牛人”，没遇过这么“张狂”的领导。

其后，经我提议调整，将民兵单位代表讲话人换成了温州打字腊纸厂厂长李黎光。成立大会开得成功，会后阅兵游行圆满，当晚在军分区招待所举行庆祝宴会。我对滕增寿坚持不要稿子讲话要稿子就不讲的说辞态度依然耿耿于怀，席间，借着酒劲，忍不住对滕增寿不可理喻的奇怪之举发了一通牢骚，言词语气或许有点过激。

不日，部长金秀林问我：“老王，那天饭桌上你是不是骂了滕增寿？”原来，人多嘴杂，我的牢骚话语很快传到滕增寿耳里，滕增寿打电话给金秀林部长说了此事。这未免让我好生尴尬，真不该在公众场合对别人说三道四，何况滕增寿已属公众人物，那时已经名气不小。此后几年我再没去过东方集团，因为忐忑不安，怕见滕增寿。

此后，江泽民总书记到东方集团视察，滕增寿向总书记汇报企业改革发展成就。不久，滕增寿被评为“十大中国改革风云人物”。市领导及温州社会各界纷纷到东方集团祝贺滕增寿，鹿城区人武部也准备登门祝贺。此刻，我思想纠结，心里打鼓：滕增寿平时重视国防建设，支持民兵工作，获此殊荣，我作为人武部领导，也理应上门祝贺。可前些年我骂过他，他会记恨吗？对我的上门，他是不计前怨，还是让我难堪呢？

反复推敲，斟酌再三，决计硬着头皮也要去，结果如何，我都认了。

于是，我随部长金秀林、政委朱茂盛及人武部科长们一行前往东方集团。见面时，滕增寿热情欢迎大家，也笑着与我握了手。我暗想，滕增寿大概忘了上次的事。

没想到，大家落座后，坐在年前江泽民总书记来企业视察时曾坐过的被

喻称“御座”椅子上的滕增寿，首先朝我笑着，然后大声道：“王副政委，我讲话真的从来不要稿子的！”

这样坦诚直白的开场语，出乎我的意料，原来滕增寿既没忘记此事，也没记恨在心，他以此姿态表示对我的谅解。

我瞬时反应过来，立即笑着大声回应道：“是的，滕厂长水平很高，讲话不需要用稿！”

于是，人武部一众来人也都笑着附和着：对对对，滕厂长水平很高的，滕厂长大智慧，大成就，获得十大中国改革风云人物，恭喜恭喜！祝贺祝贺！

至此，我与滕增寿之前的宿怨，就此了结。

而之后当我全面了解到滕增寿的先进事迹，更是彻底改变了原先对滕增寿的印象。

滕增寿的能力魄力，令我肃然起敬：80年代初，他受组织委托，通过10来年的打拼，把一个资不抵债、濒临倒闭、年产值40万的100来人国有小厂，发展成为4000多职工，年产值20多亿的大型集团企业。

而他无私的奉献精神，更加令我感动：这些年来，他全身心投入企业，吃住都在厂里，而且单位一次次分给他的房子硬是不要，个人应得的奖金年薪他一直不拿，任何应酬吃喝他一概不去……

这是我印象中那个目空一切的傲慢怪人牛人吗？这样的业绩和境界一般人能达到吗？这分明就是一位难能可贵的能人贤人……

于是，由之前对滕增寿不解的惊讶，转变成了解后的惊叹！敬佩、敬仰、惊奇，加之曾经贬损过他的歉疚和感慨于他的好奇，促使我逐渐走近滕增寿。

慢慢地，我和滕增寿成了相谈甚欢的知交好友。人武部工作期间，有事没事，常去他办公室转转聊聊，到鹿城区委办公室工作后，依然联系沟通不断。得知我提供红十三军烈士后裔生活困难的信息，滕增寿立马慷慨资助。

他长住厂里，我偶尔晚上便去他办公室聊天，听他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侃大山。言谈间，滕增寿见多识广、阅历丰富、思维敏捷的形象跃然眼前，而他那无私无畏、敢说敢为、特立独行的个性也一览无余。

我不得不承认，滕增寿就是个极具鲜明独特个性的人物，是个有智慧、有魄力、有担当、有奉献的能人。所以，他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企业

家、十大中国改革风云人物、全国 10 名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企业的优秀领导干部、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等显赫名头揽于一身，不足为奇，名至实归。

可对于这样一位德、才、力（魄力）兼备的能人，我却在公众场合贬其为“怪人”“狂人”，实乃大不敬、万不该。尽管滕增寿大人不计小人过，早已原谅我，但我内心一直自责，难以释怀，觉着歉疚，亏欠滕增寿。

终于，酝酿成熟，倾情捧出了一篇数千字的“学习滕增寿、秦振华的时代精神做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之文章，发表在 1997 年《温州论坛》杂志。

而对这位“我讲话真的从来不用稿子的”企业家，我也真的为之心底佩服。

如今，尊敬的滕增寿老友已仙逝多年。回想当年，先前因不解他的张扬而贬他数语，后来由敬崇他的高尚而赞他千言，心里总算安实了。

2020 年于杭州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母亲的遗产

浮石散人

我外祖父同祖母是嫡亲的兄妹。外祖父是一个勤劳善良的聋人。一辈子以做雨伞为生，开一爿油纸雨伞小作坊，前店后场，忙时雇几个小工。生活本来还过得去，自从外婆染上了大烟，一家人辛苦攒下的几个钱，全被她抽光了。

我母亲是从小被人扔到杨家门口的弃婴。据夹在襁褓中的字条上所写，母亲是丁巳年（公元一九一七年）八月初一出生。直到去世，母亲仍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姓啥名谁。

母亲五、六岁起就要做家务活，七岁开始跟着大她十岁的阿姨到茶栈拣茶叶。每当天刚麻麻亮、正是小孩子最好睡的时光就被推醒，烧好一家人的早饭，然后赶



年轻时的母亲（摄于上海）

到离家二、三里路的茶栈去。一天的茶叶拣下来，手酸腰痛，只换来两、三个铜板。她自己一个也不舍得用，全拿来贴补家里。她说，不少次从茶栈回来，肚子饿得慌，路过烧饼店，那正出炉的烧饼真香啊，多想买一个尝尝。一问要两文铜钱一个，咽一下口水，算了。

母亲还替人绣过花，再大些就开始跟外公削雨伞骨。不论夏日炎炎，还是寒风刺骨，都要一根根一刀刀把雨伞骨削出来。每忆及此，母亲总是毫无表情地重复着一句话：“那时的苦真叫苦啊，苦得都没地方去说。”

想不到如此繁重的手工艺，到我父亲一九六三年病世后，竟成了母亲养活我们一家五口的唯一生计。现在每当我回想起母亲生前曾多次对我说过：“孩子，学一门手艺，那怕改朝换代都有饭吃。”我深以为然。

那时十多岁的母亲尽管知道自己不是杨家的亲生孩子，但对养育自己长大的外公外婆非常孝敬。家中有好吃的，她总是自己舍不得吃，而让给耳聋的外公和体弱多病的外婆吃。

后来外婆病加重了，吃了许多药都没治好。听人说得了这种病，吃人肉会好，母亲便跑进厨房，拿起锋利的菜刀，用自己的嘴咬起左手臂，一下子割下一块肉来，立时血流如注，她却一声不吭，抓起一把灶灰按在三、四寸直径的刀口上。这一年母亲才十六岁！

母亲割肉救外婆的故事，一时成了温州城街头巷尾的美谈。虽然外婆最终还是死了，可是一个十六岁的养女，孝心如斯，刚烈如斯，真可令鬼神为之泣了！数十年来母亲左手臂上这个月牙形的刀疤，总是深深地震撼着我。如今写来，依旧令我肃然起敬。

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祖母和外公的撮合下，父母的婚事总算定下来了。婚后母亲随父亲到了上海，经人介绍给一个韩国舞女当奶妈。这个韩国女人与一名美国军人同居，生有一个儿子，取名唐棣。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位美国军人撤下母子上前线去了。舞女是不能领养孩子的，因此只得雇我母亲去领养。

母亲那时年轻，奶水足，既喂我姐姐，又喂唐棣。唐棣妈总是每天晚上后半夜二点多钟才回家，手提包里装得鼓鼓的，满是钱。白天，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空暇时间就教我母亲西方人养育孩子的一些方法，比如：三餐应定时、定量喂食；小孩子要经常让他晒太阳；要从小就放手、让小孩子养成自主能力；以及西方人讲究小孩子的教育要从胎教开始；人在婴儿时期就

具有识别能力等等。这些对于后来母亲养育我们，使我们得以较早开智，无疑都是有帮助的。唐棣妈还教我母亲一些简单的英语，直到母亲去世前一、二年，母亲还会讲：眼睛是 Eyes、鼻子是 Nose、牙齿是 Tooth 等单词，使我们大为惊讶。

时间相处久了，唐棣妈竟与母亲姐妹相称。一次她对母亲说：“爱弟阿姐，我看你长相好，身材也好，不如跟我去学跳舞。钱挣得多，也不会被人看不起！”母亲笑着摇摇头，婉言谢绝了她：“我这个人生来就是这个命，让我去吃别的饭怕不行。”母亲就是这么一个人，再穷、再苦可以忍受，但要她丢了自己做人的根本是万万不可能的。这在今天看来仍是何等的不易！

现在，母亲早已离我们而去。辛苦一辈子的她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但她的言传身教，是那么深地烙在我们的心头，以致使我们一辈子都受益无穷。

特稿：丑陋的老三届

张抗抗

老三届人不喜欢说“我”，总是说“我们”“我们的”，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我”只有“我们”。我们缺少个性崇尚集体精神。这种老三届人固有的群体意识，是长期高度集权国家遗留下来的文化心理。

既然是“我们”，那么我们的过失甚至罪孽，都让“我们”一起承担吧！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苦难，已被我们反复倾诉和宣泄；我们这一代人内心的伤痛和愤懑，已激起世人的广泛关注；我们这一代对于历史的质问，已一次次公之于众；然而，临近 20 世纪末，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能够低头回首，审视我们的自身，也对我们自己说几句真话呢？

不要再用“知识青年”这样自欺欺人的词语了吧。能不能平心静气地抚心自问：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可曾真正拥有过文化和知识？

如果我们敢于正视自己，我们应当承认，老三届这代人中高中生的比重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大都是初中文化程度，而文革前的初中教材，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灌输，在知识结构上具有极大有缺陷。我们知识沉淀最“厚”、烙印最深的那部分，并非人类优秀的经典文化，而是“阶级斗争”、“知识无用”、“革命的螺丝钉”等教条主义，是红宝书的语录，是样板戏的歌词，是大串联中抄写的大批文章。有人说这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其实还应加上泡饭和咸菜——蛋白质含量太低。

我们的大部分知识，都是在“文革”结束后，依靠顽强的自学，支离破碎地拼凑起来的。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严重贫血的一代人。

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文革”的牺牲品，是政治的殉葬物。不要忘记“文革”中抄家、破坏文物的红卫兵是这一代人；不要忘记“文革”中打死老师的革命小将是这一代人；不要忘记疯狂地鼓吹并推行血统

论的也是这一代人。红卫兵的法西斯暴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实，已是昨天的噩梦，但有多少人真诚地忏悔过，用心灵去追问我们当年为什么受骗上当，为什么如此愚昧无知？

老三届是曾受极左意识形态毒害最深的一代，然而许多老三届人至今还不敢正视自己曾误入的歧途，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社会，便轻易让自己解脱。就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有的人永远无法原谅自己，并用后半生的善行去赎罪和赔偿；但是有的人，只是怪罪于领袖的鼓噪使他们暂时失去了理性。

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曾无私奉献、改天换地；不要再仅仅说我们那年代的人与人之间是多么真诚和纯洁。如果你真诚，你应该承认在那个年代里，我们老三届人中也有出卖和告密——为了入党、升学、招工、提干的极其有限的名额，为了渺茫的前途，我们被人伤害也伤害别人——那所谓的纯真掺杂了多少虚伪和丑陋。我们一腔热血战天斗地，为了那些美好而可笑的宏伟目标，大肆砍树烧荒打猎，那时候我们义无反顾地破坏着自然环境，却面不改色心不跳。还有多少在我们的严厉批斗和打击下丧生的“落后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分子……

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吃苦耐劳、克己奉公，是中国各个社会阶层中的支柱力量，是最“优秀的一代”了吧。尽管老三届中涌现出了许多人才，从车间主任到经理到学者到市长，各界都能幸会我们的同学和“战友”。但老三届中，从事高科技、高级经贸活动的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比例极小。那是一个人才的断层，是老三届难以攀登的高峰。这一代人几乎都有未能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本人即是一例。大多数人只能从事普通的熟练劳动，成为这个社会金字塔的底座，如今已面临着下岗和退休。

由于共和国十七年教育和“文革”十年的经历局限，我们这一代人正在不知不觉地退出社会，离社会的主动脉越来越远。我们的知识结构和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同市场经济难以相容；我们已经习惯了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适应了“大锅饭”的劳动报酬和生活方式，于是同今天的自由竞争原则产生了剧烈的抵触和冲突。我们已经或即将被有知识有文化的一代年轻人从头顶上无情地跨越，正在一天天陷入被淘汰的尴尬处境。我们是一只蚕蛹，被困于黑暗中，但我们已无力咬破茧子。我们失落，我们抱怨，而我们却无可奈何，因而我们的痛苦是双重的。

所以，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我们已担负不起这样崇高而光荣的使命，况且那只是一顶虚妄的桂冠。我们曾经有过的革命理想，早就崩溃坍塌了，可惜那仅仅是出于对个人前途和命运的绝望，而不是出于对世界的整体认识。自从失去信仰，我们便从此变成了一个迫不得已的现实主义者。

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在这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几十年间，当务之急是吃饭，是工作，是住房，是病痛，是养育子女，是侍奉父母——我们始终在为生存而拼搏，我们早已丧失了选择职业和爱好的自由、机会和能力。“理想”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幻影，所谓的“精神”寄托，只能寄托于我们的子女……

说什么“青春无悔”——一个、一代人所牺牲和浪费的整整一生的时间和生命，竟然能用如此空洞而虚假的豪言壮语，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的吗？

这才真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

老三届人的老三届化，这一代人固执的“老三届情结”，是近年来深深困扰着我的一种忧虑。我写下这些也许触痛老三届人伤痕的文字，正是因为许多人尚在违心地用“无怨无悔”的结语，逃避对自身的清理和整合。我惟愿我们这一代人能走出老三届的阴影，在“五十而知天命”的人生中年，融入改革进步的大潮，从容地迈向二十一世纪。

我们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对得起剩下的岁月？

我们不再是“我们”，我们将是每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将与老三届一生同行。

人体上如何一个部件都至关重要，任何一个零件发生故障都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去年 11 月底突然因为免疫力的下降又不留神地遭冷风的刺激，发生脸部急性神经炎（面瘫）。经过二个多月疗程的吃药打针和针灸，脸部的畸形有所好转，但在刚过春节时，这病影响到了听觉神经，渐渐严重起来。正逢冠状病毒泛滥期，无法去医院就诊，只好硬挺着。渐渐地耳朵的听力急剧下降，脑袋里像被安装了一个“低音炮”似地，整天就像有一辆开足马力的拖拉机在耳畔轰鸣和碾压。任何美妙的音乐都变得一片嘈杂，听别人讲话都有了重音和含糊不清。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人没有思想准备和应对策略，一时变得六神无主。

一辆汽车驾驶时间长了，零部件出现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修理和维护的时间就会增加，好在很多的零部件可以更换新的，让车辆完好如初。可人就不行了，父母给的完整的身體中所有的器官，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疾病的侵害渐渐地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病状，有的是不可逆转的损害，这可能就叫做“衰老”。

我是一个“顽固”的不服老的人，多少年来一直反感那个“老”字。经常不让别人称呼自己“老者”“老人家”“老头”，凡带“老”的措辞都不爱听。随着年龄的增加，渐渐地那个接受“老爷子”一类的称呼，当然被叫“老师”就从来没有反感。

我这个人从小就“长得着急”显得老相，十来岁时就顶着一颗长满抬头纹的大脑袋，一种和年龄不相称的老相，在小学中是“有名气”的。记得十八岁那年去菜市场买菜，那位卖菜的师傅居然管我叫“老师伯”，那种自卑感和委屈让我耿耿于怀。别人脸上长“粉刺”（青春痘）是一颗颗的，我是满脸一片片的，无形中增加了我的老态成色。当兵的那年，和同龄人的一起参军的新兵在一道，又高又瘦又黑的我，所有人都喊我“老兵”。

和媳妇谈恋爱时，岳母怎么也不相信，说“不可能，这个人都四十多了”，真是人间的悲哀哟，当年我才 28 岁。

到了中年老化的速度明显缓慢，应了“老在前头”那句老话，其实，这个时段的思绪中对于“老不老”已经无所谓和麻木了。人的一生就是如此富有各自不同的传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歌。

当耳疾发生，我对许许多多的残疾人，有了新的认识，不仅仅是同情，更多的是敬畏。由于身体上的残疾给他们生活上带来诸多的不便，特别是盲人让我格外崇敬，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克服所有的困难，如此顽强地活着。不是人类和动物界的一种求生的本能所趋，而是一种精神所在。

我一直在琢磨，认为一生会患什么样的疾病，受到什么样的磨难是一种定数，无法抗拒，无法规避。关键是如何承认，如何承受，如何将灾难的降临化作顽强生活的动力和智慧。

记得一位普普通通的凡人曾经这样说：“短短数十载的人世间，弹指一挥间，无论年少到年老的时光，人活的是一种心境，轻拾一片光阴，把它婉约成一朵温暖的花，把心绪寄予山水间，春看花开秋赏月，夏看流水冬赏雪，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时光如何流转，向往人世间淡然，悠闲的心境，在世如莲，净心素雅，不污不垢，淡看浮华，在红尘深处，寻一方净土，没有红尘喧嚣与繁华，没有红尘的纷纷扰扰，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淡看天边云卷云舒，守住内心的风景，那悠然，静谧的流年，便是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固然，我读懂生命的摩尔斯密码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所有躯体疾苦不能消停我的激情，我用激情去冲刷出一片心的平原。耳里脑中的噪音虽然一时半会消除不了，只有静下心来去适应。我一次次地聆听着好的乐曲，虽然已经被杂音覆盖，朗读着那些关于“春夏秋冬”的诗篇，分散着自我的注意点。感染是一种魅力，将心的搏动加速，在我自己那小小的书房里演绎着春天的躁动，夏天的火热，秋天的色泽，冬天的温馨。音乐和书中的故事给了我一个不平静的空间，充实着我生命中的今天。我不停地回忆在曾经去过的西部美丽场景，翻阅整理那些记录曾经的照片，那些被感悟后按下照相机快门的产物，或许，如同汨汨的清泉，搭载着我渐渐老去的心，在海岸边的礁石上碰撞出炫丽的浪花。

一位女作家曾经在我的博客中留言说过：“袭一身轻柔白衣，携一袖清风，沿无极波光中无形蜿蜒的径，穿行于远山之外，入云海深处。掬银河水

为墨，蘸祥云为七彩，执风挥毫。”

我懂得生命的过程就是一壶禅意绵绵的清茶，泡上一壶好茶，令苦涩蔓延伸展，看着杯中的茶叶升起沉下，在热气腾腾中徜徉。叶片总在云里雾里气定神闲地望着你，令你兴致顿起，越喝越有味道。“如果说喝茶是一种心情，品茶则是一种心境。在幽幽茶香里敞开浮躁不安的心灵，体会禅茶一味的境界，总会让人趋于平静，沉淀下几分落寞的清欢。”

我如此这般悄悄地走着，走着自己的人生。我坚信了“老”只是生命历程中肉体磨损的物理变化，决不能成为精神上的化学反应。

2020.4.16 凌晨



吾心敞亮（2018年摄于仙本那）

王曙行·摄



浪花之所以绚丽，因为它的搏击。（2015 年摄于澳大利亚）



残留在蓝天下，依然挺立。（2018 年摄于新疆伊犁）



春去秋来，白天鹅重复着生命的轨迹。（2016年2月摄于北海道）



是海雕就得搏击海浪（2016年2月摄于北海道）



矫健的身影彰显生命的顽强和矫健（2016年2月摄于北海道）



野鹿以奔跑填充生命的激情（2016年2月摄于北海道）



勇者才会拥有绚丽（2019年2月摄于泸沽湖）



母亲的背影（2016年1月摄于永嘉）



慈祥的外婆（2001 年拍摄）



山河依然，人已老去。（2014年11月摄于四川亚青寺）



踉踉跄跄的生命轨迹（86年摄于泰顺）



自得其乐（1988年摄于温州）



老者风采（2014 年 4 月摄于太行山）



磕长头不仅仅是为了祈福，更是心的虔诚。（2002 年 摄于川北）

父亲和母亲

褚坚

父亲年逾八十，背驼了，思维也不利索了。母亲虽然只小父亲两岁，但记性还好，行动也轻便些。

每次回家探望，大多时候都是我与母亲聊天，父亲坐在旁边听。但每隔几分钟，父亲就会插话：“你开车来吗？”“天杰大学毕业了吧？”“淑兰身体好吧？”

一次、两次、三次，甚至连续七八次都是同类的问题。

只要父亲问，我都会耐心地回答。

母亲在旁常会打断：“刚才你已问了多遍了，又问！”于是，爸爸赧然说：“不问了，不问了。”

其实，爸爸平时话不多，但只要我在，他的问题就会又多又重复，但又总是问得简单。

由于工作原因，我没有与父母住在一起。我曾经在工作地为父母买了一套 89 平方米的房子。可父母住了一个月后，急着要回家。因为他们实在受不了城市的嘈杂和复杂的交通。

这样，我只能在周末尽量赶回家与父母团聚。由于自己也年近花甲了，往来四个多小时的车程，有点吃不消。于是，我把原来被台风破坏的小偏房修缮一新，供自己探望父母时居住。

每周末回家陪父母，也就是与父母聊聊天拉拉家常，吃吃母亲做的饭菜，陪父母过一夜。

我回家，母亲总是当大事对待。总是早早准备一桌我最喜欢吃的菜。我跟母亲说：“您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不要专门为我准备。”母亲总是不肯。有几次，我特地不告诉他们我要回家，为的是少让二老麻烦。但他们总是很内疚：“这么远回来，没有吃好！”想到这些，我也就随了老人的意，他们做什么我就吃什么。只要是母亲做的，我都感觉好吃。

而我，总想干点洗碗、扫地等家务事，可父母也总是不让我插手。有时候，我就故意找“事”儿，修理板

凳、换换灯泡等。

去年底，整理抽屉时，我发现一本书里夹着初中获得全县“物理竞赛一等奖”和“化学竞赛三等奖”的奖状，我好生激动！这些奖状，父母竟然为我珍藏了四十年。

看着带有虫眼但还完好的奖状，再看看眼前的父亲母亲，想起父亲年轻时的一身硬气和母亲当年的风风火火，我不禁潸然泪下。

父母确实老了。

我想，我的将来也是一样。

父母在，子女尚有去处；父母不在了，子女只剩归途。

趁着还有陪伴的机会，我又把这个周末的行程安排好了。

爸妈，咱们周末见！

一、写作之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快乐方式，每个人都可以开劈一块属于自己快乐的园地，在这块园地里播种、耕耘、收获和享受。

已近古稀之年的我，一直把写作作为自己的愉悦方式。如今写作虽不再让人羡慕和追捧，但它已成了我生活的难舍难分的一种方式，它给了我莫大的快乐。

每每休闲，我远离喧嚣的潮动，在网海里泛舟，当灵感闪现，激情萌发，我便手写键盘，会有诗文跃然荧屏……写作成了我释放抑郁，卸载心理负担，淡定浮躁心情，抒发情怀的方式。

写点小文字，自娱自乐，内心充实，灵魂富有，我很满足。写作让我很安定，也让我很愉悦。一人独处一室，排除诸多杂念，一门心思造句，是何等幽静清爽！每当灵感闪现，佳句妙语不断涌出，文章一气呵成，那又是何等的精神享受！

每当夜幕降临，房前屋后响起麻将、扑克交响曲时，我独居陋室，静静地坐在桌前，将心中的情感随着跳动的指尖飘散开来，会发觉原本杂乱无章的思绪，也能随着一行行的文字变得清晰、条理，而自己也会随之收获一份积淀，一份感触。写作让我的生活变得更有生趣，更加充满激情。没有郁闷，没有纠结，没有生活的不愉快。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净化和升华了。自己得到了精神滋养，自己感觉自己宝贵的晚年并未在碌碌无为中虚度。

我是一个 10 余年坚持读书学习的写作者。写作成了我亲密的伙伴，给我的生活注入了活力；写作让我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给了我温馨的天地，让我敞开了思维的大门。

我写作，目的不是为了发表，并非为了稿费，最重

要的原因是：坚持写作，是我活着的最大动力和最有效方式，以自己心血织就的方块字垒砌一个向世人昭示自己的存在。在写作的过程中，排遣无聊，排遣寂寞和孤独，滋养心灵，内心迸出喜悦，享受写作的无尽乐趣。

游走在文字之中，我便觉得无比充实。文字拓宽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思维，深化了我的情感。文字给我带来一份闲适的心境，一份豁达的心态，一种脱俗的意境，文字让我的生命多少有了点意义。

每当我倾注自己的情感到每一首诗，或每一篇文章时，身上便有说不出的畅快。我在文字里漫步，在文字里飞翔，用文字奏响心灵的清音，用文字跳起情感的舞蹈。在字里行间探索和感受人间的真善美，品味生活的酸甜苦辣，领悟世间的情理，感悟为人处世之道，这使我的心灵得到了抚慰和净化，也使我平淡的生活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陶醉于写作，我心旷神怡；迷恋于写作，我如痴如醉……

二、至乐在读书

如果你要问我，每天最喜欢做什么？我会不假思索的回答：读书，或看书。

这些年来，随着手机的智能化，使阅读变得无比便捷和丰富，人们随时可以“幸福地阅读着”。到处可见“低头族”，“手不释机”地翻看着感兴趣的东西。很少有人静下心来，手持一卷，反复咀嚼琢磨，精研详究。深思的大脑让位于手指的简单滑动，思索和鉴赏已不再重要。所浏览的大多是散碎无用的信息垃圾，即读即忘，随拾随扔。

而事实上，读书确实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远非看手机可比。书香沁心脾，至乐在读书。可很多人对此不太理解，觉得读书既不快乐又没用，甚至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比读书好玩的事儿多着呢！生活中的确很少遇见喜欢读书的人，更难以碰到能与你交流读书心得的人。现在的老年人碰面，开口便是谈如何保健养生。没有人说最近读了一本什么书的。

习总书记前几年在接受俄罗斯记者专访时，有一段关于自己读书的谈话相当精要：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说得十分到位，简明扼要，易解易记。

在我看来，读书还可以让人心情愉悦。这种快乐难以言表，是其他快乐

无法替代的。

读书最大的快乐在于，从书中发现生活，发现自己过去所不理解的生活。生活当中最大的快乐在于从生活当中感受到了读书的乐趣。对于某一种处境、某一处风景、某一种感受，你觉得书中所写与你阅读所感完全一样，这就是最快乐的事情。是的，读书给了我生活的发现、感触和理解，读书充实了我的人生，满足了我太多的精神需求。

不可否认，智能手机的音像传播，生动，直观，快捷，省脑力。但费目力，损眼力，不能做到细读慢品，更不能精读专攻。

我甚至觉得，能不能在图书馆把屁股坐稳，是一个人的心态是否良好的重要标志。忙于无聊应酬、乐于扑克麻将、迷于手机电脑，却从不读点书的人，在他静下心来回想一天的收获时，只能是空空如也，快乐并无多少发自内心。

端午至，杨梅红

王微芳

“颗颗黑珠树中藏，此物只在五月有。游人过此尝一颗，满嘴酸甜不思归。”端午节期间，正值温州茶山杨梅丰收的时节，那一颗颗挂在枝头的紫红色杨梅伴随着划龙舟的激情鼓点将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点缀得愈发红火闹热。温州盛产杨梅，尤以茶山杨梅最负盛名。据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 年）《温州府志》载：“杨梅，泰顺尤盛”，清光绪 8 年（1882 年）《永嘉县志》载：“旧志土产杨梅，今出茶山者，味尤胜”。这么算起来，温州栽种杨梅的历史至少已有 500 年之久。茶山杨梅被誉为中国四大精品杨梅之一，它生长在温州市瓯海区茶山镇，果大肉多核小，每颗重达 13—15 克，直径在 3.20 厘米左右，最大的有 3.37 厘米，果色紫黑而有光泽，果蒂浅绿色，柄长约 1.5 厘米，人称“红盘绿蒂”。

我们全家都很喜欢吃杨梅，自然不会错过五月杨梅上市这个大好时机！刚上市的杨梅价格昂贵，父亲也舍不得多买，只象征性地挑选了一斤左右欣然拎回家，给我们大家尝尝鲜。据说杨梅自带的酸味就是一种绝佳的消毒剂，细菌都无法沾染它的身子，因此一般无需冲洗，便可直接塞到嘴巴里品尝。但母亲为了确保杨梅的干净无虫，一般都会将盐用开水化开，等水变凉后，再将杨梅放到盐水里浸泡半个时辰左右。为了尽快抚慰我们肠胃里那蠢蠢欲动、吵闹不休的馋虫，母亲便使出她的绝活，只见她将杨梅放到一个陶瓷大碗中，直接将一大勺盐洒在杨梅上，然后将另一个略小一点的不锈钢碗作盖，盖住杨梅不停地上下左右摇晃。不到五分钟，便预示着大功告成，经过盐巴洗礼的洁净杨梅又得以“重见天日”。母亲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请出，摆放在莹白无暇的白色陶瓷盘中，陶瓷那洁白莹净的亮光便会将它衬托得愈加红紫晶莹，犹如一颗颗闪光的变色宝石，特别清心悦目，不由得令人垂涎欲滴。

尝鲜的杨梅价格昂贵，但等到杨梅大量上市的时间，价格便拦腰一斩，不仅便宜了一半，个头也比先前要大，且愈发的饱满多汁。这时，父亲便会“大出手”，毫不吝啬地购入10来斤杨梅。杨梅娇贵，不易保存，在炎热的夏季，若放置在常温下，它的生命周期甚至不超过一天。当日购买的杨梅若没有吃完，翌日再去观看它们，便会发现昨日还娇艳欲滴的它们业已变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不仅显得无精打采，且全身变烂发臭，引得果蝇围绕着它狂乱飞舞，让我们顿时大倒胃口，避而远之，只得忍痛将他们全然扔到垃圾桶里。

父亲购买的大量杨梅除了让我们大快朵颐，美美地品尝，大大地过一把吃货的瘾外，剩下的便会按照1斤杨梅配4到5斤白酒的比例，将杨梅和酒装进玻璃容器中做成“杨梅酒”，密封保存。浸泡杨梅的酒，一般都选用糟烧或米烧的白酒。杨梅经制成“杨梅酒”后，它的生命周期便得以延长数百甚至数千倍，可以保存数年之久。

当天吃不了的杨梅也可以制作成“酸梅汤”。自从我和姐姐有一次到妹妹家，品尝到她婆婆从冰箱里端出来招待我们的酸梅汤之后，那冰凉舒爽、美味无比的“酸梅汤”便镌刻在我的脑海里，令我齿颊留香，久久难以忘怀。为一饱口福，我也尝试着做“酸梅汤”。我的制作方法非常简单，只需将杨梅清洗干净，备好冰糖、桂花。然后在锅里加入水，等水烧开，将杨梅和冰糖一起请进沸水里并将火调成文火慢慢熬煮，待到冰糖全部融化。熬煮期间，若感觉水量不够，也可以再多加点水进去，再继续煮个30分钟，便宣告着可以关火了。等到凉透，撒上黄澄澄、金灿灿且香气四溢的桂花，就可以将它们装入搪瓷大口杯内，放入冰箱冷藏。这样，一杯绿色环保没有任何添加剂的自制夏日冷饮便算制作完成咯！它也成为备受儿子青睐的绝佳消暑饮料，每次品尝“酸梅汤”，儿子都会感到意犹未尽、回味无穷。看着他那仰脖牛饮、大呼过瘾的馋样，我也感到由衷的满足和欣喜。

明朝名臣、内阁首辅徐阶有《咏杨梅》诗云：“折来鹤顶红犹湿，剜破龙睛血未干。若使太真知此味，荔枝焉得到长安？”依徐阶的说法，杨梅若生长在盛唐时期，大概连杨贵妃也会垂涎它的味道吧！看来我们的规格和待遇比杨贵妃还要高呢！

《戍浦文存》 蕴含着文化自信

刘锦辉

艺苑
一八七

李岳松同志的《戍浦文存》出版发行了，可喜可贺。这本书中有岳松同志对藤桥党史的研究成果、有对藤桥人文历史和民俗风情的挖掘、有对藤桥革命历史遗迹的收集整理、有对藤桥各个历史时期先进人物和革命先驱事迹的追寻、考察和颂扬，更有藤桥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山乡巨变和老百姓生活节节提升的具体描述。这本《戍浦文存》集历史性、革命性、文学性、艺术性、现实性于一体，内容丰富、雅俗共赏、意义深刻，体现了岳松同志多年的研究成果和辛勤劳作，是一部具有收藏价值的宏观巨作。

岳松同志的《戍浦文存》之所以有新发展并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除《戍浦文存》具有独特的可读性，还大力彰显了中国独特的文化气息，激发了广大读者文化层面的共鸣与认同。2020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省调研时指出：“要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2017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正如李文照先生所书《石鼓诗情萦古镇，钟山风雨育泽临。》岳松同志的《戍浦文存》充满了新时代的文化自信。

独特文化气息赋予《戍浦文存》作品灵魂

任何文化创作需要找到自己的文化特性，挖掘并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层内涵，这是其立足于新时代文学舞台的根本。岳松同志的《戍浦文存》创作中不乏致力于挖掘当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来激发读者情感共鸣与精神寄托。岳松同志《戍浦文存》故事生

动、形象鲜明、艺术效果好、视觉冲击力强，在作品中体现藤桥当地独特的文化气息，增强了新时代文化作品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岳松同志在《戊浦文存》中写道：

屿儿山遗址位于鹿城区藤桥镇上寺西村祖师湾自然村北部一座小的孤丘上，南与阴山、龙山相望，北依戊浦江，海拔仅 20 米，分布面积约 5000 平方米，发掘 700 平方米。2018 年 5 月，由当地村民承包平整土地时发现了墓葬装饰木，且采集到了陶片，而后上报文物部门进行文物开掘。

聚落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陶片标本，主要有釜、鼎、罐、钵、豆、圈足盘、壶和纺织轮等石器 270 多件，以镞、铤、钺最为常见，有锥形器、镞和纺轮等玉器 4 件。此外，还有可鉴定的植物遗存 90 粒，水稻 12 粒、小穗轴 45 粒。

屿儿山遗址是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藤桥曹湾山遗址之后温州市第二处发掘的重要史前遗址。从屿儿山遗址柱坑底部有垫石、周边有夹石等现象，与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曹湾山遗址颇为一致。

在屿儿山西北坡区域，发现 3 座汉六朝的长方形单室券顶砖室墓，出土环首刀、罍等各类随葬品 30 件。其中多件为瓯窑瓷器，有瓯窑盘口壶、青瓷碗等，瓷器装饰风格以莲瓣纹、水波纹、褐色点彩为主。还有玉簪、玉握等。此外，还有一座为凸字型券顶砖室的东汉墓。

屿儿山遗址不是孤立的遗址，它是“好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有龙娘山庙会，岳松同志是这样写的：

龙娘山位于海拔 800 多米高的鹿城区最高峰、藤桥镇石垟村。每年正月十五，是龙娘山龙娘寿诞纪念日。是日，来自鹿城、瓯海、龙湾、瑞安、永嘉、乐清、洞头及青田等地的数千善男信女，慕名前来参加，成为鹿城民间龙娘信仰的一种祭祀活动，也是藤桥石垟附近山村传统的民间节日。

龙娘信仰历史悠久，影响甚广。在永嘉、乐清、瓯海、青田等地广为流传。据永嘉苍山宫碑文记载，后晋天福元年（公元 937）2 月 21 日，周氏娘降世，后汉乾佑三年（公元 950）8 月 14 日，她口吞龙卵孕龙于苍山洞，粉身化神……多种版本的龙母娘娘的传说广为流传。

独特的地方文化气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表达，以此吸引广大读者的观赏兴趣。这样才能在创造相应社会经济价值的同时，引导广大读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一个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内在精神追求支撑着这

个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涵养，这种优势必须体现到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一系列文化艺术创作之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播出去。新时代文化创作必须具有独特的文化气息，才能在文化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才能在文化全球化中奉献出自己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代文学创作要想拥有独特的文化气息，绝不能舍近求远、“东施效颦”，必须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探寻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路径。而岳松同志的《戍浦文存》真真切切的达到了这个目的。

红色革命文化赋予《戍浦文存》作品价值

2015 年 9 月 2 日，习近平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仪式上说：“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英雄和先锋只播种不收获，他们为的是信仰。没有实践的信仰是空想，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所有奋斗，贯穿了一个什么样的主线呢？那就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共产党为什么好？因为共产党“为穷人办事”，这也是藤桥产生的革命先驱对信仰宗旨最直接的理解，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更多的老百姓得到土地，是他们以命相搏的原因。

岳松同志在《戍浦文存》中写道：

泽临位于市区西部，东临温州市区，南连瓯海泽雅（新中国成立前称泽西）、西接青田，北与瓯江对岸永嘉县的永临、桥头相望，是浙南我党离国民党浙南统治中心——温州市区最近的一块游击根据地，不但是浙南党的前沿阵地，更是一块神奇的红色土地。这里无数可歌可泣的人与事都与交通站有关：早在 1927 年秋，瑞安的陈正兴受党组织委派，以购买山羊为名来到西坑村，宣传革命道理，1928 年 1 月就发展了西坑村的徐岩庚、徐培法、徐阿介等多名中共党员，建立了西坑村党支部，同年建立了西坑交通站，并由徐昌桃为交通站负责人，担负着党组织交给的多项任务。

1929 年，我党又派李振声和张学东同志到泽临发展红色武装。1930 年，

仅从西坑村就挑选了40余名民兵参加了红军十三军，徐碎巧、徐岩福还担任了红十三军一团某连连长。泽临是红十三军的发源地之一，红军挺进师还曾在这块宝地上纵横驰骋，省委书记刘英等领导在这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这里发生的革命活动都离不开泽临交通站、点有关同志所作的努力。

藤桥片区地处温州市区西部，是离市区最近的浙南革命根据地纸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十三军两个连队的诞生地和中共永嘉县委活动的重点区域。《泽临风云》的出版，系统地向世人展示了藤桥片区游击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历程，给后人留下一份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的乡土教材。

石垟村位于藤桥镇西部800多米高的龙娘山，早在红军时期就有林吉升等10多位村民参加了红十三军。中共永嘉县委重建后，石垟村是藤桥片区最早重建的一个支部。1948年至1949年是中共永嘉县委和浙南游击纵队永嘉县第十三区队的主要驻地之一。当时县委扩大会议、县委党务干部培训班、春节文艺联欢会、部队班以上干部会议等一些重大活动都在石垟村举行。

藤桥片区的双潮乡西坑、东坑、岙底乡田塘头、白脚坳和藤桥镇石垟等村都是红十三军一团两个连队的诞生地。早在1928年西坑就有徐岩庚、徐培法、徐培云、徐培荣等村民参加共产党，并建立村支部，到年底有80名青年男女参加红军赤卫队，平均每户就有一名民兵。到1930年1月，藤桥片就有西坑、东坑、石垟、白脚坳等9个村建立了党支部，有党员96人。1930年10月至1931年3月，仅西坑村就曾遭到国民党军队大小“围剿”30多次，村民徐培清、徐培荣等22名红军战士和村民被杀害。东坑、田塘头、白脚坳等村民房子累计被烧毁600多间，先后牺牲的党员、村民41人。这里是国民党重点“围剿”的地方。这里的人民为了革命事业作出了多么大的牺牲。藤桥片区曾是温州抗击日伪的重要地方。

藤桥是中共永嘉县委1946年3月重建后的一个主要的活动地区之一。该年7月，在这里建立了中共永嘉县委下辖的泽临区委。1949年2月24日，发生了为保护永嘉县委安全转移的田塘头战斗和1949年5月13日至15日，围歼国民党交通警察第一总队1200余敌的浙南著名的歼灭战——藤桥战斗。

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共产党，得到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的支持。人民群众用小米哺育了苏区、边区、解放区，用肩膀支撑起了土地革命战

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用无数子弟的鲜血，染红了党旗、军旗和新中国的国旗。而建立新中国，正是共产党人的信仰，在革命时期所展示的宏大目标。

在中国近代史上，怀抱各种主义和信仰的政党，似乎都相信自己拥有未来，为什么恰恰是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未来呢？因为，在信仰的碰撞和交锋中，共产党人信仰的不仅是真理，还在于他们能够前仆后继、舍生忘死地去实践自己的信仰。就像著名的夏明翰烈士在他的就义诗中说的那样：“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正是一批又一批的“夏明翰们”的舍身奋斗，才使信仰不再只是纸面上的文字，不再只是口头上的声音，不再只是思想中的空中楼阁，而是一个又一个具体鲜活的目标，而且越来越近。

当一双双握紧了的拳头面对党旗宣誓时，“镰刀铁锤”就是他们的信仰；当红军战士高喊着“为了苏维埃”冲向敌人的枪林弹雨时，“苏维埃”就是他们的信仰；当八路军战士从狼牙山纵身跳下数十丈的悬崖时，民族解放就是他们的信仰；当解放军战士高呼着“为了新中国，前进”和敌人的碉堡同归于尽时，“新中国”就是他们的信仰；当参加开国大典的一张张面孔凝望着缓缓升起的国旗热泪盈眶时，“五星红旗”就是他们的信仰。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未来，正是由这些不同阶段的目标连接起来的。共同的信仰，让人们凝聚起来，勇往直前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殚精竭力以成之。为信仰而奋斗，就是为未来而奋斗，不顾一切地向这些目标挺进。终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岳松同志的《戍浦文存》记载的就是我们红色的革命文化。党史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源泉和理论支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红色基因，积淀了优良的红色传统，留下了珍贵的红色资源，成为全党全国人民最可宝贵的思想、文化和精神财富。研究好党的历史，传承好党的红色文化，有助于我们以坚定的信仰看历史，以责任的担当看历史，以民族的使命看历史，以未来的前景看历史，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信仰，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我们进一步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提供正确的思想引领和不竭的精神动力。

我们还要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至高点开展红色文化研究，把红色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党执政的合法性、必要性和长期性放到历史的长河中进行研究，主动发声、占领红色文化宣传舆论高地，有效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言论。要把红色文化的研究与传承结合起来，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其中，起到润物无声的作用，让干部群众接受红色精神洗礼，把我们的红色基因传承好宣传好弘扬好，为树好红色文化民族形象做出贡献。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赋予《戍浦文存》作品收获

经济飞速发展的背后肯定是这个地区文化在经济领域的体现，支持全国经济发展的背后无疑是全国各地文化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支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恰恰是文化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的推进器。藤桥的经济发展也是由于当地文化的引领，藤桥当地的现代文化不仅仅是对过去的传承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未来的塑造。在这个层面上岳松同志的《戍浦文存》的详实记载，格外引人注目。

岳松同志在《戍浦文存》中写道：

小岙村地处温州主城区——鹿城西北藤桥镇北部，是原岙底乡政府驻地。这里竹林茂盛青翠，小溪环绕，秀美的风光，宜居的环境，古朴的自然景观和人文环境，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眼球。

改革开放前，村民靠山吃山，以种植番薯为主兼种水稻。改革开放后，建起腌塘从事造纸业和养鸡业，环境遭到破坏。近年来，村两委以“两山理论”为指导，积极引导村民放弃赖以生存的造纸和养鸡业，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以生态资源为成本，村集体与开发商合作，培育现代农业、民宿旅游、休闲观光等特色产业，促进经济发展。

岳松同志在《戍浦文存》中还写道：

石埠村改革开放后，这里是藤桥镇比较集中的工业生产基地之一。1987年，该村创办了藤桥刀剪厂，由该厂和温州矛牌剪刀厂合资创办了藤桥镇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温州矛牌剪刀厂藤桥分厂，解决了当地200多名村民的就业，增加了集体和村民的收入。产生的矛牌剪刀等系列名牌产品畅销国内

外。先后建立了藤桥第一个工业区——石埠工业区和沙裕工业。引进大小企业30多家，外来务工人员近2万人。挂温州市牌的骨干企业有周日、国南、百洲、远大等服饰有限公司和鸽乐时装针织品、格丽诺服装、夏泰制衣、金甲时装、利尔大服装、金针好服装、贝西奇服装等厂；挂鹿城区牌的有西莱雅服装、华西利制衣、藤桥制衣、纳得利服装、豪美制衣、藤桥西服时装等厂家和希伯仑实业公司等，以及鞋革、五金、电器、绳索等私营企业。生产的服装产品远销西欧各国。村境内的企业占原藤桥镇工业产值的60%以上。同时带动商业、服务业的发展。全村村民的装运和民房出租年收入达200多万元。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里有温州矛牌剪刀厂藤桥分厂部分厂房（原村仓库入股），原种子站用房；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村里建成了综合办公楼、停车场等，2018年，村集体资产达30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27000元。

原上戍乡是瓯海区重点产粮区之一，而乡村田间多为泥泞小道，“雨天踏水坑，晴天泥粉喷，生产路遥远，运输极困难”。为此，采取群众集资一点，国家补助一点，1988年将戍浦江北岸的机耕路拓宽改建为北岸公路。该路东起外垟村，西至潮埠村与藤桥至岙底的石（埠）林（垟）公路贯通，长5.84公里，当年10月建成使用，成为境内重要的交通干线。东首外垟村至上桥村为后来的坎上至双潮公路重叠路段。同时建成从渡头桥始，绕道曹湾山以西至竹桥村的公路，并与北岸公路（今戍浦北路）相连。以上公路建成后，使其与坎上至双潮公路、渔藤公路、藤岙公路互相连接，形成环形交通网，彻底改善了藤桥的交通环境，发挥公路交通的整体效益。如今的温州市13路公共汽车，自双屿出发，经戍浦北路、过岙底、至藤桥，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有其现实性，在对藤桥的记载里让我们悟道了藤桥人民两个信条。第一，“困难和办不到是两回事”。藤桥人民是极能克服长期艰苦挑战的人民。第二，藤桥人民信奉一个真理，那就是要让藤桥世代“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就是要让藤桥祖祖辈辈“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就是要让藤桥老老少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为了这两个信条，藤桥人民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和努力，真正做到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是遵循由俗走向雅、由原初走向成熟的路径，藤桥的

社会主义文化也不例外，也不能逆向而行。时代要求我们发展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清新、健康、优秀、典雅的先进文化，要创新和产生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样式和文化产品，岳松同志是一位先驱。

好的文化作品在于能打动人、鼓舞人、感染人，能给人以精神力量，还能给人以美的享受。通过欣赏和阅读能使人的心灵更加纯洁、更加美好，能让所有的人都“在朴素的外表内，有一颗高尚的灵魂”。岳松同志的《戍浦文存》展现了岳松同志足够的意志力和坚定的艺术追求。面对市场经济、面对大众文化、面对电子符码，不忘初心、逆行而上，完成了对读者的精神构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积淀；红色革命文化是历史的传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未来的召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

道门深远，岳松同志走在我们前面。

（刘锦辉：74岁、铁路退休职工。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全国书香之家、全国最美家庭、全国文明家庭。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全民阅读推广大使、吉林省全民阅读协会副会长）

资料来源

《鹿城年鉴（2019）》出版

2019年12月30日，《鹿城年鉴（2019）》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鹿城年鉴（2019）》是由中共鹿城区委、区人民政府主办，鹿城区地方志研究室承编的综合性地方年鉴，是《鹿城年鉴》创刊后的第15部。全书共计892千字，收随文图照152张、表格40张，正文设类目36个、分目220个、条目962条，全面客观系统地记述2018年鹿城区自然环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年度发展情况。

区档案馆馆长张靖到 三箭混凝土公司新春慰问走访

2020年1月15日下午，区档案馆馆长张靖一行到位于山福镇的温州市三箭混凝土有限公司开展新春慰问走访。张靖传达了区委、区政府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宣传解读《温州市优化营商环境办法》等一批新的政策法规，指导“帮企云”平台的问题提交，实现问题化解“线上线下”同步推进，重点咨询新年企业发展所面临的困难与需要政府层面解决的问题；同时，了解企业新年里的发展思路、项目投资、订单情况等生产经营状况，并送上新春美好的祝福。

三箭混凝土公司董事长董国华介绍了企业去年的发展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感谢区档案馆领导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带来的关心支持和问候。

鹿城区档案馆开展“崇法治、赠春联”活动

在鼠年新春即将到来之际，为积极响应区普法办关于开展“和谐新春与法同行”专项法治宣传活动的要求，鹿城区档案馆联合鹿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于1月20日上午在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办事大厅举办以“和谐新春，与法同行”为主题的崇法治赠春联活动。区档案馆特邀本地文化名流、书法家在现场挥毫泼墨，以春联传递法制精神，引导市民知法、重法、守法，吸引大批现场市民群众驻足参与，大家一边欣赏，一边挑选，手捧着春联喜气洋洋，笑逐颜开，整个活动现场洋溢着浓厚的年味，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区档案馆还向热心群众赠送了《鹿城年鉴（2018）》与2019年编印的《鹿城新咏》《鹿城方志》等档案编研书籍以及本地文化名流的签名书籍，为市民群众深入了解鹿城的发展与进步提供详实史料。

据悉，在此次“和谐新春，与法同行”专项法治宣传活动中，区档案馆充分发挥档案部门自身优势，除崇法治赠春联活动外，还以党员学习会“学党章、学法律”等多种载体形式，开展“和谐新春 与法同行”专项法治宣传系列活动，把自身工作同普法紧密结合起来。

区档案馆开展新馆建设工地年前安全检查

安全工作重于山。1月21日由区档案馆副馆长王剑峰带队到新馆建设工地进行年前安全检查工作。一行人听取了监理、施工单位相关情况汇报，全面了解安全文明施工措施、工程进度以及春节假期的安全措施情况，对项目施工进度、工程质保证和假期安全采取的措施表示肯定；并要求春节期间要落实安全文明措施，工程放假安全防范不放假。希望经过各方努力，确保安全过春节。

区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组对区档案新馆建设 工地复工开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为切实保障建筑工地安全有序复工开工，区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组加强跟踪督导，3月3日，纪检组陈立、周银华两位正副组长带队一行三人对区档案新馆建筑工地复工开工情况开展了监督检查，区档案局长、馆长张靖陪同。

督查人员了解工地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品的准备情况，出入人员体温测量、信息登记和每日消杀等防疫措施落实情况，以及施工和防疫工作同步开展情况等。重点围绕开工制约因素、工地疫情防控以及相关部门履职等方面进行了检查。同时，要求我们在确保做好工程廉洁自律情况下抓紧推动项目有序开工，确保工程安全开展复工续建。

市委高玉凤副秘书长一行 赴我区开展档案工作调研

2020年5月15日上午，市委办副秘书长、市档案局局长高玉凤一行3人赴我区开展档案工作调研。

首先赴五马街道进行档案调研，高副秘书长详细了解街道档案收集、整理、保管等情况，并参观了五马街道街史馆了解街区历史演变，对五马街道档案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随后，赴鹿城新馆工地现场进行调研。现场工地的负责人汇报了工程进度的情况，高秘书长在现场要求抓紧进度，将新馆疫情落下的进度在随后弥补回来，确保如期完成任务。最后，召开座谈会，高秘书长一行听取了鹿城区档案工作汇报。区委副书记周基斌介绍了鹿城档案工作现状，区档案馆馆长张靖具体汇报了鹿城的亮点工作，五马街道主任李锡南介绍了五马档案工作的心得。

会上，高秘书长肯定了近年来鹿城档案工作的成绩。指出新馆能顺利开工建设，前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要进一步加强档案业务建设，提升档案服务能力，推进红色档案的开发利用，全面提升档案数字化，尤其是针对疫情档

案，要扩大收集范围，丰富馆藏内容。高秘书长强调，鹿城要进一步加强队伍自身建设，加大专业人员培养力度，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为档案事业提供保障。

鹿城区史志部门积极奋战抗疫一线

近几个月来，鹿城区档案馆（党史、地方志研究室）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各项疫情防控的措施部署，积极制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全力开展抗疫工作。

鹿城区档案馆（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取消春节休假，第一时间动员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充分发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险的作风和精神，深入蒲鞋市街道青园社区，全力协助社区防疫一线工作，在各卡口同防疫志愿者们共同做好进出人员登记、量体温、疫情防控宣传等工作。并根据鹿城区委要求，派一名干部到隔离点协助一线防疫工作。从春节开始以来，鹿城区史志部门党员干部都一直奋斗在抗疫一线。近期，派出人员分班轮流充实火车站检查点，共同做好筛查、登记工作，保障全区人民健康安全。

同时，认真落实疫情档案指导管理事务，切实保证全程记录保全工作。这项工作将在持续推进之中。

3月21日，市区档案馆副馆长王剑峰带队到新馆建筑工地进行年前安全检查工作。



3月3日，区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组对区档案新馆建筑工地复工开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020年5月15日上午，市委办副秘书长、市档案局局长高玉凤一行3人赴我区开展档案工作调研

封面题字：
封面摄影：孙任翔

Jiyi Lucheng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